

目

学 术 研 究

(郭沫若题)

社 长 主 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 主 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 (兼)

总 校 对

黄荣显

· 纪念周恩来同志 100 周年诞辰 ·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与广东工人运动

..... 裯倩红 卢 权 (5)

周恩来与西安事变 潘利红 (10)

· 我与《学术研究》 ·

谈谈《学术研究》的特色 (陈胜彝) 感谢, 还有祈盼

(朱宝信) 个性与共性 (李文初) 我与《学术研究》结

缘 (李玉梅) 奖掖先进 提携后学 (李宗桂) 重视友

情而不唯关系 (吴承学) 架起学术交流的桥梁 (劳承

万) 容纳百川 活跃学术 (赵春晨) 造就新的学术传

统 (殷国明) 培育新学科的沃土 (黄锦奎) 鲜明特色:

高层次切入实际 (黄振平) 四十不惑 (龚唯平) 我对

《学术研究》高品位的几点感受 (黎学玲) (14)

· 经济 ·

广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研究

.....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课题组 (27)

提高广东工业素质: 问题与对策

..... 黄德鸿 张 南 (34)

多级委托代理关系与国有企业改革 张政军 (38)

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李善民 赵丽红 (42)

论政府间转移支付方式的政策取向 赵守国 (46)

1998 年第 2 期

录

· 哲学 ·

- 信息时代伦理整合的传统资源 任剑涛 (49)
- 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邱亿通 (53)
- 邓小平理论与社会学创新 黄捷荣 (57)
- 综合、创新和不倦的探索
——访张华夏教授 本刊记者 哲 生 (60)

· 文学 ·

- 跨越传统与现代的民族文学精神寻求 王列生 (64)
- 民族文化精神的探求
——新时期文化散文素描 张振金 (69)
- 推进审美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面向 21 世纪思考 李珺平 (74)
- 柳宗元诗歌简论 梁鉴江 (76)

· 教育 ·

- 学校公民教育刍议 刘国华 (80)

· 澳门研究 ·

- 澳门政治发展与宏观政治研究
——评吴志良《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
..... 邓正来 (82)
- 后过渡期粤澳经济合作新探讨 谭湛明 (86)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
- Mr. Zhou Enlai and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4—1927) Xuan Qianhong and Lu Quan(5)
- Mr. Zhou Enlai's Influence on the Xi'an Incident on Dec. 12, 1936 Pan Lihong(10)
- Essays on the Nexus between the Journal and 'Me' (14)
Chen Shenglin, Zhu Baoxin, Li Wenchu, Li Yumei, Li Zonggui, Wu Chengxue, Lao Chengwuan, Zhao Chunchen, Yin Guoming, Huang Jinkui, Huang Zhenping, Gong Weiping, and Li Xueling
- The Study of Establishing a System Structure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Guangdong by a research group of the Guangdong Propaganda Department, CPC(27)
- Problems in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Quality of Guangdong Huang Dehong and Zhang Nan(34)
- O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Graded Relations between Entrustment and Agent Zhang Zhengjun(38)
- New Trials in Fi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arket Li Shanmin and Zhao Lihong(42)
- Policy Financial Transfer between Governments Zhao Shouguo(46)
- The Traditional Sources of Ethic Conformity in the Information Time Ren Jiantao(49)
- On the Unity between a Historic View and a View of Value Qiu Yitong(53)
- The Significance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in Developing Sociology Huang Jierong(57)
- An Interview with Prof. Zhang Huaxia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Zhe Sheng(60)
- An Approach to the Link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National Spiri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Liesheng(64)
- A Descrip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Essays in the New Period Zhang Zhenjin(69)
- Problems in Developing the Study of Aesthetic Culture Li Junping(74)
- A Brief Talk about Niu Zongyuan's (773—819) Poems Liang Jianjiang(76)
- My Primary Opinions on Citizen Education in Schools Liu Guohua(80)
- A Book Review on Wu Zhiliang's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in Macao' Deng Zhenglai(82)
- Another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 in the Late Transition Period Tan Zhanming(86)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与广东工人运动

□ 禔倩红 卢 权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曾到广东工作,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此期间,他对广东地区革命斗争的进行,付出了很多心血。广东工人运动的开展,也是与周恩来的关怀重视分不开的。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以纪念周恩来同志诞生 100 周年,缅怀他对创建革命事业的丰功伟绩。

—

1924 年 9 月,周恩来从国外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的重要职务。他在密切注视广东政局变化发展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广东工人运动的开展。他在主持组建广东区委机构时,决定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由冯菊坡、刘尔崧负责,^①并指示他们要深入发动工人群众,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广州商团正与英帝国主义者相勾结,阴谋策划反革命叛乱,以颠覆广州革命政权。周恩来等广东党组织领导人密切注视着广州政局的变化,一再呼吁广州当局应采取果断措施,以防商团叛乱的发生;同时号召广州工人和其他阶层群众团结起来,与商团的叛乱阴谋作斗争。10 月 10 日,中共广东区委发动民族解放协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工团军、农团军等 30 多个团体共 5000 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警告商团大会。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广州工人联合农民、兵士、学生和商人等阶层群众,“向四周围的反革命派进攻”。他严正警告商团等反革命派,

不要错误估计形势,妄以为自己的“势力极大”,因而“气焰日张”。^②

但是,商团团长陈廉伯竟然下令商团反动武装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了广州工团军第二分队长黄驹等人,打伤和捉去工团军队员多人。惨案发生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号召广州工团军、农团军积极配合黄埔学生军投入平叛斗争,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

工会统一运动是广东工人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广东各工会团体组织涣散、派别诸多,经常发生矛盾纠纷,严重影响工人阶级的团结。广东诸多工会中,主要分属于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广东互助总社和广东工会联合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系统。前三个系统的成员虽绝大部分为工人,但其负责人则多是工头、封建把头和无政府主义者,并与国民党右派、官僚政客相勾结,使工会成为争权夺利、盘剥工人、以至破坏进步工人运动的工具。广东工会联合会则是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工作活动基础上,由共产党人张瑞成等发起组织的,由油业、土木建筑等 20 多个进步工会团体联合组成,积极带领工人开展进步的工会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下,针对工运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于 1924 年 5 月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积极开展工会统一运动。

周恩来到广东工作后,对工会统一运动十分关心,并对广州工人代表会及其为核心的工会统一运动的进行,明确表示支持。

他强调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都“力助广州市工人代表会为广州工会联合运动”，并称赞“今工人代表会实已包有一百余之强大工会”。^③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热衷搞分裂活动的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和互助总会的某些领导人提出批评，对他们与一些国民党右派、官僚政客相勾结，从事破坏工人运动的行为进行揭露。

这一切，使工人们深受教育鼓舞，进一步认识了工人团结联合的重要意义，同时更认清了广东总工会等工会的真面目。不少工人纷纷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加入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工会统一运动排除干扰，继续积极进行。

二

1925年5月，上海人民举行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五卅”运动。香港广州工人热烈响应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此时，周恩来正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委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任中共中央广州临委^④委员。他与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人一道，对省港罢工的发动，以及组织领导省港罢工的胜利进行做了很多工作。他还利用在黄埔军校任职的条件，及时给予罢工斗争以重要支持指导，对省港罢工的胜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酝酿罢工时，周恩来与陈延年、邓中夏等一起，认真研究了当前局势，分析了发动省港罢工的意义及其可能性等问题，并委派邓中夏、杨殷等人前往香港，与已在香港的苏兆征、黄平等相会合，在香港工人群众中作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还委派李森等在沙面发动洋务工人参加罢工斗争。6月19日，声势浩大的省港罢工终于爆发了。

为进一步推动各界人民群众反帝运动的发展，壮大反帝斗争的声势，广东对外协会决定于6月23日举行省港罢工工人和广

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大会，声讨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这一活动的进行。当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黄埔军校应派人参加这一示威游行活动时，周恩来不理睬蒋介石的反对，当即布置“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抽出一个营去参加”。^⑤是日，各界群众七八万人赶来参加大会，声讨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会后还举行示威游行。周恩来和陈延年等亦亲自参加了这一活动。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加激起广东各界人民的愤慨，省港罢工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7月1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抗议帝国主义制造沙基惨案、屠杀中国人民罪行的演说。他强调指出：“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到了那时，才能以机关枪大炮报沙基惨案的仇。”^⑥

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提出了“特许证”的中心策略。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并且在实施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在一次广州各界人士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上，有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帝国主义者唆使下进行捣乱。周恩来闻讯，立即赶来会场，向大家讲解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人们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纷纷表示拥护，从而击退了右派分子的捣乱阴谋。

7月底，周恩来亲自到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对省港罢工工人的英勇斗争表示崇高的敬意，并总结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武装叛乱的斗争经验，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的能力，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工农兵联合的势力，已能打倒军阀，犹如摧枯拉朽，现在更要进一步而打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工人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周恩来的报告，受到了全场罢工工人代表的热烈欢迎。

1926年5月，周恩来到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兼职教员，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课程。当周恩来讲课时，罢工工人和纠察队骨干纷纷赶来听讲。在此期

间,周恩来再次到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勉励罢工工人再接再厉,将反帝斗争坚持到底。⑦周恩来工作之余,有时还跑到罢工委员会所在地东园,找罢工工人和纠察队员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耐心宣传革命道理。

三

1925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和粤东一带的陈炯明叛军。周恩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并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东征军所向披靡,至11月初便攻占潮汕。11月4日,周恩来率总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受到汕头数万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惠、潮、梅、海陆丰等25县的地方行政工作。他在主持汕头工作期间,虽工作繁忙,但仍十分关注汕头工人运动的情况,对推动汕头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主持汕头工作后,即向中共广东区委建议成立中共潮梅特委(不久改为中共汕头地委),以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进行。潮梅特委成立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决定由杨石魂负责工运,彭湃负责农运,邓颖超负责妇运,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

1925年第一次东征胜利时,汕头地区工农运动有所开展。6月省港罢工爆发后,汕头海员、洋务工人也积极参加了反帝罢工斗争。但陈炯明叛军重新占领汕头后,那里的罢工遭受镇压而停顿下来。第二次东征胜利和周恩来主持汕头工作后,在周恩来的关注支持下,汕头地区反帝罢工重新恢复了活动。“从(11月)10日起,继续经济交通绝交工作,一经拿获,照章处罚。”⑧12月初,汕头罢工机构进行了改组,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汕头罢工委员会”。“自革命军恢复汕头后,海员工会即恢复罢工进行。恢复罢工后,各工会纷纷派工友组织纠察队,调查入口仇货。”⑨罢工委员会联系汕头的实际情况,经过认

真研究讨论,制定了关于复工的十四项条件,规定如日后罢工结束复工时,罢工工人一律返回原来工作单位,担任原来职务,原有工资待遇均应照付,各有关工厂洋行机关俱乐部等,“不得藉词扣除推延”,⑩等等。

周恩来十分关注汕头反帝罢工进行情况,特别是对政策执行方面尤为重视。他曾为此亲自发了一个电报给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询问有关罢工政策等事宜。周恩来对于支援东征到达汕头的罢工工人运输队的生活等情况也十分关心,亲自带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进行慰问,并向他们赠送锦旗和纪念章。不久,他又以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名义,向省港罢工委员会致电慰问,并赠送了一面绣有“反帝国主义先锋”字样的锦旗,⑪大大地鼓舞了罢工工人继续支持反帝罢工斗争的革命意志。

第二次东征胜利前,汕头工会团体也存在组织涣散、各成派系等问题,汕头工会团体的总机关是由少数人控制的、起不到领导作用的汕头工会联合会(简称汕头工联会)。“汕头工联会过去的历史,组织幼稚,不能够统治汕头各工会,对各工会没有给以计划和指导,任从各工会自由奋斗。”⑫

汕头工会统一运动,是汕头工人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1925年12月17日,杨石魂召开汕头各工会代表座谈会,宣传工会统一运动的意义。到会代表经过讨论后,“皆对统一运动表示热烈赞成”。⑬经过继续作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1926年1月11日,汕头各工会代表集会,一致通过将原来之汕头工联会改组为汕头总工会。1926年5月1日,汕头工人代表大会开幕,正式宣告汕头总工会成立。

为表示对汕头工人运动的公开支持,周恩来于1926年2月主持召开的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上,特意就有关工会统一等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关于工会立案,须得该地最高工人总机关同意;对于无会员之工会,禁止设立;关于同一职业,不得设立二个工会;禁止政府机关压制工会职员及工头压迫蒙蔽工人群众;吁请政府拨款开办平民书报社、劳工补习学校及平民医院,等等。⑭

汕头工人运动的进行,引起了一些政客、封建把头和不法资本家的震惊,他们与国民党右派以至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散播谣言,制造纠纷,调拨离间,极力破坏工人运动的进行。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些情况,并对一些较严重的事件,亲自进行处理。

1926年1月4日,一名日本人雇请汕头艇夫郑登、郑灶载其乘搭“乾坤丸”,竟然不付工钱,还纠合船上几名日本人将郑灶殴打致死,推入海中;郑登也被打重伤,生命垂危。日本人的暴行,激起了汕头人民的莫大愤慨,成立了后援会进行反抗斗争。6日,后援会和罢工委员会率领汕头工人及各阶层群众到交涉署和总政治部等处请愿,要求向日方提出抗议。16日,汕头各界群众再次集会,声讨日人罪行。周恩来亲自到会演讲,表示支持汕头人民的正义斗争,并派人向日本驻汕头领事交涉,保证今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并向死难者家属赔偿。^⑮

在此期间,汕头还一连发生了多起与工会或工人有关的事件。如1925年12月,汕头人力车工会与小贩工会因一些小事引起冲突,双方竟都举行罢工。1926年1月7日,汕头竹木业工会扭送3名违纪工人到警署,途中,有两人逃脱了。事后,工会错怪警署私自放人,警署则责骂工会无理,因而发生矛盾。一些坏分子趁机从中挑拨,导致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工会扬言要罢工,警方也说要罢岗。等等。所有这些事件,其实均是小事,并非原则问题。之所以酿成巨变,正如周恩来所深刻揭露的:“凡此纠纷,皆帝国主义者所认为绝好机会,香港政府藉此以破坏罢工,日领事因之而提出警告,于是一般陈洪余逆,贪官污吏,奸商买办,烟贩赌棍,咸蠢然思动,造谣中伤,妄造舆论,以动摇政府信用。”^⑯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对有关事件分别进行严肃处理。如对工警冲突事件,周恩来召集汕头各工会代表80余人,警区署长10余人,以及各机关有关人员前来开会。他在会上“演说四小时,与会者皆感动。”经过耐心说理教育,双方也各作检查后,“一致通过发表工警联合宣言,并信赖政府处理一

切,双方损失由市厅赔偿,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正是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汕头工人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成为汕头地区一支坚强的和重要的革命力量。

四

1926年“三二〇事件”后,周恩来被迫离开了国民革命军,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部长)的职务。他与广东区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密切注视着广东政局的变化发展,组织领导广东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进行;对于北伐出师后广东工人阶级的处境及其斗争活动,周恩来同样密切地关注着。

周恩来一再公开赞扬广东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英勇表现及其领导作用。他说:“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实现。”他又说:“五卅运动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⑰

周恩来深刻揭露批判北伐以来广东地区工贼和不法资本家在国民党右派包庇下,日益猖狂地迫害工人群众和破坏工人运动的种种事实。严正指出,北伐以来广东工人运动受到了种种压迫,是与国民党右派、官僚政客所操纵的广东当局对工贼和不法资本家之流的包庇纵容分不开的,而当局反过来却又借口说什么工人运动“过左了”,公开进行压制。他说:对于劳资之间的纠纷,“国民政府只要设法处理,使工人得到生活保障,他们本无须取这种(罢工)形式”;“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至其

行动,外间流言说工人要打倒国民政府,打倒某某,实行劳工专政,完全为反动派离间工农与政府之休戚关系。”^⑮针对日益逆转的广东局势,周恩来号召广东工人阶级要加强团结,进一步加强武装建设,联合农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他说:“现在进而与一切半封建势力作政治斗争,面积遍及全省,这非靠民主势力的扩大和充实,决难致胜。故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他又说:“就组织上,民众武装在广东已成为自然必不可少的组织”;“为乡村自卫计,为保护工会安全、防止工贼捣乱计,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军之组织亦为势所必需。”^⑯他还具体指示徐成章等有关人员要重视和加强罢工工人纠察队和工人自卫队的军事训练等工作。

遵照周恩来关于加强武装建设的指示和广东区委的部署,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原已建立罢工工人纠察队 3000 名的基础上,北伐出师后再扩充 2000 名。1926 年 10 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开办了一间罢工工人纠察队特别训练所;不久,再办了一个下级干部队和一个军士队,对罢工工人骨干加以系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以适应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罢工期间建立的罢工工人模范纠察队,省港罢工结束后,改编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卫商保卫团,由徐成章任团长。广州三大铁路工会亦积极进行扩充和训练工人纠察队。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属下的各工会团体,在刘尔崧等组织领导下,积极培训工人自卫队。至 1926 年下半年,广州工代会系统已成立的工人自卫队(团)队员约有 2000 人。广东一些地方如汕头、海口等地的工会组织,也分别成立并加强工人纠察队、自卫队的力量。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党的组织领导下,广东地区工人纠察队、自卫队在反击帝国主义的挑衅,打击反动势力的破坏,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以至应付日后发生的反革命事变等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阶级力量。

①中共广东党史研究室:《中共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 页。

②民族解放协会代表周恩来演说词,1924 年 10 月 10 日,载《双十》特号,“农工旬刊”社出版。

③伍豪:《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向导》第 92 期,1924 年 11 月 19 日。伍豪:《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载《农工旬刊》第 9 期,1924 年 12 月 1 日。

④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是 1925 年 5 月间由中共中央因广东工作需要而决定成立的,由谭平山、周恩来,罗觉(罗亦农)、鲍罗庭和陈延年五人组成,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广东工作。

⑤周恩来:《关于 1924 年至 1926 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8 页。

⑥《政治部周主任恩来讲演词》,载《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讲演录》,1925 年 9 月。

⑦《工人之路特号》1926 年 7 月 9 日。

⑧《工人之路特号》1925 年 11 月 16 日。

⑨《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2 月 1 日。

⑩《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2 月 25 日。

⑪《工人之路特号》1926 年 2 月 29 日。

⑫《汕头工联会改组为汕头总工会宣言》,《岭东民国日报》1926 年 1 月 30 日。

⑬《工人之路特号》1925 年 12 月 26 日。

⑭《东江各属行政会议记略》,载《政治周报》第 9 期,1926 年 4 月 26 日。

⑮《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 1 月 11、14 日。

⑯《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 1 月 27 日。

⑰周恩来:《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载《人民周刊》第 37 期,1927 年 1 月 14 日。

⑱周恩来:《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人民周刊》第 34 期,1926 年 12 月 11 日。

⑲周恩来:《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人民周刊》,第 35 期,1926 年 12 月 20 日。

作者 禩倩红,中山大学历史系(510275);卢 权,广东人民出版社(510102)

责任编辑:郭秀文

周恩来 与 西安事变

□ 潘利红

西安事变的发生,为由内战转向抗战提供了宝贵的契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临危受命,遇变不惊,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完善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政策

张、杨发动事变后,随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震惊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面对蒋介石被扣这一事实,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对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英美使馆马上同宋美龄等保持联络,支持其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的联共抗日主张。苏联对事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张、杨进行了无端的攻击。日本企图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日本外相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杨妥协,日本政府不能坐视,还积极怂恿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西安事变本身并没有使内战立即结束,反而使西安与南京处于公开敌对的地位。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矛盾尖锐化,亲日派何应钦鼓动兵伐西安,并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亲英美派为救蒋免出意外,急于和谈,反对亲日派的做法。各地实力派并没有像张、杨估计的那样,马上起来响应支持他们,而是在中央与西安之间徘徊观望。全国人民则积极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为事变的和平解决,积极奔走。

中共中央得知事变的消息后,即于12月13日,举行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周恩来认为西安事变后,日本有可能会在南京搞政变,在临潼地区增兵,这样,就加剧了日本和英美的矛盾。英美将支

持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中间派,苏联则会在英美之后表态支持我们。因此,我党对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的态度应该是,为防止日本变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系、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是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运动,联合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中心。周恩来的意见被中央完全接受。中央考虑到蒋介石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性及当时的军事形势,为了争取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不正面反蒋介石,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不在西安组织对立的政权,并由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杨解决问题。13日,毛泽东、周恩来两次复电给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①

12月17日傍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赶到西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并且履行国民党内部调停人的职责,这本身就是震惊国内外的一件大事情。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行动。

周恩来在从延安飞往西安的途中,听了刘鼎关于事变情况的汇报后,认为局势远比在延安估计的复杂得多,并且确信南京方面及多数地方实力派不会接受张、杨两人的“罢蒋”、“审蒋”要求,新的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周恩来根据这些情况当晚即致电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主要内容是“为了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是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②对蒋介石及亲英美派

采取逼的方针,是要他们接受抗日的主张,“逼蒋接受并保证实行”,逼是为了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只要蒋“确有诚意”,那就要在适当时候让蒋回南京。当晚,周恩来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就不再提“罢蒋”和“审蒋”,而是讲“最好是利用这个机会逼他抗日,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的条件,就和平解决。”^③“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④与张学良会谈后,周恩来连夜将事态的发展和与张学良商定的诸项措施电告中央,使中央能及时地根据事态的发展,把握住时局发展的动向,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最大限度地影响西安事变的发展。周恩来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正是抓住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核心问题。党中央当即接受了周恩来的重要意见,从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导方针。18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在接到周恩来的第二批电报之后,中共中央第二次发表通电,把18日提出的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将会议地址由原来西安改在南京,实际上承认了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放弃了原来将西安变成抗日中心的设想。21日,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方案,提出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条件,如改组南京政府,清除亲日派,保障民主权利,停战联合抗日等。这些都说明了,周恩来对完善党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进行全方位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

张、杨两将军虽然发动了事变,但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心中无数。至于他们的部下更是众说纷纷,莫衷一是。决定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还是周恩来到西安后才形成的。由于得到张、杨的完全信任,周恩来实际

成了蒋介石命运的主宰者。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力争把一切抗日救国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首先,抓住主要矛盾,做好张、杨的工作。当时不仅在苏区要求严惩蒋介石的呼声甚高,在西安主张杀蒋的也大有人在。在当时要人们接受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张、杨对扣押了蒋之后如何处置,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统一的认识。周恩来认为统一张、杨的思想是贯彻和平解决方针的关键。于是集中精力,针对张、杨的不同情况,分别做工作。周恩来一到西安,即与张进行会谈。他高度评价了张、杨两将军的爱国热情,并把我党和平解决的方针告知张学良,详细说明了采取这一方针的原因和可能实现的条件。同时根据形势,与张学良商定,在军事方面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击甘肃的胡宗南并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的统一行动,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十七路军刚宣告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这样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形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暂时巩固了西安的地位。在如何处置蒋的问题上,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领袖,只有他才能制止何应钦对西安的进攻,统率国民党内的抗日派、中间派,避免南京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在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有利于结束内战,推动抗日。中共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望。这样,既可借助蒋介石的地位压服南京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又可利用何应钦、蒋介石的矛盾来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

放蒋的方针确定了,如何打破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对峙的局面,促使蒋介石把联共抗日的意向付诸行动呢?17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商定了同即将前来的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18日上午,周恩来又拜访了杨虎城。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到达了西安,得知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对和平有了信心,“回南京后,更加积极活动”。^⑤宋子文

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西安方面提出由他组阁,成为打破僵局、促使蒋介石转变的契机。

其次,面向中下层官兵,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为和平解决事变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周恩来在统一了张、杨的思想以后,亲自作东北军、西北军中下层官兵的说服教育工作,耐心地解释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周恩来还同一些有较大影响的社会著名人士杨明轩、杜威丞等人进行谈话;接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指示等。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襟怀,使张、杨折服,也推动了群众接受和平解决的方针。西安方面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缓和了与南京主和派的紧张关系,何应钦不得不同意派宋子文、宋美龄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去西安谈判,至此谈判的大门打开。

再次,与南京政府代表交锋。12月19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公开申明我党和平解决的方针。20日宋子文即来西安,并派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宋子文是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人物,又是南京政府中亲英美派的重要领袖,同亲日派有矛盾。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向宋子文说明中共未参与事变,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电,提出在改组政府,取消亲日派权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下,公开与南京政府代表谈判。22日宋氏兄妹到达西安,蒋介石表示同意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以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并商定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以“领袖人格”作保证,不作书面签字。

23日,张、杨、周恩来同宋子文会谈正式进行。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⑥双方都同意以此作为谈判基础。周恩来在谈判中,与蒋方代表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爱国领袖、放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当前的国防、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向蒋方表明了我党的原则

立场和寻求和平解决事变以利抗日的诚意。在会谈期间,周恩来两次同宋美龄进行了长谈,阐述了我党的立场方针,取得了宋美龄的支持,这对推动蒋介石态度的转变起了积极作用。经过两天紧张的谈判桌上的斗争,蒋方代表作了明确的承诺,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蒋介石军队撤离西安,释放爱国领袖,承认苏维埃与红军的合法地位,召开救国会议,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释放全国政治犯以及同苏联建立合作关系等项“君子协定”。

24日晚,周恩来在宋美龄、宋子文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向蒋介石表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⑦蒋介石则当面向周恩来作了三点许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指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⑧至此,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三、临危不惧,力挽狂澜,保存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匆忙将蒋介石送回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地扣押了张学良,并派重兵围攻西安。面对南京方面的武力压迫,西安方面必须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作出有力的部署。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周恩来沉着机智,从容应变,力挽狂澜。他认为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内部团结,只要西北“三位一体”紧密团结,形成强大的力量,在军事上作有力的部署,在政治上采取正确的方针,可以逼蒋介石履行诺言,有希望营救张学良,如果硬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的和平局面。因此,周恩来认为在政治上应揭露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呼吁救张学良推动联共抗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周恩来首先坚定杨虎城

的立场,协助杨虎城稳定局势,维护西安方面的内部团结。自从张学良被扣以后,周恩来和杨虎城的接触更加频繁,全力支持杨虎城同蒋介石倒行逆施展开斗争。1月15日,周恩来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向南京发了一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向蒋介石表示强烈的抗议。军事上则与杨虎城、王以哲商定三方联合作战的紧急部署,连设七道防线,并于1937年1月4日电告中共中央令红军支援关中地区。1月8、9日红军赶到耀县、三原、咸阳一带,极大地支持和鼓舞了友军,稳定了关中形势。1月11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重申中国共产党和平、抗战的方针,“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绝不参加内战。”^⑨杨虎城也两次派人去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

在军事上刚刚布置好以后,东北军内部开始分化。张学良被扣以后,群龙无首,内部早已存在的新旧两派之争逐渐互不相让,各行其是。到1月下旬,“主战”的意见在西安占了上风。杨虎城在张学良被扣以后,处境极为困难,对东北军不便过于干涉,非常希望张学良能够回来,一起支撑局面。他主张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救张学良,但是又同情主战派救张学良回来的急切心情。周恩来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预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做朋友式的劝告,引导方向,协调关系。周恩来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介石下令撤兵,放张学良回来或给张学良以公职,以缓和迫在眉睫的内战。周恩来还在西安利用一切场合与上层人士谈话,出席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群众团体的会议,反复宣传要顾全大局,特别是对主战派的工作,周恩来花了很大的心血,反复劝说。但2月2日,孙铭久、应德田等主战派仍铤而走险,杀害了主和派首领王以哲,造成了激化东北军内部矛盾的“二·二事件”,顿时,西安城内谣言四起,整个形势剑拔弩张。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变不惊,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带着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祭奠死者,安慰生者。随后,周恩来

又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虎城随即派人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与此同时,周恩来派刘澜波到前线向要为王以哲报仇并进兵西安的刘多荃师长说明真相,陈述利害,要求他偃旗息鼓。在处置凶手问题上,周恩来为维护团结、维护和平,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派刘鼎将孙铭久、应德田等送到三原红军驻地,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也使主战派失去了首领,不能再有其他作为,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正如周恩来所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L

二·二事变发生后,三位一体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等同志的安全,要求代表团“紧急时立移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处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就难于在关中立足,国共谈判也就难以进行,蒋介石难免不再“剿共”。而自己留在西安,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告共产党和红军是打不败、压不垮的。同时也表示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为以后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2月8日,国民党中央在顾祝同的指挥下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周恩来与顾祝同谈判,在谈判中为营救张学良,实现张、杨的八项主张作了不懈的努力,维护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从以上不难看出,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但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以及蒋方代表广泛接触,宣传我党抗日主张,而且和代表团成员分头深入西安各抗日团体、机关学校,开会作报告,个别走访,揭露了南京亲日派引狼入室的阴谋,密切配合了张、杨的斗争。周恩来在和平解决事变中,坚决执行党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突出一个“逼”字,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英勇的革命胆略,灵活的斗争艺术,卓越的组织才能,为中华民族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我与《学术研究》

谈谈《学术研究》的特色

□陈胜彝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术研究》即将庆祝她的40岁生日了。40岁,在人生是壮年,是经过艰苦磨炼而到达成熟的时期。回顾40岁的《学术研究》,它究竟形成了怎样的特色呢?我想在这里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

首先,她是一个“名优产品”。《学术研究》一直是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代表刊物,在全国也是有较高知名度的老资格刊物。50年代末,我还是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年青助教,我们许多年青同事,都仰慕《学术研究》的大名。大家知道,1958年,怀着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第三个文化中心的雄心的陶铸同志,亲自倡议并且批准创办《学术研究》杂志,由省社联主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杜国庠来担任主编。当时,由地方来办的学术杂志不多,除《学术研究》之外,还有就是上海的《学术月刊》,这两家杂志也是全国最早创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期刊之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这两家刊物亲笔题写

了刊名。陶铸同志亲切地称《学术研究》是广东社科界的“自留地”,指示要把它办成反映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最新优秀成果的园地,同时也要反映全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创刊后,不负所托,善于团结广东学界,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很快就蜚声学林,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一家杂志。许多载誉中外的著名的专家学者和我的老师辈,如郭沫若、陈寅恪、杜国庠、岑仲勉、刘节、容庚、卓炯、杨荣国、商承祚、方孝岳、梁方仲、陈锡祺、王起等等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都在这里发表。因此,那时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青学人,把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发表论文,作为一个成功的阶梯和标志。我将精心撰写的处女作寄去投稿,没想到一下就被采纳了,论文发表之后反映良好,给了我极大的激励!也从此使我和《学术研究》结下了不解缘。

《学术研究》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复刊。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高校的老师听到《学术研究》复刊的喜讯,无不奔走相告,额首称庆,就像得到离别已久的老朋友归来的消息一样。《学术研究》一贯坚持学术的高品味,在广东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一直以来,《学术研究》发

①《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报》1936年12月17日。

②③《西安事变资料选集》第301—302、270—271页。

④罗瑞卿、吕正操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46页。

⑤《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6页。

⑥《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39页。

⑦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第

157页。

⑧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17页。

⑨《周恩来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6页。

⑩《周恩来选集》上,第73页。

作者潘利红,华南农业大学社科系讲师(510642)

责任编辑:郭秀文

表的文章在学术界很重视的北京《人大复印资料》上的转载率是相当高的,在《新华文摘》上每年都保持有10篇左右的文章被转载转摘,并且总有文章被列入封面要目,此外,近两年来,据新成立的有关资料库(湖北)的统计,所发表文章的转载率都被评定为“高”。《学术研究》在有关方面的学术地位评价中也颇受重视,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和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主持的“九五”重点项目《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统计与分析研究》把她列入数据库系统的核心刊物;由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等组织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又把她列为全国45家综合性文科重要期刊之一。国内各高校据此确认在《学术研究》上发表文章作为评职称的文章。在广东的高校中,对于在《学术研究》上发表论文还特别予以奖励,包括原稿酬的加倍、双倍甚至更高。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了,《学术研究》是受到国内外广泛瞩目的、有较高知名度、受广大读者重视和喜爱的学术期刊,并且保有着公认的广东理论界代表性权威性刊物的地位和名誉。

《学术研究》复刊之后,没有满足于既有的名气,她紧紧依靠已经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些中年学者,还有学界的老前辈和小字辈,抓住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新优势,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把“理论联系实际”和“双百”方针的贯彻提高到新时期来加以认识和运用,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当中,为推动人们的观念更新和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把它上升为新理论,转移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学风和经院学风,组织学界共同努力,攻坚闯关,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和创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0年来的不懈努力,《学术研究》异军突起,在众多同行中独树一帜,以新的面貌和工作实绩,毫无愧色跻身全省乃至全国优秀刊物的前列。在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1991年、1996年两届广东省期刊评比中,《学术研究》都以高名次获得社会科学优秀期刊称号(第一届排名第11、第二届排名第3)。更为难得的是,在1995年首届全国社会科学期刊评奖中,

她在全国3800余家社科期刊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优秀社科期刊提名奖,从而晋身全国社科期刊69强之列。

二

《学术研究》办刊的最大特色,照我看可用“务实”二字概括之。人们喜欢把理论研讨称为“务虚”,我说的“务实”正是有感于此。本来,学术研究是分成许多个层次的,因此,学术杂志如何定位,也就有多种选择。和一些选择“纯学术”或者提倡学术要与实践保持距离的杂志不同,《学术研究》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岭南地处中国南方沿海,自近代以来,就是一个最早接触外来文化,产生新观念,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批在中国近代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就都是在这块土地上诞生出来的。思想解放、勇于实践,是岭南文化的特色。《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传统,经过多年来孳孳不倦的努力,逐渐形成了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注重务实的特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在南粤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作为身居“先行一步”的改革前沿的学术理论刊物,《学术研究》致力发挥其“先行”和“窗口”的作用。她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服务、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繁荣广东学术研究服务”的“三个服务”的方针,以之指导办刊工作。在新时期,《学术研究》为组织联合省内外乃至国内外学术界,参加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来,作出了不懈努力。早在60年代,她就发表了广东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论商品经济》等重要论文,这一领先全国的重大科学成果,近20年已经获得高度评价,在全国经济界发生很大影响。《学术研究》复刊之后,继续发表卓炯新的研究成果,报道关于卓炯经济思想的研讨消息,为这一创发自岭南,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探索鼓与呼。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学术研究》配合展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理论学术研究工作重点转移的讨论、“两变”的讨论,被《光明日报》连续转

载和报道,《人民日报》于1980年7月17日以“《学术研究》开展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问题讨论”为题,予以详细介绍,这些讨论在哲学界影响很大,有力推动了理论学术界的解放思想运动。

总结历来的成功经验,针对现实需要,《学术研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从较高层次切入实际”的社科研究贯彻落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努力方向,既强调学科学理上的高品位,又注意紧密联系全国和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先后组织开展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经济特区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珠三角经济区研究”、“新时期道德建设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等等的研究,以组织专题研讨和开设专栏的形式,为配合和促进广东和全国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对真理标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特区性质、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教育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等讨论,或以其领先开展,或以其选题重大,颇受注目。例如“邓小平理论研究”,紧紧结合广东的实践,生动有说服力地对邓小平理论加以阐述,又运用邓小平理论对广东的实践进行深入的总结的指导,做出了许多大文章、好文章;又如“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专题研讨,在80年代末举办当时即在全国发生强烈反响,而直到最近,许多探究这一问题的文章和论文综述,仍然对这次研讨成果加以引用。再如“新时期道德建设研究”,结合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在1994年率先展开,也在全国理论界发生了广泛影响,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公报以后,“新时期道德建设”更成了全国性的重大理论课题。

90年代,《学术研究》紧紧抓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为导向,以研究、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新理论为重点,从刊物的学术性特点出发,坚持联系实际、服务实践的宗旨,花大力气抓精品力作,成绩斐然:自

1992年起,连续四年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这四篇文章是:《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崛起的原因和条件》(1992年第4期,作者于幼军)、《在改革开放中迈向文明之路》(1993年第1期,作者省社科联课题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广东的成功实践》(1994年第6期,作者周燎刚等)、《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物价上涨与调控问题》(1995年第6期,作者文武汉等)。这在全省刊物中是唯一的,在全国同类刊物中也是少有的。为此,《光明日报》1996年1月7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学术研究》立足广东精品迭出”为题,给以报道,充分加以肯定。此外,在历次全省社科理论优秀成果评奖中,《学术研究》发表的文章所占比重也常居省内刊物之冠,例如1993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八大报刊共同策划组织的“从广东实践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型征文活动评奖中,获奖7项(共设32项),同时获编辑奖7项,获奖档次、数量均居各参评报刊之冠;又如1994年全省“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大型征文活动评奖中,获奖5项(共设17项),同时获编辑奖5项,获奖档次、数量均居首位。

对于《学术研究》取得的成绩,省委宣传部主管部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学术研究》是我省理论战线主要阵地之一。近几年来,该刊物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以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为导向,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实际,在推进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促进社科学术理论的繁荣发展,从较高的学术理论层次上反映了我省社会科学战线的优秀成果,取得了明显的实绩,为我省社科理论战线在全国赢得了荣誉。以上成绩的取得,在我省及部分省市的社科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对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弘扬主旋律,扶持精品力作,繁荣发展学术理论,服务两个文明建设的精神,起到了较好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三

《学术研究》的工作实绩,反映了她确实具有较强的办刊实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作为多年来受聘于她的编委,我觉得以下三个原因具有根本性:

第一,拥有一个团结的广东学术界作者队伍。如上所说,《学术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广东学术界的代表性刊物,她走过的40年,也可以说是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从弱到强,历经曲折,发展壮大,胜利前进的历史见证。今天,广东省社科联下属有100余个学会、研究会,有近80家大大小小的会刊、期刊,《学术研究》既是其中一家,又是最老资格的一家,为首的、核心的一家。《学术研究》作为综合性刊物,她足以笼罩百科;作为代表性刊物,她有力地吸引着各学科的优秀成果。据有如此厚实的基础,无疑使她实力大增。《学术研究》创刊伊始,即确立了依靠广东学术界的力量、为繁荣广东学术研究服务的宗旨,并且一直坚持这条宗旨。她既十分重视老专家的新成果,又注意精心培育年青学者,这些学术界的新军和有生力量。当年,我的同辈之中如暨南大学前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饶芃子,已故中山大学教授、有影响的美学家、博士生导师陆一帆等等众多的广东高校年青教师,他们的处女作或者早期论文也都是首先发表在《学术研究》的。这一大批年青人当中,不少已经成为当今的著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作者。因此,《学术研究》经过长期的努力,把广东学术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广东学术界对于她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有力地支持了她所推行的“从学术高层次切入实际”的方针,积极地参与她组织的一系列专题研讨,心甘情愿地向她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成果,诚意推介他们学生的新锐之作。

第二,具有一支年轻而老练的编辑梯队。事实证明,一个好的刊物,编辑队伍的稳定和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它既是刊物的方针、宗旨得以贯彻执行的基本保证,也是刊物树立在学界良好形象的重要因素。《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那样突出的成绩,和她的编辑队伍自然是分不开的。在我看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现有的编辑,年龄平均不到40岁,而编龄普遍在10年以上,这是一支

年轻而有实力的队伍。我作为她的编委和老作者,经常跟他们打打交道,对于他们严肃诚恳的工作态度、活泼敏锐的思想作风、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热烈开放的理论风气,有着很深的印象和愉快的感受。《学术研究》复刊以后,大大加强了内部建设意识,经多年努力,现在兼备着稳定的办刊宗旨、编辑梯队、内部管理、学界信誉,等等。《学术研究》在内部管理方面,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管理制度,从策划选题、组织稿件、编辑校对、装帧出版,都有严格规定,因此保证了期刊按时正常出版,并且保持着较好的出版质量。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版式装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同类刊物中已经跃居上乘。

第三,保有一个比较稳定有力的物质基础。《学术研究》也像其他学术期刊一样,不可能“下海”。由于她的读者对象是知识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单位中人,也不可能达到数十万份的发行量,因此,这一类刊物是不能离开政府财政补贴或企业基金的支持和赞助的。所以,一个这样的期刊,有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障,实在是它能否存活和能否办得好的不可缺的基本条件。《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关怀下成长的。1994年,省委省府领导亲自批示,设立《学术研究》杂志专项出版基金100万元。这一举措,既是对于《学术研究》的办刊实绩的肯定,又集中地反映着省委、省府对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关怀,反映着对于《学术研究》作为团结全省社会科学界的重要地位的确认和寄予殷切的期望。这一举措在全国同类刊物中实属首创,因而立即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广泛关注。基金的建立,标志着《学术研究》杂志经费供给制开始发生变革,逐步由传统的财政拨款制向基金制转变。它不仅缓解了期刊经费困难的问题,而且为期刊的长期发展奠定了较为稳固的物质基础。基金的建立,也给《学术研究》的改革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1996年,《学术研究》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出版周期加快了,扩大容量一半以上,更好地适应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新高潮的到来。

在《学术研究》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

时候,我写下此文,作为一个老作者兼编委的回顾和展望。并以此祝愿《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质量,多出精品佳作,以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让我们共同努力,使这家全国知名的优秀刊物青春不老,迈向 21 世纪,更上一个新台阶。

感谢,还有祈盼

□朱宝信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卫校副教授)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让人非常惊异、兴奋和狂喜的时刻,当得知我与友人合作的文稿《现代辩证法:矛盾论和系统论的统一》拟在《学术研究》1993 年第 6 期上刊出时,对我就是这样的时刻。《学术研究》,这一享誉全国的南国理论论坛,对当时的哲学初学者的我来说,真的是仰之弥高、望之弥远,就像一个丑陋的小伙子面对一位玉洁冰清、光彩照人的美女一样,自惭形秽又不忍离去,黯然神伤又流连忘返。然而,《学术研究》品位高精却不高傲,她向我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接纳了我那还显得稚拙的作品。欣喜若狂之后,我克服了自卑和怯弱,走在深远漫长的哲学学术研究之路上,我也多少有点自信和勇气了。

于是,似乎没有想到,我脑海中关于辩证法现代化的一些零乱想法,竟陆续在《学术研究》上表露出来了。传统辩证法是矛盾论,它讲的是对立统一规律,本世纪 40 年代出现了系统论,它讲的是普遍联系规律,若将矛盾论与系统论相结合,辩证法不就呈现为现代形态了吗?以这一最初的动机为契机,我又在《学术研究》发表了《辩证法的困境和出路》(1995 年第 3 期),深感辩证法研究中面临着经典作家认识的不统一、传统哲学体系的肢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系统论的冲击和实践辩证法的挑战等困境。出路何在呢?我猜想应从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开辟道路,于是我又在《学术研究》发表了《论辩证法的三种形态》(1996 年第 8 期)。通过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传统教科书的唯物辩

证法和哲学改革中提出的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的比较,我得出了以下自以为很有趣味的结论:唯心辩证法把一切都意识化,它是思维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把一切都物质化,它是物质的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把一切都实践化,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人的实践是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因而它应拥有思维的辩证法并要掌握物质的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统摄了后二者,它才是现代形态的辩证法。

《学术研究》以她的热情和真挚而让我的上述想法问之于世,并进一步激发了我辩证法研究的诸多联想,每想到此,我真的是感谢不尽呢。

辩证法的发现显示了人类智慧,就像它面临着现代化一样,对辩证法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由此我想到,《学术研究》作为国内辩证法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重地,要是能组织一批对此有兴趣的学者进行集中深入的研究,那该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涌现;要是能在刊物上设下专栏、展开争鸣,那定会有助于更多更好的成果涌现。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新纪元,那么社会主义辩证法恰是现代形态的辩证法;如果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我国社会主义辩证法就会具有我国特色的特殊性。似乎用不着怀疑,我国特色的辩证法的这种特殊性一定蕴含着丰富、复杂、深奥的内容,对它的研究,着实是很诱人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完成辩证法的现代化,这就是我对尊敬的《学术研究》的殷切的祈盼。

祝《学术研究》青春永驻、芬芳永驻!

个性与共性

□李文初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为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文科学术刊物,《学术研究》走过了它 40 年的艰苦而辉煌的路程。

从 50 年代《学术研究》创刊时起,我便

是它忠实的读者。那时我正在北京读大学，在有数的几家文科学术刊物中，每次读到新的《学术研究》，都感到一股清新的南风扑面而来，湿润而带点咸味，那感受是颇为独特的。80年代《学术研究》复刊后，我渐渐成了它的作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得改革开放气候之先，经济特区的建设，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崛起，岭南文化的勃兴等等，将《学术研究》推到时代大潮的前沿，使之成为反映新的时代精神的著名文化载体，十分引人注目。进入90年代后，我又以读者、作者的身份兼任《学术研究》的编委。21世纪给中国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带来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回顾既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满怀信心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是中国人民普遍关注的大事，也是刊物面临的热门话题。正当这一宏伟的历史性时刻，《学术研究》走完了它40年的里程，它必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创辉煌，与全国人民一样，满怀希望地跨进21世纪！

《学术研究》之所以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它在同类刊物中历史较长，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家具有鲜明个性的刊物，而这种个性又是不偏离时代大潮，有着强烈时代精神的，这就是刊物的所谓共性。一个刊物，只有个性而无共性，它必然是视野偏狭，几近于迂执的；而唯有共性毫无个性的刊物，恐怕也只能是面目苍白、平庸无奇，很难得到读者认可的。刊物的理想境界应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或者说寓共性于个性。《学术研究》始终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它的这一特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身处改革开放大潮的南国，《学术研究》以它敏锐的触角、深沉的洞察力和勇于探索的气魄，发表了无数反映特区建设和珠江三角洲新经验的好文章，引起了国内外普遍的瞩目和关注。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势态，不仅是属于广东的，也是全中国人民共同关注的大事。《学术研究》一方面组织人力深入到改革开放大潮的第一线，研究、撰写各类总结新经验的文章，另一方面又适当借助新闻的快捷手段，如“座谈”、“笔谈”和“学者访谈”

等形式，及时报道学术前沿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现状，给读者传递丰富、新鲜的学术信息。这种新闻性与学术性的巧妙结合，也是由《学术研究》个性与共性趋向统一这一特色决定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作者、编委，我衷心祝愿《学术研究》越办越好，并满怀信心地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

我与《学术研究》结缘

□李玉梅

（香港教育学院高级讲师）

我认识《学术研究》两位主编先生于1996年的夏天，我应中山大学历史系张荣芳教授之邀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首日在开幕礼大会发言前，有一位笑容可掬的先生主动走来向我打招呼，并自我介绍称刘斯翰。又及在旁的林有能先生。我素来喜欢参加学术会议，惜记性甚差，在礼貌的应对时，还以为是在其他会议上认识的旧朋友，但一时还不十分记起。会后，幸好有机会与刘先生攀谈，才知道我把在广州朱子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稿子《论诠释学的理论重估朱熹的道德史观》烦请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代为发表，小文竟蒙《学术研究》编辑部赏识、刊登于1995年第六期内。文章刊登了，还影印了作为圣诞问候寄予学术界的朋友。广东省社科联的李鸿生先生收得小文后，还笑我说《学术研究》原是与社科联属一家人，我有文章在《学术研究》发表他早就知道云云。至此我才对广东省的学术文教界架构略有了解。并明白到刘先生为何跟我一见如故，我却茫然无知——此乃主编用心审稿，作者但求发表之故也。

1996年秋，我从江西回港，路经广州，又得与上述诸位先生有聚谈机会。我研究的课题是史家陈寅恪先生，拙作《陈寅恪之史学》今年（1997）春在香港三联出版，周一良教授的序文说我在书中借“诗无达诂”一语对陈先生的诗并无讨论。我认为“诗无达

话”，主要是因为 80 年代学界对于陈先生的诗颇有歧见，且拙作重点在分析陈先生的学术而非其创作，故对陈先生的诗存而不论。原来当日之陈诗歧见者之一就是刘斯翰先生的兄长。学术诚属天下公器。再三结缘却不可谓不由天意。

1997 年元旦后几天，我在澳门大学一个讨论六祖《坛经》与岭南文化的会议上又得与张荣芳教授见面。张教授表示我在中国秦汉史会议上所发表的《陆贾体用之诠释学色彩》袭用西方名词，与《秦汉史论丛》一贯风格有别，正受编委们的去取考虑。一向但求发表的我，细听之下，自然十分失望，仍恳请张教授一旦不纳该文，则另代寻披露机会等。过了一段日子，张教授覆我谓《学术研究》亦曾接纳有关诠释学的文章（意指上文有关朱熹的拙作），既有先例可援，则有关陆贾小文，亦可收入《秦汉史论丛》中矣。《学术研究》编辑先生，岂可不谓吾之伯乐乎？谨祝《学术研究》成就更多树人美事，造福学界，幸甚幸甚。

奖掖先进 提携后学

□ 李宗桂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学术研究》是我国创办较早的高层次学术杂志。1998 年 1 月 15 日，是她的四十华诞。先哲云：“四十而不惑”。《学术研究》近年的种种成熟的学术表现，证明她确实进入了不惑的境界。

《学术研究》作为我国早期创办的地方学术刊物，伴随国家政治生活和学术环境的演进，既有失落的痛苦，更有丰收的喜悦。如果说，她的前 20 年是挫折多于顺利的话，那么，她的后 20 年则是顺利多于挫折。愈挫愈奋，愈奋愈进，是她的“人生”轨迹。近年来，她开辟了诸多学术专栏，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文章。无论是名家、大家、专家的宏论，还是无名之“家”、初出茅庐者的稚论，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能够在她的版面上出现。对于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她不像某些

杂志那样盲目地跟风，也不像某些杂志那样熟视无睹，而是既有及时的反应，又有理性的选择和引导。办刊宗旨的确定，每年的主题的设想，严谨学风和朴实文风的倡导，以及栏目和版式的设计，都颇具匠心。这些，都反映出她的成熟，她的“不惑”。

我是在《学术研究》的热忱支持和大力提携下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之一。虽然我在《学术研究》发表的论文，远比不上我在《哲学研究》连续 9 年共发表 10 篇的数量和声势，但她的编辑们的约稿热忱和真情，确实令我感动，催我发愤。我给她的每篇稿件，都得到了编辑的认真而合理的处理，发表后都在学术界引起了同行的重视。我想，这并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她的影响大，学术界对她的关注很密切。至于她的哲学编辑编发的关于我的学术专访，则更是对我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勉励和鞭策。真情厚谊，长在我心。

《学术研究》十分注意发掘新人、培养新人。近年来，她发表了不少青年学人的文章，为他们提供了锻炼自己的阵地和机会。一些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是在她的沃土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同时，她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青年学者的专访，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与此同时，她十分注意发表老一辈学者特别是知名学者的论文，大力宣传他们的学术观点，使得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之间，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简而言之，我对进入不惑之年的《学术研究》的观感和期望，就是：奖掖先进，提携后学。

重视友情而不唯关系

□ 吴承学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回想起来，我的可以称为学术研究论文的处女作就是在《学术研究》上发表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发表一篇论文已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十多年前，我硕士毕业，刚刚走上学术界，完全是“一棵无人知道的

架起学术交流的桥梁

□ 劳承万

(湛江师院中文系教授)

小草”，与任何学术刊物都无“关系”，发表论文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既然论文写出来了，我就寄给《学术研究》，但并不存多少希望。不过很快地收到编辑先生的来信，肯定论文的质量，同时也提出修改意见，不久这篇叫《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的论文就登出来了。（见《学术研究》1985年第6期）这是我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第一步，初战告捷，大喜过望，于是信心倍增。

从此我与《学术研究》一直保持密切的文字之交。有一点我是深有感触的，当我还是默默无闻的助教时，他们对我的稿件予以肯定和支持；后来我成为教授，有了一些学术影响和学术地位，与编辑也非常熟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宽对稿件的要求，他们还是以近乎“挑剔”的眼光来对待每一篇稿件，认真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决不含糊，甚至不留“情面”。所以我在与《学术研究》编辑的文字之交中，一直以他们为畏友。我觉得《学术研究》的用稿大体是以稿件的质量为标准的，他们不薄名家爱新人，重视与作者的友情而不唯关系。我以为这种编辑风尚在目前学术界、出版界显得十分可贵。

在《学术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我要对他们说一声谢谢。40年来，它扶植和培养了大批优秀学者。作为《学术研究》的作者和读者，是永怀感激之心的。如果说有什么希望的话，就是希望《学术研究》一如既往地多发表年青学者的论文，因为他们最需要支持，尽管他们还是默默无闻，但最有前途，作为学术刊物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举个例子来说，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这些论文多数是花几年时间才得以完成的。这是一个稿源的宝库，只要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优秀论文，数目就很可观了。目前多数研究生一毕业，论文也就扔在一边了，是否可以每年都到水平较高的学校、导师处了解一下，或让他们推荐优秀论文，从中加以选择出最精采部分发表。尤其是一些稿源不足的学科更有必要。

《学术研究》作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刊物，已走过40周年的艰难历程，作为老读者应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在外省读大学、教书近20年，1976年调返广东。在外省与《学术研究》接触的机会不多，不管是与编辑人员还是刊物都是如此。1988年在广州召开《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期间，《学术研究》的两位编辑访问了我，时间长达两个小时，我们之间围绕中国当代美学的未来走向和《文心雕龙》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开怀畅谈。在旁观者看来，一定以为我们是老朋友。当时两位编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为了编好刊物也为了突出刊物个性和学术的前沿性，不辞劳苦，艰辛创业（不久，该刊发表了我们之间关于中国现当代美学的未来走向的问答录）。从此之后，我与《学术研究》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使我深受感动的：

一、密切关心本省学术动向，大力支持本省学术新兴力量。近年我在湛江师院中文系主持系务工作，按照学院领导的指示，花大力气从国内引进了一批年青学者，他们朝气蓬勃，充满理想，有相当的学术棱角与锐气。但湛江地处广东边缘，交通不便，学术交流困难。《学术研究》目光锐利，给我们架起学术交流的桥梁，大力支持我们的学术研究。他们积极支持并协助过我们与暨南大学在湛江召开过全国性文艺学理论研讨会（1996年），为我们出版过这次会议的学术专刊（增刊），其中我系副教授李珺平的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且封面重点标题。会议前，该刊还赶发了对我个人的学术谈访录，以便促进这次会议的成功，并扩大其影响。会后，编辑先生又认真整理了他在会议期间的记录，发表了详细的报道，扩大了这次会议的良好影响。现在，我们这里的年青学者都把《学术研究》视作自己的刊物，有个别年青学者即使调到外省去了，但仍然

心怀南海之滨的《学术研究》。

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不管是从学术水平上还是从作者群网上看,该刊的方针都是非常明确的:不划小圈子,不内定作者名单,不以“老交情”发表平庸文章。打开每一期《学术研究》,看看文末标的作者单位真是“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高等学府、研究机构……既有名家,新手不绝。这种胸怀在当前实属难得。例如最近几期发表“博士导师谈访录”,便具有一手紧抓学术前沿,一手拓展“五湖四海”的“大同”意识,不苟限在省内,使省外学者、名家深为感动(每参加国内学术会,我常听到省外学者的这种称道)。

商潮滚滚,灵魂颤颤。只要坚持方针,21世纪的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也会再现南粤大地上。

言言不尽,是为祝贺。

容纳百川 活跃学术

□赵春晨

(广州师院历史系教授)

我是《学术研究》的一名热心读者。记得60年代我在北大读书时,就曾被《学术研究》上所刊登的一些理论文章所吸引,从此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研究室里做事,还是在学校教书,手边总离不开这份杂志。它所刊发的许多学术文章,曾经给我不少的启迪。几乎每期都有的“学术信息”、“学术综述”、“书评”、“广东学术新著”、“学者访谈录”等,都是我喜爱读的栏目,我得以从中了解到国内、特别是广东的最新学术信息和动态,获益匪浅。

80年代后期我来到广东工作后,由于地缘接近,同《学术研究》的关系更加密切,也开始从一名单纯的读者变成了读者兼投稿者。在多年的接触过程中,我又深感《学术研究》为学术工作者提供了一块很好的园地,尤其是它那种容纳百川、活跃学术的精神和气度,可以说造福于学林,造福于社会。记得《学术研究》创刊30周年时,编者曾以《在改革中前进》为题刊发卷前语,其中有一

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改革是个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时时可能有一些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从创刊以来就遵循的‘双百’方针,展开各种学术争鸣,广大学者将可以更广泛、更大胆地在这个阵地上驰骋,同样,广大实际工作者也可以在这里与学者们一道高谈纵论。我们不应向任何一个真理的探索者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误的苛求,正确对待社会科学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乃是探索真理、发现真理的必要条件。”(《学术研究》1988年第4期)反观近10年来《学术研究》的业绩,可以说是完全兑现了这个承诺。以我所熟悉的历史学为例,这10年中在《学术研究》上曾就历史学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如何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等)展开热烈的讨论,并且刊发了不少有关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广东地方史、港澳史、岭南文化史以及包括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叶剑英等在内的众多岭南历史人物的颇具新见的论文,在这些讨论和研究论文中学者们各抒己见,摆资料,讲道理,心平气和,相互交流和切磋,既没有“文革”前盛行的那种“戴帽子”、“打棍子”、以势压人的现象,又能够展开不同观点、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之间的争辩,从差异处求统一,从切磋中得真知,故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我的几篇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小文章,也是得益于杂志社的这种包容精神和开放气度,尽管所论不够成熟,甚或有歧于成说,但也得以刊出,使我增添了与同行交流切磋的机会,受益良多。

我相信,在这种容纳百川、活跃学术的精神和气度的伴随下,《学术研究》杂志在今后一定能够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为广大学术界人士和社会所欢迎。

造就新的学术传统

□殷国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广东社科联所办《学术研究》马上就走过40周年历程了。但是若论“刊到中年”，《学术研究》除了更加稳健踏实之外，给人的感觉是“越活越年轻”了。我和《学术研究》是同时代产物，而与其交往的10余年时间，又正值改革开放大潮在广东涌起，是广东经济和学术发展最辉煌的年代，所以颇感有缘有感。

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1985年当我刚到广东暨南大学任教的那一年，广东社会科学研究界正酝酿着突破旧格局，走向全中国的热情。《学术研究》在其中担负着重要角色。广东文学评论界在此时也是最兴奋的时刻。正是在《学术研究》同仁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下，广东不仅成立了“广东青年批评家协会”，而且出版了一本《广东文学批评新潮专号》，集合了当时一批有生气的批评家。如今当我们回顾80年代广东文学辉煌历程的时候，这仍然是令人难忘的一笔。当年意气风发的这群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了广东文化界的骨干。我相信这也是《学术研究》值得自豪的地方。在日后的日子里，虽然全国学术界的创新热情逐渐低落，但是《学术研究》始终怀抱着自己那种纯真的学术理想，在坎坷中不气馁，在低迷中不松劲，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品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我想，要办好一个学术刊物，就要有坚持自己独立性，坚决不顺俗的耐心和毅力。这一点，我在《学术研究》同仁编辑经常发现这种魅力。尤其在广东，学术研究处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展开，权力和金钱不断围绕着和诱惑着学术刊物的学术活动。对一个学术刊物来说，它既不能完全脱离时代的要求，同时又不能随俗媚俗，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确实是一种困难的面对和选择。这也就更需要办刊物的人有韧心，又有平常心。所谓韧心，就是坚持学术第一，品味第一，这也是自己的立身之本，需要长期坚持长期积累。所

谓平常心，就是不为急功近利所动，能够平淡对待方方面面对学术研究所造成的阻力和压力。如此，在《学术研究》倡导下，广东学术已开始形成一种朴实、宽容和创新的学风，进入切实持续发展时期，我衷心希望它能够在南中国起到学术支柱作用。

事实证明，一个学术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在学术研究中有远见卓识的学术刊物；而一个有如此能力的学术刊物，又离不开团结和聚集一群有学术功力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互相借重、水涨船高的局面。这样的情景将对整个南中国学术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关键作用，所以我期望着《学术研究》不仅能够继续容纳不同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充分竞争，而且更能够把全国第一流的学术成果吸引过来，造就广东新的开放的学术传统。

培育新学科的沃土

□黄锦奎

(深圳市南山区委副书记)

1992年底，我的关于价值转化论与价值转化工程的研究论文于《学术研究》正式发表后，引起了理论学术界、新闻界、企业及中央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文摘》、《新华社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中华英才》、《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新闻媒介均作了报道和介绍。拙著《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一书于1993年6月出版。《学术研究》杂志与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等单位联合发起举办“全国首届价值转化工程研讨会”。钱学森、于光远、童大林、张岱年、黄楠森等著名专家学者对拙著予以高度评价。我被全国不少省市邀请作价值转化工程学术报告，并被不少全国重点大学聘为价值转化论和价值转化工程的博士生导师课题指导老师和兼职教授。在有关领导关怀下，筹备成立中国价值转化工程学会。先后我被评为“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国家特殊津贴专家”，“广东

省十大杰出青年”，“深圳市杰出专家”，“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跨世纪优秀人才”，并被英国剑桥、美国名人传记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被广东省委选派赴梅州挂职任梅州市副市长。所有这些荣誉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学术研究》领导、编辑的指导、扶植和培养。

《学术研究》是培育新学科的沃土。没有这些有远见卓识的伯乐——编辑，慧眼识才，一种新理论、新学科的出现，要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和人的习惯思维，或触动某一学术权威的理论基础，破土而出，是相当困难的。历史上，有不少新发明、新发现、新创造，在付出不小代价之后才得以承认、发表。《学术研究》的领导、编辑为价值转化论和价值转化工程这门新学科耗费了不少心血。从发表论文前的改稿、编排到研讨会的精心组织，著名学者于光远、童大林评价文章专刊的刊发，专著的出版，学会的筹备，全国各地的价值转化工程研究活动，都离不开他们的指导和辛勤劳动。没有沃土，长不出新苗。在《学术研究》这块沃土上，破土而出的价值转化工程新学科正以迅猛成长势头，逐渐发育成熟。

在《学术研究》创办 40 周年之际，我衷心地感谢《学术研究》领导、编辑们，把我从一个业余理论工作者，培育成为一个学有所成的社会科学家。

祝愿《学术研究》这块培育新学科的沃土，为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鲜明特色：高层次切入实际

□ 黄振平

(肇庆市财政局局长)

我与《学术研究》有缘，原因在于：一方面，刊物“高层次切入实际”的办刊方针以及所形成的鲜明特色；另一方面，从实际工作的我却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可谓不谋而合。

记得在 80 年代中后期，我国改革开放

经过 10 年左右的实践，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解答。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学术研究》编辑部的同志，言谈中很自然就集中到现实热点问题。随后我又翻阅了他们赠送的刊物，内中有些文章竟然吸引了我。它既有学术理论性很强的著述，又有探讨改革开放实践中实际问题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于是，我成了《学术研究》的忠实读者，每期必读，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方面更是获益匪浅。

在随后与《学术研究》编辑部的交往中，我了解到他们要掌握现实动态的意图，于是，我就邀请他们到肇庆市高要县（今高要市，那时我在该县财政局工作）的企业作调查，实地了解当时企业的改革形势以及企业界对新的问题的思考和采取的对策。经过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有了感性认识，无疑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对刊物是有帮助的。

“高层次切入实际”是当今学术理论刊物的生命所在，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向学术理论领域提出新的要求和思路，从而推动学术理论向前发展。《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越办越活，越来越充满活力，不能不归因于其“高层次切入实际”的办刊宗旨。

“高层次切入实际”的办刊方针以及所形成的特色，不但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许。因此，《学术研究》连续几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首届全国社会科学期刊评奖提名奖和广东省第一、二届优秀期刊奖。据编辑部的同志说，省长卢瑞华专门拨出款项建立了《学术研究》出版基金，这在全国是首创的，足见省领导对该期刊的重视。

这几年，《学术研究》已从原有专门办刊的单一形式向参与、组织学术研讨活动的多元方向发展，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和活力。我作为《学术研究》的读者和受益者，也责无旁贷地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方便的条件和一尽绵薄之力。

如今，《学术研究》已 40 周岁了。孔子

说,四十而不惑,但愿《学术研究》在这不惑之年更加壮硕,取得更大的进步。

四十不惑

□ 龚唯平

(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

在人生的旅程中,年届四十,如日中天,既是生命最辉煌的时刻,又是由升到落的转折点。正是站在这生命弧线的最高点,既能回首看清楚过去艰辛攀登的脚印,品味出人生的真谛和社会的底蕴;又能昂首展望未来的前程,鼓起余勇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圣人作“四十不惑”的感慨。

人世间的凡夫俗子,总有一个由感到不惑的历程,做学术研究也是一样。初学之时,虽有先生不时指点解惑,然终究得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学有所成之时,又为功名感、为利禄感、更为变幻莫测的时势所惑。只有学术真正修炼到家、大彻大悟、超尘脱俗之时,方可进入不惑的境界。由此看来,治学是不能轻易说四十不惑的。

值《学术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编辑部约稿述回忆、谈感想或提建议,思考良久,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份学术刊物,是否也可以四十不惑呢?

办刊40年,应该说是一段不短的历史。但只要条件许可,一份期刊是一直可以办下去的,理论上很难确定刊物生命的终点。因此,办刊不可与人生简单相比拟,40周年绝不意味着由升到落的转折。

如果比拟的话,四十不惑,则意味着一份刊物进入了成熟阶段,有了自己独特的面貌、独特的风格和独特的品味,以及在读者心中确立不移的形象。作为读者和作者,我感觉《学术研究》开始进入“四十不惑”的境界,其独具的风采主要有三:

学术性。《学术研究》由沫若先生题写刊名,在国内众多期刊中是不多见的,特别是在政府要员题写刊名的世风之下,尤显卓尔不群。也许,这桩小事上就显出该刊的学术

特色。翻看近几年的刊物,跟风类急功近利之作甚少,可谓《学术研究》名副其实。

务实性。岭南学风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务实,少有故作高深的空谈,而善针砭时弊经世济民。作为广东最权威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学术研究》颇显这种岭南风范。

开拓性。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方热土率先探索、试验、展开与兴盛。得风气之先,广东理论研究界讨论的许多问题都颇为前卫,而《学术研究》则较好地反映了这个特点。

《学术研究》以辉煌的过去证明着自己存在的价值,无须我再奉上廉价的赞美。对于她的未来,我只想祝福一句:《学术研究》四十不惑!

我对《学术研究》高品位的 几点感受

□ 黎学玲

(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

《学术研究》创刊40年来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高品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编辑部同志质量意识的不断强化,刊物的高品位尤为鲜明、突出。从总体上看,我的感受主要有三点:

一是《学术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突出地抓住了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开设了专栏,并组织 and 策划各个学科栏目,尤其是广东的优长学科栏目尽可能投入。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等等,无一不是围绕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展开的。由于突出了这个主题,就自觉地把把握住了我们时代的伟大旗帜和时代的中心课题,使刊物的学术品位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是《学术研究》始终把保持学术的高品位作为刊物质量的核心内容来要求。无论在广东,还是在全国,《学术研究》可以说是名符其实地研究学术。她倡导研究新思想、新学科、扶植学术理论新秀,如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研究和“价值转化工程”新理论的支持。她善于抓住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点课题长期经营,推出精品力作。如对近代史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等等。她贯彻学术争鸣的方针,活跃学术风气,扶植省内优长、重点学科研究,使刊物成为广东研究哲学、经济学、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阵地。

三是《学术研究》始终坚持从较高理论层次上切入实践,打广东牌,创广东风格特色。在这方面编辑部的同志具有很强的特色意识和对新事物的敏锐性,注意把握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优势,引导学术界各个学科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如从广东实践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特区研究、珠江三角洲研究、港澳研究、岭南文化研究、新时期道德建设研究等等。她立足广东,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新世纪,既具有鲜明的广东学术

研究特色,又有十分浓厚的时代气息。

《学术研究》作为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是我们全省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共同的学术阵地。长期办刊实践中,从广东优长学科出发,策划选题,重点建设,出成果,出优秀作品,这是成功之经验。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广东不如经济学、哲学、史学等学科的根基那么深、那么活跃,但她同样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与生命力。加强法制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是党在新时期的治国方略,而广东又是在全国率先提出并认真实施依法治省的省分。但刊物反映的法学研究成果相当薄弱,与广东法学教育和法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依法治省的需要有明显的差距。编辑部的同志对此早就有所意识,希望在这一领域的选题,也能有所组织策划,有所重点经营,有所推进。

在庆祝《学术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她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发扬自己办刊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传统,继续坚持“以提高质量为中心,抓重点,扶精品”的正确的工作思路,更好地保持学术的高品位,更有效地活跃学术空气,全面推进广东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广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研究

□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课题组

一、基本估价

党的十四大后,广东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到1996年,即广东进入我国“九五”计划时期,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其依据有:

(一)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初步建立

广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把市场的培育与形成作为一个关键问题来抓。通过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基本形成了能够反映供求状况的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已在整个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1、市场价格已成为引导资源流动与配置的重要手段。广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目标要求,在成功地进行价格改革基础上,着力于建立市场价格新机制,使全省绝大多数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价格都实现了市场定价,各类生产资料也几乎全部通过市场调节价格。全省已基本建立了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和既放得开、又管得住的价格调控体系,形成了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企业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机制。

2、形成了一个以国有商业为主体,集体、私营与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开放型市场流通新格局。流通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广东在进行价格改革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搞活市场流通的改革措

施。改革了过去单一封闭的传统流通体制,打破了传统的“三固定”、“四级流转”的产品流通形式,允许绝大部分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打破了独家经营的传统购销体制,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加速城乡市场的发展,恢复、扩建和新建一大批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的批发和零售市场,培育和发展一批专业市场,为更多大范围的商品集散创造了条件。打破“划地为牢”的地区封锁,促进和发展横向经济联合,逐步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联合,有效地推动了商品市场的流通,推动和促进了市场的形成。

3、基本形成了一个包括资本、人才、劳动、技术、信息、房地产以至企业产权在内的多种要素市场。多种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建立,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一直比较重视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先后组建了广东发展银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粤财信托投资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建立了融资中心和短期资金拆借市场,还引进了100多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八五”以来,我省金融市场已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融资渠道多,融资手段和方式灵活。

在证券市场方面,1991年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1993年成立的南方证券交易中心,使广东证券市场获得了迅猛发展。我省证券市场近年来发行了A股、B股、H股、各类债券、认股权证、基金、组合受益券

等 30 余个品种。我省目前已有证券经营机构 300 多家,证券经营网点遍布大中城市的每个角落甚至县镇。全省目前参与上市股票投资的人数将近 300 万人。全省许多地方如广州、深圳、汕头、韶关等市,建立起了产权交易中心。可以说,广东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已初具规模。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广东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现在劳动者已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跨地区、跨城乡、跨所有制流动,自主择业。通过市场实现竞争就业已成为劳动者就业的主导形式。同时,我省还注重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目前,全省已基本形成了由政府部门举办的、职业介绍机构为主体、社会职业介绍机构为补充的、覆盖全省城乡的职业介绍网络。

在技术市场方面,广东技术市场日益活跃。从 80 年代初的第一个技术合同开始,广东大力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承包、技术转让、技术引进和输出等各种技术贸易活动,开拓技术市场。到目前为止,广东从海内外大量引进高新技术成果和科技人才,全国共有 100 多个部属研究院、近百所高校在广东兴办高新技术科研生产联合体,约 10 万科技人员南下广东。“八五”期间,广东通过技术市场渠道转化的技术成果达 49272 项,投入技术资金 70.92 亿元。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广东房地产市场已初具规模。从 1992 年开始,房地产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大批海内外投资者涌入珠江三角洲及沿海一带,寻找投资机会。广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发展包括房地产在内的第三产业,使房地产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目前,随着广东房地产市场日趋活跃,一个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转让、租赁、抵押、估价、咨询、中介服务、物业管理等内容的房地产市场已基本形成。

(二) 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着眼于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广东的企业改革逐步由政策调整转到

以理顺产权关系为主的制度创新,重点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塑造合格市场主体,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重要进展。

1、企业股份制改造逐步规范与完善。从 1983 年深圳宝安开始股份制试点,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以来,广东一直比较重视企业股份制改造。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广东的股份制进入大面积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我省的股份制公司已有 581 户,其中上市公司 100 户,约占国内上市公司总数的 15%。《公司法》颁布以后,我省在积极推动企业实行公司制改组的同时,着力促进现有的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2、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有效推进市场主体的形式。1994 年以来,广东开始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有效地推进了广东市场主体的积极形成。一是确立了企业的投资主体;二是调整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三是建立健全了企业产权的法人治理结构;四是减轻了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五是推动了企业产权的合理流动与重组;六是企业内部改革进一步深化。

3、抓大放小,调整结构,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在“抓大”方面,省政府在 1996 年 6 月确立了 70 家企业集团作为我省第一批重点扶持对象,并出台了十条扶持政策,促进它们在 2000 年前发展成为销售额达到 30—100 亿元,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集科、工、贸、金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不少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团在近几年里兼并、收购、联合、托管了一批劣势企业,使产品结构得到优化,资产迅速扩张,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在本行业的地位明显增强,同时优化了行业结构。这些大企业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的骨干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力。在“放小”方面,广东提出了联合、兼并、收购、破产、易地改造、股份合作制等多种转制形式,制定了《关于加快我省小企业改革的意见》,争取再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小企业转制。可以说,小企业改革是广东近几年各项改革中行动最快、收效最大的一项改革。

(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从本省的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目前,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竞争格局已基本形成:

一是国有经济的质量和集约化程度提高,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广东国有经济的资产总量在社会总资产中仍占优势。

二是集体经济日趋活跃,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迅速。广东集体企业的工业总产值1996年达到1605.53亿元,占全省的25%,不少集体企业的经营规模、技术水平和出口创汇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三是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勃勃生机。由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三资”企业构成的非公有制经济,在近几年发展迅速,对全省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四)走共同富裕道路,初步形成一个体现多劳多得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多种形式的收入分配制度

围绕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广东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不断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类型的分配形式,企业全面推行工资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分配制度,并在全社会鼓励、支持劳动者按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能力先富起来。同时,政府通过税收杠杆,调节个人较高收入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形成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二是通过“几条腿走路”的方式,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即全省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和职工失业、工伤及女工生育保险制度。这一社会保险框架的建立,有效地保障了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大局的稳定。

三是通过加大扶贫力度,利用沿海地区领先发展所积累的经济实力,挂钩扶持50个山区县特别是16个特困县。近年来,省内各方面累计投入资金240多亿元,使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1996年与1985年相比,50个山区县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

(五)转变政府职能,初步建立起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

广东通过简政放权、机构改革,实施政资、政企和政事分开,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已得到初步转变。省政府各部门从过去主要抓直接管理、部门管理转移到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强化了宏观规划与调控、经济发展等职能;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实行政企分开,还权于企业,实现由注重部门管理转向注重行业管理,由单纯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与此同时,在机构改革、分税制的基础上,省政府通过制定宏观规划、产业政策、经济法规和设立专项调节基金等手段,加强了对全省经济和区域发展的调控。到目前为止,全省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产权在内的市场体系发育比较充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日益巩固,价值规律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建设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和巨大的促进作用。

(六)坚持依法治省,初步建立起法制监督体系

依法治省是建设地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广东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就,地方法制监督体系的建设功不可没。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从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确认,到市场行为与秩序的规范,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地方法制的建设、健全与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立法试验区”权力,在贯彻执行统一的国家法制的同时,地方经济法规建设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努力。至1996年底,全省共制定法规300多项,对地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着更直接、更及时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立遇到较多困难,离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探索,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不能不客观地承认,自进入以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为主的攻坚阶段以来,由于难度较大,配套改革条件不足,全省的改革进程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趋缓的迹象。这主要表现在经济体制转型方面,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其改革仍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加上宏观调控所附带的一些制约,相当部分企业生产不景气,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职工收入相应减少;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尚不健全,企业资产重组机制难以普遍建立起来,产权的界定与管理,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有一定的难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亦遇到合理提高保障水平与经济能力较低的矛盾;银行商业化进展缓慢;要素市场的“二元化”,使市场体系难以获得健康的发育;即使近些年来重点治理的通胀、农业、产业结构等问题,也同样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政府职能未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已成为总体经济不断出现波动的重要原因。总之,就目前广东全省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而言,离建立统一、完善、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改革不到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从整体上来讲尚未完成

现代企业制度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现代市场经济一同发展起来的,它体现了经济发展对市场主体的客观要求,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明晰应该包括企业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方面在相关的经济主体之间有明确的和规范的分割。产权明晰以后,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企业则拥有包括国

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也应该承担起自己各方面应负的责任。现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比较多。有些企业产权不明晰,产权主体不明确。企业的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各种不规范的收费和摊派,增加企业负担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政企分开和政资分离的任务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尚未完成。就效益较好的企业而言,企业要求获得独立的法人财产权,而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主管部门有些则出于对部门利益的考虑,在政企分开、政资分离方面表现被动。一些企业本身管理不善、效益低下,使包括国家在内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这些情况表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远未完成。至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形成一批在国际市场有较强竞争力且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关系,企业在不同产业中的合理分布,使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的转变,其差距也非常明显。

(二)市场发育不平衡,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配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任务尚未完成

应当看到,在市场体系内部,在消费品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的同时,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金融市场、产权市场、保险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和信息市场等发育相对迟缓。不同地区市场成熟程度差异明显,特别是农村市场的发育在有些地区还严重地阻碍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以及这种衔接的规范化发展,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差距。

(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形成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进展也不平衡

在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方面,一些地区的一些部门在改革开放中缺乏“把自己摆

进去”的明确认识,狭隘部门利益的眼界阻碍着改革的深入。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行政部门行为不规范,收费不规范,行政部门直接经营企业与民争利等问题尚需进一步解决。这种情况当然会阻碍行政部门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来设计和改变自己的职责范围和行为方式。

(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待完善

必须看到,在收入分配方面不规范的现象相当严重,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同时一部分贫困地区还只是刚刚摆脱贫困。国家税收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一些高收入者的财富未能得到既有利于他本人,又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合理的利用。这些现象表明,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还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此外,在收入分配制度上的认识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五)与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最后形成

尽管广东在社会保障改革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应当看到,全省范围内的社会保障覆盖面相对狭小,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社会保障的实力相对不足。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较早的地区,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可以认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滞后,一方面使国有企业负担加重,在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制约了企业改革的顺利发展。

三、广东推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理论思考

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立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理论课题,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所碰到的许多问题都与

理论上的研究滞后或不成熟密切相关。根据广东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设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为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培育和完善,广东必须重点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加强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研究

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立和完善,虽然可以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进行摸索,但更有赖于对这种框架本身的研究和认识。只有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本身有了深刻、透彻的研究和认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设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

从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至今,我省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的进程只有五年的时间。五年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不少进展和成果,但由于市场经济建设是我国经济体制的一项整体性大转型,再加上新旧观念并存、新旧体制双轨并行这种特殊的起步环境。因而时至今日,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本身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模糊或混乱之处,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研究。从全省的情况看,实践中遇到的较为集中和突出的问题有:

1、市场经济观念。经济观念对于经济模式的选择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只有摆脱旧的经济观念的束缚,更新观念,才能使新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经济模式建构进程中,只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观念,才能使特定经济模式的运行具有良好的精神动力。目前,就全省的情况来看,在对于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等问题上,已有较一致的认识。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发展,应形成怎样的市场意识和市场伦理,以促进市场经济框架的建构和发展,却并不那么一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更新观念。但是,更新什么样的观念?拿什么样的观念来进行更新?这就是我们必须及时、认真进行探讨和回答的。

2、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商品经济的细胞是企业。而企业则是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下从事

生产、贸易、运输等经济活动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营利性经济组织。这说明企业乃是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主体。虽然我省经过了十几年经济体制改革,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扮演市场主体这一角色上是不合格或不成熟的。因此,如何积极而富有成效地推进企业制度的改革和重构,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仍然是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时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3、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究竟应由哪些基本体系来构成?自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以来,我们对此也作了许多研究和探索,诸如认为市场体系包括工业消费品市场、农副产品市场、期货市场、金融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市场要素和市场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因而要求我们必须不懈地进行动态性的研究和总结。

4、市场经济的内部运行机制。目前,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大多数人只知道它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经济,由于市场的灵敏、平等竞争等特点而使各种经济资源得以更有效、更合理地配置。然而,如果我们作深一层分析,即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本身的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方式进行深究时,许多又不得而知了。应该说,我们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进程中所存在的许多混乱和碰到的许多难题,是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内部运行机制缺乏深入而充分的研究相关的。

(二)加强对市场经济框架外部配套机制的研究

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各个要素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任何一个要素要正常运行,除了内部要建立各种相关机制外,还必须有各种外部因素和机制的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所要求的外部配套机制是复杂的。从广东的情况来看目前,较为迫切的需要研究

的问题有:

1、社会观念的整体转型。经济作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其转型迟早要使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发生整体性的变革。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转型又反过来强化或促进经济生活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在众多的社会发展层面中,社会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层面。受我国2000多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建国以来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应该说,我们的许多社会观念,包括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历史观等,都是有悖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因此,以市场经济观念的建立为基础,搞好对各种社会观念的研究和更新工作,使各种社会观念从整体上转换到适应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2、政府职能的转变。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实行的是“政企合一”模式。企业的整个生产和经营情况完全受国家和政府的计划指令支配,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发展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主体,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的政府在经济职能的实现和管理方式上来一个转换。在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之后,政府理所当然要扮演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角色。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政府则是管理主体。政府的这种管理主体作用又不能以直接干预企业的方式来进行,而只能采取以“服务型”为主的间接方式来进行。这就是说,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广泛地包括政府管理权限、政府管理方式以及政府管理能力等方面的转变,核心是管理权限的转变,目的则是管理能力的提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必须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的进程中,深化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在动态环境中不断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规范。

3、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建立和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再分配功能,逐步做到各种不同所有制、各类不同用工制度的劳动者,都参加社会保险,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及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有效地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制。为此,必须搞好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和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在一种较为“轻松”的环境中进行。

4、法制体系的建设。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因此它的建立客观上要求建立和形成有关的法律体系来作保障。市场经济建设所要求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经济法规,如公司法、私营企业法、银行法、保险法、税法等等;行政法规,如组织法、行政法等;一般法,如宪法、民法、刑法等。应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需要的法制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是喜人的。但由于我国长期的“人治”传统的影响和积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仍普遍存在。因此,必须深入开展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为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三)加强对两个文明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

在推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同时要着重解决好两个文明协同发展的机制问题。具体而言,要着重加强对以下几个课题的研究和总结:

1、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现代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经济行为与文化行为正出现一体化的趋势。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被广泛产业化和市场化,现代文化力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商品经济中所渗透、积淀的文化含量已越来越高。特别是在社会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增长既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从深层次上加强对经

济生活中的文化作用、文化含量、文化责任,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的产业化和市场化途径、方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模式课题的研究和总结。

2、市场经济、经济增长与人的素质、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当前,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的重心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立和完善,同时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心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同时有效地促进科技水平的提高。从根本意义上来看,这既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点,又是彼此相关、密切相联的。因此,加强对它们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研究,将能有效地揭示两个文明之间的协同发展机理,从而促进两个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

3、廉政勤政建设。廉政、勤政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键之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由、平等、竞争的法制经济,客观上要求有公正的政治环境作保障;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牵涉到每个人的社会系统工程,也要求有廉洁奉公的政治行为作引导。因此,积极加强对廉政、勤政建设的研究和探讨,将既有利于物质文明的建设,也有利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本课题组成员:

组长:吴奕新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 博士
成员:李新家 省社科院副院长 研究员
马壮昌 省体改委研究室主任 博士
李惠武 省府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
张富强 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 博士
徐乐雄 广东行政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硕士

责任编辑:韦 前

提高广东工业素质：问题与对策

□ 黄德鸿 张 南

一

工业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顾名思义,它强调的是工业发展的质的方面的特征,包括工业结构状况、工业组织方式、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企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及经营管理水平等。一般而言,一个地区工业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其工业生产的效率及其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我们认为,当前广东工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要迅速地提高其工业素质,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产业的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含量化和高附加值化,提高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些变化往往很难通过产业间的某种确定的比例关系来衡量,所以,在广东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中,我们必须跳出围绕着一些比例关系打转转的思维定势,而着眼于市场的竞争与机遇,着眼于企业适应市场变化并赢得市场的能力。这是由当前国内外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特点、广东工业结构演化的趋势和现状、产业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从市场供求形势看,不仅在国际市场上,低技术含量、低加工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遇到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市场空间相对缩小;而且,在国内市场上这类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市场发生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深刻变化,并伴随着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不对称。凡是国内能生产制造或装配的产品都供大于求,生产能力过剩情况严重;但较高水平的加工产品,特别是技术含量要求较高的资本品,生产能力仍十分欠缺,要靠进口解决。目前,国内2/5的机电产

品市场被外商占领,数控机床、某些专用成套设备、集成电路、片式元器件等产品多数国内还不能制造或质量不过关,通信设备和电子计算机等也以组装为主。原材料工业也类似,普通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等“大路货”供过于求,但需特别加工处理的高附加值或高技术含量品种则缺口较大,依赖进口。可见,国内市场已从计划经济时的全面短缺转变为结构性短缺,各行业普遍紧缺的是高质量档次、高技术含量、高加工度的产品品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工业结构调整,必须注重工业素质的提高,否则,若仍只是简单的重复,片面追求产业产值的比例结构,只会使当前短缺与滞存并存的失衡格局进一步加深,企业市场和产品积压的状况也将更加恶化。

其次,从广东工业结构发展演化的进程和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顺应市场需求热点的变化,先后重点发展了轻纺消费品工业、家庭耐用消费品工业、基础原材料工业和基础设施,由此扭转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轻重比例的结构失衡状况,并使80年代以来加工工业过度膨胀与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瓶颈”严重的矛盾得到相对缓解。可以认为,在这十几年中,广东工业结构调整的着眼点在实现结构的协调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此同时也使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和紧迫,成为当前结构调整的中心任务。例如,在产品结构上,广东的录音机、音响、电饭锅、微电脑、手表等产品产量均占全国的80%以上,电风扇、电话机、空调器、彩电、塑料制品等产量占全国50%—80%,饮料、冰箱、自行车、程控交换机等产量也占全国的20%—50%。但其中一般的中低档产品多,高档名牌产品少;资源和劳动密集

型、高能耗物耗的产品多,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品少;引进仿制的产品多,自主创新开发的产品少。这使“广货”在全国市场上正逐渐失去其往日的光彩。在企业组织结构上,80年代,广东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经济新观念的较早确立,为一批企业集团的发育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树立了我国发展企业集团的一种成功模式。然而,进入90年代,由于受行政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等制约,广东企业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却落后了。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专,企业间缺乏分工协作的问题在各行业普遍存在,由此限制了企业追求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益的能力。一些大企业已出现主导产品竞争地位不断下降的势头,经营实力难以迅速增强。1995年珠江三角洲大型企业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仅为30.2%,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3.6个百分点。再看产业技术结构,形势也不容乐观。据1995年6月省科技情报所对10个主要行业63种重点产品的调查,广东工业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达到国际90年代初水平的不多,占15%左右,近70%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水平;产品的生产技术设备和工艺水平达到国际90年代初水平的不到10%,而70年代中期以前的还有约20%。更严重的是,企业基本上是靠引进技术设备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却很不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开发。1978—1989年间全省引进价值10万多元以上的生产线有近千条,消化吸收和创新率不到3%,结果很快就又与国外先进水平拉大了差距,与兄弟省市相比,原有的技术优势也逐步丧失。

由此可见,从广东工业结构演化的趋势和现状看,当务之急是要优化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和结构,提高工业素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第三,从当今世界产业技术的发展趋势看,新技术革命已进入实用阶段,给产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它使投入对增长的贡献减小,而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增大。美、日、德的要素贡献率已分别达到50%、59%和87%。而在投入结构中,以人

工合成材料和信息作为生产投入的趋势在不断增强。因此,技术创新能力和研究开发、人员素质、信息系统以及组织激励等因素在竞争中的意义越来越重大,而以资源的拥有或低成本参与竞争的优势正在丧失。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正改变着传统产业的面貌。例如汽车和建筑业是能将当今在新材料、电子、机械、仪器仪表、化工、计算机等领域中的最新成果集中运用的行业,即使像纺织、食品这样的传统行业,也可能因材料技术或生物技术上的新突破而实现新的飞跃。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曾指出,21世纪持久不衰的竞争优势将主要来自于新的加工技术,而不是新产品技术。过去发明新产品是首要目的,如今已退居其次,而发明和完善新的加工过程成为首要目标。^①新技术革命就为改进已有产业、产品的加工技术、创新工艺流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巨大的空间。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赶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大力开发和吸收运用新技术成果来改造更新现有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在新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从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看,二战后,国际分工已从产业间分工为主转为产业内分工为主,具体表现为生产工艺间的专业化分工,不同型号、规格或不同技术质量档次产品间的分工,以及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生产的分工。总体上看,国际分工已不单是劳动分工,更重要的是技术分工。那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将从中获取大部分的比较利益和高得多的利润率,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及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地位进一步削弱。由此,广东在结构调整时,一方面,要注意充分利用国家或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不必过于追求建立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而应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同时注意不要拘泥于静态的比较优势格局,停步于凭借劳动力或资源优势来参与分工,而要从研究开发、产品设计、技术改造或市场营销、规模效应等方面着手,培养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在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综上所述,当前广东工业调整的关键是

提高工业素质,推进产业的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含量化和高附加值化。

二

我们认为,从广东工业结构的现状出发,要实现结构调整目标,迅速提高广东工业素质,应遵循以下思路:以发展大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调整为中心,大力推动产业重组,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并充分发挥大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效益,增强企业集团的技术进步功能、组织协调功能、市场营销功能和融资扩张功能等,以此创造一批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较高知名度的拳头产品,并推动一批高素质的支柱产业的形成。虽然这一思路的最终落足点也是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一批支柱产业、组建一批企业集团和开发一批名牌产品”的“三个一批”战略目标,但它改变了以往由政府先确定支柱产业,选定龙头产品,给予重点扶持,并根据有关产业和产品的发展要求相应地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的思路;而是首先将培育壮大企业集团作为突破口,并使之真正担当起结构调整主体的角色。它要求通过健全这一主体的功能,完善其利益和制约机制,促使企业主动、自觉地把握市场的竞争与机遇,推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以下就这一思路做几点说明。

其一,通过产业重组来推进结构调整是基于广东产业现状的现实选择,我们知道,提高工业素质的核心是要加速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其技术构成。对于后进国家的企业而言,技术进步的快慢往往取决于有没有能力进行较集中的资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而其从引进技术中能获益多少,则最终取决于企业吸收消化和革新开发的能力。此外,规模效益和市场营销开拓能力以及经营中的抗风险能力也很重要。一般而言,大企业集团在这些方面均占有优势,所以,推动企业集团化是后进国家或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加速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日本、韩国在这方面已有很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就广东的实际情况而言,其在过去十几

年里已初步形成了一批经营能力较强、达到一定规模的大企业(集团);一批有头脑、有魄力、有经验的企业家也应运而生,逐步成熟起来;同时,广东还发展了一批包括食品、服装、医药、家电、电子、建材等优势产业,不论产品产量还是生产技术水平都在全国居于前列,虽然缺少“单打冠军”,但总体实力还可以。这都是其实行产业重组的有利条件。总之,我们强调通过重组来激活和优化产业中的资产存量,引导其实现更合理有效的配置,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有增量的投入用于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等,但增量调整的原则是促进、深化存量的优化重组。如果不注意这一点,片面强调新上一些重化工业项目来推动广东的产业升级,则很可能又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怪圈,将来产品既上不了规模,又上不了档次,项目开工之日便是亏损开始之时。

其二,要正确发挥政府在产业重组中的作用。组建和发展大企业集团,实现产业的合理重组,要以企业的自主行为为原则,但政府也须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于企业,具有两重身分。一方面,它作为社会经济的综合管理者,要致力于社会稳定和公平,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基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企业的各种社会包袱仍很重,同时企业的扩张发展还时常受到各种条块限制,这就更需要政府切实地从政策措施上帮助企业卸减历史包袱、解除行政束缚,保障企业有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某种意义上说,当前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实质上就是不同地区政府或行业管理部门之间利益的协调与重组,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不攻克这一难关,产业重组就难以顺利推行。目前,广东已成立了由省领导牵头的有关产业重组的协调小组。但关键是要在本省政策职能范围内,充分利用国家的有关政策措施,切实为产业重组扫清体制障碍、提供引导和激励。另一方面,政府作为许多企业的出资者代表,必须采取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行使相应的对企业的监控权和剩余索取权。广东可进一步试点发展综合性或行业性的投资控股公司,赋予其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职能,推动

产业的重组和大集团的发展。在这方面,可考虑借鉴“中策模式”的机制。即可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组建上述投资控股公司,而不一定采用国有独资公司形式以确保公司有较合理的内部经营机制;同时可在政策上为这些公司创造宽松灵活的环境,甚至可参照对外资企业的一些政策,以减少其在进行重组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总之,在考虑政府在产业重组中的作用时,不仅要强调政企分开,也要将其作为社会行政管理者和国家出资者代表的职能分开。

其三,以金融政策推动产业重组。由上述可见,政府在财税政策和有关行业和地区经济管理体制中的改革对于产业重组的顺利进行十分必要。然而,金融政策也将为直接推动这一轮结构调整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将更有效地扩大产业重组中所需增量资金的来源,并通过金融市场的评价和检验机制以及信息创造和交换机制,引导资金流向更高效、更有发展前途的产业或企业;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也将为存量资产的转移提供更灵活多样的渠道和更强的激励。从广东省看,在政策措施上,首先,要促进新的投资融资观念的树立,鼓励企业通过市场直接融资,或利用包括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和证券信用等多种信用形式融资,这将使企业受到更多更直接的风险约束,从而增强其竞争精神。其次,推动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发育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家逐步扩大和放开资本市场的机遇,推动重点企业上市并利用资本市场展开购并重组等活动;另一方面,要主动积

极地引导、规范省内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以合并、收购、托管、租赁、承包、拍卖、转让等多种形式推动资产的合理流动。第三,大力推动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并在国有、集体(合作)、外资、股份制等多种性质的银行间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格局,以此促进银行加强贷款风险管理,提高授信质量;同时进一步完善主办行制度,鼓励银团贷款,使真正有潜力的产业或企业能得到更集中的投入。最后,以地方财政拨款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为来源,设立产业重组专项资金,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进步。要确保专项资金的经营管理符合财务健全原则,抓好项目审批和跟踪管理,努力减少坏帐风险,使之能起到相当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导向和引流作用,吸引大批社会资金流向结构重组和产业升级。

十五大的召开,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宽了思路。广东应凭借东风,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争取早日使广东的工业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①引自广东省经委“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

作者黄德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企管系教授(510632);张南,广东省经委工业处博士(510030)

责任编辑:谭湛明

多级委托代理关系

与国有企业改革

□ 张政军

国有企业的改革到现在已经暴露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产权制度改革现在仍然应该是企业改革的核心。遵循着这种思路,本文将从委托代理角度对国有企业的现状及改革途径作一定程度的探索。但中西方体制背景的巨大差异告诉我们,必须对中西方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进行全面的对比,同时要加强对委托代理关系中主体行为的剖析。

一、委托代理关系在不同体制下的比较

广义的委托代理关系泛指代理人经委托人同意而代表委托人行使某些权利的关系。而狭义的委托代理关系则是指现代股份企业中股东(委托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它可能是正式的合约,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合约。具体地讲,经营者作为代理人由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授予合约中规定的权利而拥有控制权,而在合约中没有指明的

权利则作为剩余索取权归委托人所有(格罗斯曼与哈特,中译文,1996)。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后,可产生代理收益,包括分工效果和规模效果,前者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拥有不同禀赋的经济主体通过分工而各自获得超额收益,后者是指经济主体随所参与的经济活动规模的增大而获得的边际效用的增加大于其边际规模的增大。

现实中的代理人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人,其目标函数常常与委托人利益不相一致,加上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采取“偷懒”或其它影响组织效率的机会主义行为来满足自我目标;逆向选择是指委托人无法识别代理人的真实禀赋,条件低劣的潜在代理人占据了经营者岗位。这两者都会大大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但可以认为这是为了获得代理收益所必须付出的费用。我们权且将在无监督但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情况下,使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决策与由代理人作出决策之价值差异称为“代理成本 I”。委托人为了降低代理成本 I,就必须试图订立尽可能详细的合约和获取关于代理人的禀赋和努力程度的足够的信息来监督代理人,委托人的这些努力也是要付出费用的,即监督成本;同时潜在的代理人为了成为真正的代理人,要付出一定的担保成本,即代理人用以保证不采取损害委托人行为的成本,以及如果采取了那种活动将给予赔偿的成本;尽管付出的监督成本和担保成本,但是代理人决策与委托人在假定具有代理人相同信息和才能情况下的自行决策之间的差异还是难以彻底消除,这个差异我们称之为剩余损失。为了降低代理成本 I 而必须付出的监督成本、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组成了代理成本 II(詹森和麦克林,转引自费方域,1996)。显而易见,代理成本 II 应低于代理成本 I。代理成本 II 的降低可以通过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的最优化以及企业的外部在经理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上的充分竞争而有效地实现。

一般地,评价一项代理合约存在的合理

性在于看代理收益是否大于代理成本(指代理成本Ⅱ)。只有当前者大于后者时,代理合约才是有价值的。

特殊体制背景下的西方委托代理关系有以下特点:(1)西方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所有权基础是私有制;(2)委托代理关系是建立在自愿性契约基础上的;(3)委托代理关系是单极的,即从股东到经理;(4)委托人的剩余索取权(股权)极为分散;(5)委托人是风险中性者,不存在偷懒动机,即具有监督代理人行为的积极性;(6)剩余索取权是可以转让的,委托人“用脚投票”,来惩罚代理人的违约行为是可信的。

公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关系与西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有很大的不同,表现为两大等级体系;第一等级体系是从初始委托人(全民)到中央政府的自上而下的多级授权链,即公共产权由国家来代理,成为国有产权,国有产权又由政府来代理;第二等级体系是从中央政府到最终代理人(企业内部成员)的自上而下的多级授权链(张维迎,1995)。政府是两大等级体系中的特殊的局中人,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初始委托人的代理人,又是最终代理人的委托人。这种双重代理体系有如下特征:

第一,国家作为代理人与一般代理人所拥有的权利有很大差异,一般代理人只拥有财产的控制权,而不拥有剩余财产的索取权,而国家同时拥有公共财产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两权是合二为一的,没有所谓的“两权分离”,初始委托人通过国家的再分配渠道获得剩余。

第二,国家代理不是以自由选择的合约为基础,而是以国家政权为依托,无须直接获得每一个初始委托人的授权,就可以直接通过颁布法令而获得代理权。因此,这是一种建立在行政权基础上的强制性代理关系。

第三,剩余索取权十分集中,归属国家,由政府代理。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一起遵循着等级制配制给各级政府(杨瑞龙,1995)。剩余索取权同时也是具有不可转让性的,因为一旦剩余索取权具有可转让性,国家就会失去对公共产权的代理权。可以说剩余索取

权的可转让性与政府拥有剩余索取权是相冲突的。

第四,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监督能力都很弱。委托人和代理人具有信息的非对称性,为监督代理人的行为,初始委托人必须付出监督成本,但他们不是剩余索取权的直接拥有者,不能直接地从他们的监督活动中收益,这表明监督活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从而导致初始委托人缺乏监督动机。即使初始委托人具有监督积极性,但由于国家对公共产权的代理不是通过初始委托人的直接授权,而是依据国家政权强制性获得,所以初始委托人不能选择代理人和合约内容;同时由于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没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来惩罚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五,作为初始委托人的代理人与最终代理人的委托人双重身分的政府,并不是单独追逐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它综合地有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社会目标,而且同时也在努力使其垄断租金实现最大化。即政府在追求“全局利益”的同时,还在追求其他“局部利益”,如政府权力及相关的物质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其他集团利益、个人升迁机会、政府受拥护程度和政局的稳定等等。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焦点集中在理顺第二等级体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下文我们将第二等级体系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之政府视为多级代理关系的初始委托人。

二、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分析

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思路是: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建立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即由国家成立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面成立若干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由这些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充当国家的代理股东来行使委托人的职能。这样,国家作为初始委任人就拥有了剩余索取权,承担起有限责任,而企业经营者作为代理人拥有法人财产权,从而就在产权国有的框架内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对这种思路的看法应通过考察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的运作机制加以进行。

我们知道,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的运作是有效率的,这仅从最近几十年股份公司的迅猛发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其有效率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委托人具有监督代理人的积极性,监督动机来源于委托人拥有剩余索取权(阿尔钦与登姆塞茨,1994),并且委托人同时也是“投票风险”的承担者。(2)委托人有使监督成本最小化和代理收益与代理成本之差最大化的倾向。(3)银行作为债权人行使“相机控制”(contingent control)功能(钱颖一,1996)。也就是说,控制权是转移的,如果企业付出债务,企业的控制权就在股东(实际上在经理)手中;但如果付不出债务,这时控制权就会依法自动转移到债权人(即银行)手中。(4)企业外部经理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是有效竞争的。显然,这四个方面是委托代理关系得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关键。

然而,我国国有经济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的体制背景及特点与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的体制背景和特点有着巨大的差异,表明我国的国有资产委托代理经营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遵循着委托代理关系有效运作的关键之处,我们分析,国有资产委托代理经营中会存在以下六方面的问题。

第一,监督积极性低的问题。尽管国家拥有剩余索取权,但是代表国家行使委托人监督职能的是作为自然人的政府官员,他们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这即是说,监督努力程度与其收入水平无关,因此存在疏于监督,放纵经营者(代理人)的偷懒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问题。

第二,监督可靠性差的问题。委托代理关系中投票权应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即拥有剩余索取权的风险承担者应享有投票权,同时享有投票权的人应该承担风险。在国有资产委托代理经营中,代表国家行使委托人职责的政府官员并不真正承担风险,却拥有着选择和监督经营者的投票权,引致“廉价投票权”现象。这表明在代表初始委托人行使委托人职责的投票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如盲目投票、寻租行为等),以及经营者选择机制中的“逆向选择”问题的长期存在。

第三,政企不分及代理人的积极性低的问题。企业的剩余索取权集中归属于国家,由政府代为行使所有权与控制权。有着社会目标及局部利益目标的政府一定不会仅以盈利目标来监督企业经营者,必定会要求企业遵循社会偏好和政府偏好的双重约束规则。而且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政府往往是最大的股东,企业仅在生产领域、销售和库存方面享有自主权,而无权自主地处置企业资产,企业产权难以通过国家股转让和股权分散方式独立化。政企不分与企业内部人积极性不高仍然是现实中的现象。

第四,代理成本高昂的问题。建立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代理层次越多,积累性的信息损失就越大,监督费用就会升高,监督积极性同时也有衰减的倾向。这样,越是处于下层的代理人就越有可能利用非对称信息,隐藏利益,报亏不报盈,以损害委托人利益来求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结果就是,代理成本Ⅱ高居不下,可能超过代理成本Ⅰ,甚至可能大于代理收益,导致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在经济上严重不合理性。

第五,银行缺少“相机控制”功能的问题。国有专业银行是金融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其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所有其它非金融部门。人所共知,中国的专业银行更多地是服从于行政领导,更多地是依靠行政手段来分配信贷。企业经营糟糕到不能还本付息时,银行仍然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动力去接管企业,对企业进行重组。也就是说银行是没有“相机控制”功能的。这进一步导致企业破产出现的不可能性,以及出现企业的“投资过热”和“钓鱼工程”等种种现象(平新乔、蒋国荣,1995)。

第六,外部市场的非有效竞争的问题。企业外部的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可以对企业经营者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监督作用,最大限度地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出现,起到迫使企业经营者与剩余索取者利益一致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的过渡经济中,这些市场虽然在培育之中,但由于政企不分以及其它种种原因,

经理市场和资本市场还远远没有成熟,对于企业治理结构的规范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国有资产委托代理的关系面临着三大矛盾:一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的非人格化的资本行为与要求企业以盈利为目标来经营国有资产之间的矛盾;二是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确立排他性的法人财产权之间的矛盾;三是银行的低度市场化行为与要求银行发挥“相机控制”功能之间的矛盾。这是阻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原因。

现实中,为了解决调动企业内部人积极性和实现政企分开目标的两大难题,采取了一系列的作法:如让企业内部人分享剩余索取权;国家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委托人(地方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盈利目标相一致;由多家企业出资,建立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不直接归属与政府的股份制企业,使政企关系疏远化;等等。然而这些做法会产生许多消极后果:(1)国有制演变为地方所有制;(2)剩余索取者实际上是企业内部人,而风险承担者则是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在改革中可以放权让利,但却难以下放责任;(3)国有资产流失难以制止,政府官员与企业经营者的合谋、企业内部人的合谋,以及由此引发的权钱交易、创租活动、抽租活动和避租活动,一方面造成了经济资源的浪费和配置的扭曲,另一方面显然会加剧社会的分配不公、风气不正和贫富差距的现象,成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途径选择

既然,国家拥有剩余索取权是企业改革难以深入的根本原因,而现实中的放权让利又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如果我们转换一种思路:引进非国有资本,让非国有资本转化为股权,而国家股权则转化为债权。则可能会解决这个两难选择。具体分析,这个思路可以带来的好处是:

第一,有助于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政府作为债权人,其权利边界是界定得比较清楚的,比如在企业经营良好时不加干涉(当

然严格地说来,并不是完全不加控制,如当投资风险很大时,债权人也要过问),但是当企业还不起债时就可接管,让企业破产或重组企业。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则转移充当股东的非国有资本,在企业日常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

第二,有利于解决监督积极性低和监督可靠性差的问题。当非国有资本拥有剩余索取权时,它同时也就承担起了投票风险。这样,有着人格化资本行为的非国有资本必定会要求企业以盈利最大化为其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非国有资本(委托人)就会积极地对企业经营者(代理人)进行监督。同时,由于非国有资本所有的不是“廉价投票”,而是“昂贵投票权”,因此就避免了国有资本作为委托人的监督不可靠的问题。“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也因此受到最大限度的制约。

第三,有助于解决代理成本高昂问题。多级代理关系的单级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积累性的信息损失,节约监督费用;同时由于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高,也使代理人决策与使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决策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损失减到最小,从总体上降低了代理成本。

第四,有助于建立有效竞争的外部市场。非国有资本拥有剩余索取权后,一般而言剩余索取权是可转让的。企业经营不佳时,股价就会下跌,企业就有被接管的可能。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另外,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抑制也起到了规范经理市场竞争的作用,即真正有能力和努力工作的经理或潜在经理在市场上受欢迎;而没有能力或不努力工作的则相反。

由此可知,非国有资本转为股权,国有资本转为债权的思路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应遵循这条思路来进行改革。对于提供不同性质产品的国有企业以及所处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我们应区别对待。具体地说:(1)对于提供公共

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 李善民 赵丽红

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无不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资本短缺与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二是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现实。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于1973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金融深化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途径应从金融着手,摒弃传统的以低利率为特征,主要通过政府干预和信用配给资金的金融抑制政策,而通过持续而有步骤的金融开发政策引起金融深化——即人们乐意持有的金融资产相对于有形资产较快增长,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促进经济的高效发展。金融创新作为金融深化的结果,它促进了金融深化,并在通过资本市场最终将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因此,在我国的经济转轨和金融体制改革中,如何认识金融创新的意义

并以金融创新为契机,制订出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方略是有深远意义的。

一、我国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现状和问题

在实行商品经济的社会里,随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及信用的不断发展,为降低内源融资成本和减少交易费用,储蓄者和投资主体逐渐分离,完成了从储蓄向投资转化这一过程便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转化渐渐便倾向于落在由信用最好的金融体系来主导,其转化过程借助的金融工具便是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对购买者来说只是一种预期能取得收益的所有权凭证,因此其本身就包含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金融系统脱离物质生产实际而无限膨胀发行

产品的国有企业,由于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不可排他性和收费的困难性,不宜将国家股转为债权,而应采取国有国营的模式。(2)对于垄断国有企业(主要包括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受国家产业政策保护的支柱产业),政府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有利于基础工业、支柱产业的发展 and 基础设施的建设,宜采取国有国控的模式。(3)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主要指以盈利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和加工业等),宜引入非国有资本,采用非国有资本转为股权,国有股则转化为债权的模式。(4)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由于规模小,

产业的重要性不大,竞争激烈,市场需求转向快,也宜采取非国有资本转为股权,国有股则转化为债权的模式。

银行改革与企业改革是互补相关的。所以在企业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应对银行进行必要的改革。银行改革总体趋势应是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化与商业化,同时建立新的商业银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对银行改革途径作进一步的探讨。

作者张政军,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生(210093)

责任编辑:谭湛明

导致到期无法偿付时,为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更新的金融工具如期货期权等被发明出来,但这种新的工具又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于是金融衍生商品又被创造出来。衍生商品离开物质生产部门就更远,其不确定性就更大了,这样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价值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其最底层的基础部分是实际的物质产品,其上为物质商品交易和服务贸易层,再上是债务股票和期货商品交易层,最上面则是金融衍生品和纯空头的资本交易。而从事这些交易的资本市场本身又是不完全的市场,不存在一个最优的市场均衡点。因此如不及时研究我国的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是极易引发出整个经济体系的动荡的。以下就我国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现状和问题作一探讨:

1、创新深度不够,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

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需为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提供适合他们要求的各种投资和融资手段或工具。但是我国目前的金融创新工作主要集中在改造传统做法,引进借鉴国外的做法上。改良性的创新多,而缺少根本性的创新活动,浅层次的创新多,深层次的创新少,尤其是在难度较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金融创新工作基本上还没有大的触动。例如前一阶段的创新主要是在工具的恢复和引进上,而在资金利率机制和投资业务种类上,基本没有创新或是只触及到一些表层问题,从而限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和筹资渠道明显不足。而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首先需要以合理的市场结构为支撑,没有良好的市场结构则难以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在我国,资本市场因创新深度不够已造成了一种“跛足”运行的状态,一方面是股权市场与债权市场失衡——前者规模小,后者规模大;另一方面是债权市场自身失衡——国债市场相对发达,而企业债券市场和金融债券市场发育滞后,这种失衡的结构极不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2、创新动力不足,资本市场规模偏小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程度不够,国家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

绝对的统治地位,严格的行政管理限制的活动范围、单一的金融业务,使整个金融业缺乏竞争和风险意识,传统的金融直接控制方式难以真正转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间接宏观调控,金融创新工作也就缺乏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甚至一些新工具的推广使用往往还要依赖于行政命令才能办到。这一症结造成了在我国的金融资产结构中,有价证券的相关比率过低,资本市场的规模偏小。截止到1995年底,我国股票、债券等资产占GDP的比重只有20%,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为84%,新加坡为310%。

3、创新的发展进程不平衡,资本市场格局单一

从各国实践来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各项金融创新活动,往往是在经济发达地区首先出现,然后国家指定在部分沿海和发达城市进行试点,然后再在全国推广。这种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的金融创新活动与西方的金融创新是“政策环境与经济环境变化,金融内部竞争及技术进步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不相吻合。实际上,这种创新活动的推进行程对非试点地区来说是一种限制或行政制约,它不利于我国金融创新的全面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资本市场格局单一。就我国目前资本市场而言,交易所市场狭小,仅有上海和深圳两家,并且都不是全国性的证券市场。而且这两家交易所主要是接受所在地政府管辖,其当地政府的监管机制具有同证监会相同的股票发行、审核的审批权,使得交易所主要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本源泉;同时我国虽然存在着两个屏幕交易市场NETS和STAQ,但目前仅限于交易法人股而没有大力发挥交易市场的功能;地方性的柜台交易又因极不规范而致使交易量很小。

4、创新与监管难以配合,资本市场未规范化

创新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现有金融管理的挑战,是对金融管制作出的反映。首先由于各种创新金融工具的区分越来越难,传统的货币测量和监督采用的货币层次失效,货币总量和信贷总量的监控难度加

大;其次,金融创新模糊了金融机构的界限,资本流动大量地通过资本市场而非通过信贷的途径,商业银行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外的业务;最后,在资本市场上,无论是发行市场还是交易市场,投资者与经营者、投资者与证券经营机构及代理人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信息的传递是资本市场运作和投资者决策的必要条件之一。当信息的传递被当成谋利的手段和工具时,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会有选择的输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在金融创新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就会产生种种欺诈行为,造成我国资本市场在扭曲状态下发展,如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证监会并不是独立、统一,具有准司法和执法权利的权威机构;多家机构共同对资本市场的不同侧面予以管理,造成一项有效的市场政策因涉及多个部门间的权力利益而搁浅;监管只注重短期而忽略长期发展之促进,没有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上市公司不注重绩效,而投资者投资行为不规范等。

二、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方略

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程度较低,金融市场正处于发育阶段,对金融创新尚未产生强烈的客观经济需求,因此,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创新工具和市场被引进发展中国家后,虽然一方面加快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步伐,推动了金融结构向高层次变革;但另一方面也会使它们新兴的资本市场更易受金融创新副作用的冲击。因为当金融市场和整个金融结构对金融创新的客观经济需求不十分强烈时,金融创新工具高杠杆、高风险、便于投机的特性就会促使这个市场迅速异化,成为一个投机市场而非套期保值市场,而且,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管理也比较落后,它们承受冲击的能力也就低,一旦发生较大的投机亏损案,尤其是金融机构的破产案,就可能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引入金融创新时,必须考虑这种创新的特性与本身的市场特点,并及

时参照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与教训,制订相应的管理措施,使金融创新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尽量同步,少走弯路。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我国的资本市场应采取以下的发展方略:

1、战略化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关键靠的是观念的转变,只有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观念,才可能提高认识,确立资本市场的战略地位,并制订相应的战略发展计划。首先应明确,中国的金融市场中,资本市场是根本性市场,而货币市场是关键性市场;其次,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应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实现从计划控制转向标准控制,从资本需求的控制转向资本供给的控制,并逐步过渡到需求与供给的均衡。

2、市场化发展。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不断走向成熟,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和升级,我国僵化的金融体制已经根本无法满足全方位发展经济的需要。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上场、工业国经济增长放慢、贸易条件恶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要求我国解除金融抑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发展资本市场首先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即是利率具有可调性和传递性,利率市场化是货币政策由直接走向间接的标志。利率通过改变投资者收益预期的方式对资本市场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利率管制使资本市场基本功能受到很大限制,利率差额的行政变动增加了资本市场的的不稳定性因素,如创新金融工具的定价无一标准和规律可行。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对政府赤字提供融资的作用和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潜在帮助都低于应有的水平,所以政府必须给予银行更多的制定利率的自主权,而银行必须进一步规范利率变化的方式,并通过市场培育来提高投资者对利率的敏感性;其次,促进和规范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竞争。垄断是一种低效的经济方式,它所造成的潜在社会损失是巨大的。在我国实行金融深化的进程中,打破金融机构的垄断,有利于资本市场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如在有价证券的发行市场上采取证券商公开竞

价的方式来决定承销额就利于得到有价证券合理的价格。

3、多样化发展。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应着力于拓宽证券投资渠道和投资领域。我国的资本市场应是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因为投资者和筹资者的要求是多样化的,要使资本市场更有吸引力,就要求有风险、期限、收益和权利各不相同的工具出现。事实上,资本市场中的绝大多数品种,都是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的实践中创造的,这些品种即反映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要求,对宏观经济运行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首先要在管理层放松对创新金融工具的管制。资本市场中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作为金融创新的直接结果,其程度和发展趋势是由金融创新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决定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管制有较高的相关性。创新有收益也有成本,只要创新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创新就会实现。当金融创新危及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政府就会进一步加强管制,从而又会出现再一次创新,如此循环,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高;其次,于中国各地区情况各异的特点,建立多层次的证券交易体系,将目前深圳、上海两地的证券交易所改造为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同时在合适的地方建立区域性或地方性的证券交易所,将已存在的 NETS 和 STAQ 市场合并为电脑屏幕交易,为中小企业及高新科技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4、规范化发展。金融创新一方面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资本市场的监管难度。在这种情形下,出路便是促使资本市场沿着规范的方向发展。其一,证券交易场所的运行要规范化,即要消除两个证交所的地方色彩及各自独立核算的现状;其二,证券商行为的规范化,即要从制度上解决证券经营机构的正常融资渠道,堵塞不规范的融资漏洞;其三,上市公司行为的规

范化,即一要把好上市公司关,二要把好上市公司监管关,并对经营绩效日益低下的公司执行退出政策;其四,证券市场专业中介服务机构行为的规范化,即要尽快建立一支以证券公司为主体,包括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顾问在内的高质量的证券中介队伍;其五,投资者行为的规范化,即要加强对通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资金大户的监控;其六,信息披露制度的规范化。这六个方面的规范化归根到底是在于证券法律制度的制订,只有证券法律制度才是资本市场规范化的行为准则。

5、国际化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和重要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仅表明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活跃程度,而且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国际化的证券市场,则意味着享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经济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从国际范围看,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后发、外生性的市场,伴随着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金融制度的变迁和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已越来越显著地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运营的方向。从我国金融国际化的现状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的定位应是渐进式国际化定位,即从国际债务逐渐过渡到股权资本市场,降低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性,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在存在实际负利率和高储蓄率的情况下,减少货币发行的压力,降低可能存在的通货膨胀。这样就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活跃资本市场。

作者李善民,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510275);赵丽红,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510275)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政府间转移支付方式的政策取向

□ 赵守国

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目标的体制变革进程中,我国急需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政府间的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制度,便是从纵向理顺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往来与财政关系的重要标志和关键举措。考虑到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由民间自由交换实现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的有效率生产,而由政府负责安排市场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供给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本文将针对在公共物品供给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就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从规范和调整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的角度,给出了初步的政策建议。

一、可选择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及其功效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一般以其无可替代的权威和主动地位,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对地方政府提供转移支付。从具体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来看,常见的有对称支付、一般性支付和专项支付三种方式。

对称支付是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时,同时要求地方拿出相应的配套资金,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在中央政府给予对称支付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约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会使地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供给和消费都有所增加,同时对于降低地方税率,相对降低区域内公共物品的价格,提高区域内的社会福利水平都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通常无法准确预料到中央政府是否给予或者给予多少这种财政转移支付,在地方财力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为了不放弃对称支付,不惜举债而尽力提供配套。在这种情况下,对称支付特别容易引发诸多的“钓鱼工程”。“钓鱼工程”不仅使工程本身因资金问题而受到影响,而且可能会使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受到干扰,甚至可能会导致地方财政的进一步恶化。

一般性支付是本世纪4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A·汉森和哈维·S·珀洛夫提出的收入分享思想指导下,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的一笔“赠款”,并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灵活安排,无条件使用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这种支付方式在中央财力可承受的范围内,根据地方总人口数、落后地区人口数和财政供给人口数等因素支持地方政府,扶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一般性支付由于既不要求地方财政的资金配套,也不规定和干预资金的大致投向和具体用途,因而对于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财政紧张状况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不足之处在于容易引发经济发达地区产生“平调”的不平衡心态。

专项支付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给予的指定用途的拨款,其目的是保证不同地区的居民享有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条件,帮助地方政府改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条件。这种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有助于在短期内消除地方的“瓶颈”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状况,但需要注意倾听地方政府的意见,不仅使缺少的公共物品有量的增加,而且更应以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的角度促进公共物品品质的改善。

总而言之,上述三种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各有优势,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在具体操作中,中央政府对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的确定,将依其宏观调整目标的需要进行相机选择和优化组合,目的在于通过转移支付制度这种重要措施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和稳定发展。

二、从区域经济差距看调整和规范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制度,以调节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特别是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明确指出,要“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逐步提高中央政府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可见,面对改革开放18年来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日益扩大的东西部差距,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通过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来逐步缩小这一差距,则具有十分紧迫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从总体上已经取得较大的进展。但主要是税收制度改革的长足推进,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规范则相对滞后。由于“税收制度对于从富人向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只起轻微的作用,而政府开支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明显得多”,加之目前我国的税收体制改革本身也不尽完善,从而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据有关部门测算,1994年税制改革后宁夏回族自治区新老税负对比净增长24.8%,陕西净增长高于15%。这是因为:

一方面税负上升的基础产业主要集中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而税负下降的加工工业则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在全面实行增值税的条件下,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产业的欠发达地区与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要产业的发达地区相比,增值额自然是前者高于后者,税负也必然是前者大于后者。此外,国家按1993返年基数据反还和分税制也相对不利于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因此,在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的同时,及早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不仅是进一步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促进东西部地区逐渐缩小经济差距的重要手段。

其次,调整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是重构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关键。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以下缺陷:一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份额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偏小,致使地方财政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承担了过大的公共物品供给;二是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以对称支付为主,引发了许多“钓鱼工程”的项目,导致地方财政的风险增大;三是财政转移支付的评估仍以静态的基数法为主,不利于真正使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有效的扶持。因此,为了协调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地区间居民享用公共物品的水平差距,需要调整和规范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从而建立起科学、完善、有力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再次,建立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是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举措。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表明: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或地区里,如果主要由于政府原因使地区经济差距超过3:1,就被认为存在不稳定因素,经济问题比较容易转移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1988年解体前的南斯拉夫,地区差距为7.8:1;1989年合并前的民主德国,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是3:1。有的学者认为,地区经济差距超过2:1,问题就比较严重了。1980年以前,前苏联各加盟

共和国之间人均国民收入的最大差距为 1.8 : 1 (立陶宛和土库曼); 印度各邦人均国民收入的最大差距为 2.5 : 1 (旁庶普和比哈尔), 在这种情况下, 各种问题就开始不断出现。我国 1992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最大差距为 8.4 : 1 (上海与贵州), 虽然这种状况与其它国家之间存在许多不可比的因素, 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的不合理、不规范和不到位, 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政府因素。

三、从协调我国东西部差距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的政策调整

为了在“九五”期间逐步缩小我国业已形成的东西部经济差距, 平衡区域经济协调、持续和稳定发展,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宜配合国家发展战略西移的方针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为此, 应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威和预算调剂功能, 设计和选择适宜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 以期取得有明显成效的支付补助功效。

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 往往在交叉运用多种转移支付方式的同时, 确立一种主要的类型, 其他转移支付方式可以作为主要支付方式的补充。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 为增强西部省区地方财政的综合实力, 尽早解决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宜在

“九五”期间以一般性支付为主要方式, 以对称支付作为辅助方式, 建立专项财政转移方式。换句话说, 要以无条件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为主, 以有条件转移支付方式作为必要的补充。从德国的经验来看, 如果某州的人均 GDP 水平仅为全国人均 GDP 水平的 95%, 那么通过无条件补助后, 该州人均 GDP 水平将达到全国人均 GDP 水平的 99.5%; 联邦每年还要拨专款用于支援新州和缺额州, 如德国的一项投资法规定: 为支持新州的发展, 联邦每年给新州 66 亿马克、为期 10 年的投入。对于州一级的项目, 联邦每年要拿出 150 亿马克作为对州的财政增加。因此, 我国可以以全国人均 GDP 水平为基准, 使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 水平不要超过基准的 105%, 而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 水平不要低于基准的 95%。同时, 中央政府应建立扶持西部地区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基金, 主要扶持西部欠发达省市区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提高。为使上述建议能够付诸实施, 还需借鉴国际惯例, 着手制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法》, 使我国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纳入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作者赵守国,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副教授 (710069)

责任编辑: 谭湛明

信息时代伦理整合的传统资源

□ 任剑涛

信息时代：伦理成了问题

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期，一批西方学者撰写了以断定时代特质为主题的著作。在这些作品中，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其严谨的学术性受到瞩目。而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则以其通俗的笔调，刻画出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独特风貌。这些著作，汇聚成一个声调：我们正在走出工业社会，进入一个“后工业”的或更直接地说“信息”的社会。

在这些西方学者的笔下，人类社会的历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社会（或称为前工业社会），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而现阶段则处于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按奈斯比特综合丹尼尔·贝尔等人的见解指出的，“在农业时期，竞赛是人对抗自然。工业社会使人同人工组合起来的自然相对抗。在信息社会里，文明史上第一次竞赛是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互相作用。”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作用媒介是信息。信息成为战略资源。知识成为首要产业。并且，他论证，基于五件“最重要的事情”，人类社会从 50 年代后期，便开始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这五件事情是，“真实的”信息经济已经发育起来；由于通信系统和计算机技术的革新，信息流程消除，变化步伐加快；新信息技术会首先应用到旧工业部门中去，并产生新活动、新方法、新产品，我们进入了知识密集的社会；新信息时代的技术成败与人类深厚感情的联系。

西方学者的分析，尽管在理论上的自治性还有待提高，但是，观察我们时代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考虑到高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广泛普及，以及这类事件对于当今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他们所下的当今社会正处于信息时代的结论，有其客观依据和言之成理的地方，值得我们慎重地对待。在信息时代，政治与经济依然是雕刻社会面目最锋利的两把刻刀。但是，依他们的理解，由于知识价值革命导致的思想文化矛盾空前突出，已经使得为解决主导观念与文化大众之间冲突的“文化矛盾”，变得与解决经济和政治这类可以以制度创新和完善来解决的“世俗矛盾”一样重要了。而一系列文化矛盾中凸现出来的中心，正是日益趋同的技术生产与放肆膨胀的自我表达与自我满足要求之间的矛盾（贝尔），是完全按程序操作并且日益自动化的高技术与人类日显迫切的情感需要之间的矛盾（奈斯比特），换言之，人类的技术处境与人的伦理情感发生了冲突。信息时代，伦理成了问题。

伦理整合的必要

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这个“新时代”，所面临的局势确实是新鲜的。信息经济的发展与高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在处理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之先，得处理好人一机关系。一方面，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控制装置的迅速扩展，正在开始形成所谓的“信息环境”，这引起了人与机器关系的深刻的质的变化。另一方面，人们在对此种处境作出反

应时,分化为两种趋向,一些人认为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所具有的低成本、普适性、平等性,既可以解决物质生产问题、社会政治问题,也可以化解以往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平等,将伦理问题一锅端了。从而,走向信息崇拜。与此不同,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信息生产与传播所依赖的计算机技术,甚至美其名曰人工智能,不仅未能解决政治民主、经济增长一类“世俗矛盾”,而且,还使得人际关系的处理、道德观念的灌输、群际意识的培育这类“文化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因此,呼吁打破“计算机神话”。

历史地看,当人类处于一种新环境时,轻快的乐观主义常常是成问题的。而慎重的悲观主义似乎更启人心智。因此,当我们今天置身新的信息环境时,把注意的目光聚集于它带出的问题,是适宜的选择。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是信息的产销过程对于伦理的影响。信息的生产,在现代社会中部门很多,源头广泛。但是,信息的过滤不严。有用的信息与无用的信息在同时被生产。一方面,这造成了我们用以判断世象真假和对错是非的整体认知,被淹没于杂乱无章的细节之中;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责任观念淡漠的生产氛围。由于信息生产的多元性,尤其是互联网容纳的信息生产者数量的极其庞大,信息的产出已无法由法律加以有效的控制。而且法律的控制还处于自身提倡言论自由却又要控制言论自由的二难境地之中。这样,就更增加了无意自律的信息生产者向社会大众倾泄反伦理的色情、暴力内容,并借此谋利的机会。信息的消费,今天已非常普及。但是信息消费既把社会大众隔离成发出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信息的消费者两个群体,从而使前者握有左右后者思维与判断的无形权力,后者无法在完全自主的情形下认知事物和判明是非。伦理的决断力因此下降。同时,日益普及的在信息接受终端面前“了解”世界的方式,还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一人一机的信息接受方式,使“你可以建立自己的天地,在那里你可以为所欲为。不用再和人打交道。”而且这种一人一机的信息接受,因为完全是在既定程序的左右

下进行的,计算机程序(尤其是计算机游戏程序)编制的非道德性原则,使人在不自觉中患上“精神麻木症”,丧失有效的道德判断力。这就如西方学者描述的“热衷于在闪烁的屏幕前进行着假想的毁灭、让自己的闲暇充满好战尚武之举的电子游戏迷,早已将正义感和道德感置之度外;在当今的社会里,大规模的杀戮被视为一种威慑,尸体只不过是一串统计数字,4000万人的死亡被当作一次胜利,战争的连续升级被看成是和平,他们的正义感和道德规范更是无从谈起。”(转引自《信息崇拜》108页)可见,信息时代的伦理确实存在问题。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是,主流的伦理观念已淹没于散沙式的个人祈求之中,自觉的道德要求已隐匿于信息的随意接受之中。社会陷入伦理上的分裂、矛盾、无序状态。个体伦理无法使个人的行为保持全方位的确当性,公共伦理无法使社会维持相互协调的人心秩序。本来应当作为调整人一己、义—利关系的伦理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必要再整合。否则,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得不到伦理的保障,信息时代同样会陷入物质丰足与精神混乱的尖锐而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

传统伦理的再发现

信息时代的伦理困境,是一个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一点尤其由这一时代的伦理整合必要性显示出来。对于人类来讲,所遭遇的不是信息时代要不要伦理整合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达到有效的伦理整合的问题。

新的伦理整合,需要清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搞清楚伦理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二是在此基础上理顺伦理整合的大思路。在信息时代,伦理问题出现的原因,可以区分为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从外在方面来说,信息时代的社会运转方式,有驱使人们追求外在化功利目的,并将之作为人的生活目标的趋向。在这方面,现代社会凸显出两类三大矛盾:按领域说是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按问题说是战争、人工流产、教育与医疗

权利。前三类矛盾是贝尔概括的。在经济领域里,古典经济学把物质生产看作是促进美德、创造文明生活的手段,而不认为创造财富的本身就是目的;但现代经济学却变成了专为个人多变要求服务的“实用的”、“手段的”科学,主要处理个人利益争端情况下的财富分配问题。在政治领域里,公共生活中奉行普遍平等原则导致内容具体、无所不包的各种民众应享要求,这一方面迫使政府扩充官僚机构,管不分大小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得把政治代议制延展为基础宽大的直接参与制,权力与平等的矛盾加剧。在文化领域里,政治经济的高度组织化、制度化、趋新化与文化要求的个性化、独创性、反制度化,以缓抗速正相反对。后三类矛盾是麦金太尔概括的。对于战争,人们陷入战争即非正义应作和平主义者,但潜在侵略者存在使人们得以战制战的悖谬之中。对于人工流产,人们陷入人皆有权维护自己生存故不能流产,但当婴儿是母体一部分流产与否是母亲权力不能剥夺,同时婴儿是人,母亲流产即是杀人的困境之中。对于教育与医疗权力,人们也陷入人人有权享受,故私人学校与私人医生应予废除,但个人有权选择受教与受医者的权利、医生和教师亦有权开业开教的权利的不可兼容的矛盾之中。这六大矛盾,使得信息时代的人类无法进行从容的道德观念判断与行为的伦理抉择。

从内在方面而言,人类在信息时代的社会处境,既然使得人们无法进行从容的伦理选择,相应地人们内心的道德感也就会因为对于选择的厌烦而日益冷淡。那些曾经使人们热情如火的道德说教,既难以引起人们的内心认同感,更无法产生其曾经具有的社会历史作用。如功利主义道德观便把人们推入人有权趋乐避苦而又难以断定在众多的幸福快乐中间哪是真正需要的幸福快乐,及要讲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又要讲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窘境。它未能给人类提供一个神之外心之中,使人的行为可以和谐有序的道德权威。没有道德权威,便有道德危机。功利主义既是现代社会道德整合失败的观念原因、又是人们道德冷漠感产生的理论导

因。功利主义的失败,可以说是建立于现代政经体制基础上的道德理论的失败。现代道德已无法给予信息社会以有力的道德支撑。现代道德在教会了人类对付机器之后,已无法再教会人类来应付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它的使命终结了。

从信息时代伦理危机发生原因的追究上,可以看出伦理重建不可能在既有的道德观念与行为方式上进行。在此,传统伦理呼之欲出。一方面,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外在治理依然是这种重建的坚实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传统伦理已成为伦理整合或重建最有用的资源。这正是贝尔在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之外,在文化上要主张保守主义的原因。他考虑信息社会时代人类的政经处境,认定经济上需使人人获得自尊和公民身分,政治上需使人人可由其成就带来社会地位,文化上需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用以维护文明秩序。因此,他崇尚传统,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这也正是麦金太尔抵制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道德,而在个人总是传统的一部分,人们应当成为传统的承载者的前提条件下,要求回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德性伦理传统上去的原因。并借此保证使人们回到不因外在功利而因内在要求践行道德规范的良性轨道,回到个人德性足以保障人成为整体的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有效整合的有序状态中,从而在重组合理的道德权威的基础上克服道德危机。传统伦理在信息时代的伦理整合要求与思想家的自觉反思中,有了复活的可能。

信息时代与儒家伦理

关注信息时代的伦理整合,以及这种整合的传统资源,我们的问题意识当然是指向自己所处的中国社会的。当代中国,在整体上来看,尚未进入信息时代。但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存在的区域性差异,在先发展的地区,信息时代的一系列问题,也已提到了在现实中要加以解决的日程上来了。这种解

决,一种意涵是在“未雨绸缪”的意义上而言的。另一种意涵是在信息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上而言的。

从前一角度看,尽管说当代中国尚处于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阶段,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的工业化组织、政治的民主化改革、文化的扩大开放,这些问题还是西方国家在50年代以前遭遇过的问题。向工业时代的迈进,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质。处理工业化带来的各种政经文化问题,如生产的持续发展、政治的民主改革、文化的兼容并包,是政府和社会所应当努力把握而不可动摇的。但是,中国社会历来的发展不平衡,已经使得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信息时代才有的格局之中。生产中的高技术含量、知识价值的普遍认可、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在相当程度上与西方国家同步。因此,西方信息时代产生的问题,在这些地区也已经出现:信息经济、量化政治(即以民众的数量支持显示政府工作的效用)、人际冷漠、道德感淡化。据此,信息时代的伦理整合,在中国已不是一个伪问题。从后一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具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由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二是由农业时代向工业和信息时代做双重跨越。这使得社会—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所遭遇的矛盾更形突出。传统在顽强地为自己的生存辩护,“现代”在努力为自己的发展开道,而“后现代”也已经来干扰人们的思维。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飞速发展,又将各种难易不同、传统各异、是非参差的东西泥沙俱下地带给人们。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人处于一个非信息时代的信息量超过人们接受程度的特殊处境中。在这种状态下,伦理的内外在冲突更强烈,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影响更巨大。一方面政经发展的任务非常沉重。另一方面传统伦理与现代道德的

整合难度加强。

集中起来说,中国面临的伦理整合难题是:传统的主流伦理体系儒家伦理在当代将遭遇什么样的问题?儒家伦理是一德性伦理体系。它产生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土壤上,依赖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作用于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它以人的非功利性道德自觉为行为的动力和依靠。对于公共领域的道德调整规范,关注较少。它是一重私德胜于讲公德的独特伦理规范系统。它之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规范伦理要求,已经由历史做出了结论。但是,儒家伦理是中国人的精神传统最深层的东西。在现代进程中已与国人纠缠不休。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它能否有贡献于人?这个问题大而复杂,只能设问而难以回答。但以西方学者面对信息时代所作出的伦理反应来推论,儒家伦理传统似乎也可以获得新的生机?!

主要参考文献:

1.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3.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
4. 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
5. 休伯特·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三联书店1986年版。
6.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7. A·麦金太尔:《美德的追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德性之后》。

作者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冯 生

社会历史既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又渗透着人类自觉的价值追求。因此,要理解社会历史发展,就必须研究历史必然性的实质以及人类价值活动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考察历史规律与价值选择的关系。

—

历史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组成社会的人,都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意志和目的的。人们的动机和目的或者彼此冲突而难以实现,或者付之行动即导致某一历史事件的出现。表面看来,历史似乎受着一些偶然因素、主观因素的支配,但实际上,正是在这些主观因素和偶然因素的背后,存在着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①在社会历史中,人们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任何具体的、现实的人,都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成为人的活动不可逾越的前提,而且其自身的发展也具有客观规律,成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规律。^②其中,生产关系是人们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它当然要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人类社会按着一定的规律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成为不依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透过各种光怪陆离的历史现象,社会发展总是在不断地展示其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体现出遵循一定客观

历史规律的实质。因而,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而必须受着一定的历史规律的制约。这就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即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本质。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既肯定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本质,又承认历史发展不能独立于人和人的活动之外的主体性特征,是一种辩证的、能动的决定论。

既然历史规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神秘之物,它必须通过人的活动而形成和发生作用,而人的自觉活动总是追求着一定价值目标,并不断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的过程,这就不能不使历史发展具有主体性、价值性的特征。历史规律区别于自然规律的独特品质,正在于它有价值的参与。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③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价值实际上成为历史发展的因果链条中的必然因素。价值的因素在历史发展的存在及其作用,也反映了人类不断超越历史宿命论的愿望。

“既然人类出现了这类愿望——它本身便成了他的智慧发展史上的一个事实,而规律便应该包括这个事实,而不是和它冲突。当我们还容许这种冲突的可能时,我们还没有弄清规律的概念,那末我们不可避免地将陷于两种极端之一:或者我们抛弃规律性的观点而站在愿望的观点上,或者完全抛弃愿

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 邱亿通

望——更正确地说为某一时代人们所愿望的——而给规律某种神秘性,将它变为某种宿命。”^④如果我们不愿使规律变成某种神秘的东西,就应该肯定价值因素的参与,研究历史规律中所包含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以及价值因素如何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方式。表现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本身也表明发展的主体性、价值性和目的性的存在。而价值因素的参与,说明历史规律不可能是封闭的、预成的逻辑体系,它以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前提,展开其丰富的、复杂的历史进程。由此,社会发展就突破纯粹的自然性和神秘的自在性,具有主体活动所特有的主体性、价值性,即合目的性特征。

历史必然性的独特本质正在于它离不开人和人的活动,也离不开价值目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但是,价值选择并不是脱离历史必然为所欲为的东西,价值选择越是反映历史必然性,就越成为内在于历史必然性的东西,成为历史规律发生作用的重要因素和必然环节。相反,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本性,甚至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价值选择,即使在个别历史时期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改变历史进程,但最终必将为历史必然性所抛弃。价值必须在反映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才能与历史必然性相一致而发展和实现。因此,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进程,本身就体现着合规律性的前提。黑格尔曾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现实并不等于现存,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凡是合理的东西,都表明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凡是必然的东西,都会表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人类价值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必然性在现实展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价值关系本身就体现着主客体之间合乎规律的内在联系。反之,历史愈是按某种必然的方向发展,就愈表明主体价值参与的自觉性。人类自觉的价值参与,不仅不会与历史必然性相违背,而且使历史发展更能摆脱纯粹偶然性的摆布,使历史按自身固有的必然性发展。“一种

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进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⑤而人类在把握历史必然性基础上自觉的价值参与,最有助于不断消除历史发展的自发性因素,使历史由“自然史进程”向“真正人类史进程”过渡。因此,历史必然性与价值选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使历史呈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发展过程。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体现着人类对终极价值,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以某种必然的历史力量表现出来。所谓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归根到底,是指历史发展自觉不自觉地趋向于符合人类自身发展要求的价值方向。马克思认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⑥人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历史必然性固有的价值内涵。人类这一终极价值追求,在其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可能以隐蔽的甚至否定的形式出现。人类进步的终极价值可能会与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价值追求相矛盾而未能成为该社会一致的价值取向,但符合人类本身发展要求的价值始终是一股必然的和不可遏制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推动着人类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本身的否定,造成人的异化,表面看来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背离,但正是以这种否定,即“恶”的形式,为人类终极价值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成为总的历史进程的必要环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资本主义对人的发展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它在总的历史趋势上包含着对人的发展的肯定性因素。因而,不管社会发展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是否有着自觉的、进步的价值追求,从人类历史的趋势来看,总有一种追求进步的、符合人本身发展的本性的价值力量。这种价值力量可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隐蔽的甚至歪曲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在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却是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愈高,就愈能在发

展上体现人类这一终极价值目标,愈能自觉地利用这一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动力,因而在发展上也就具有更为自觉的合目的性特征。当然,任何现实的东西都有其存在的必然,都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结果的那种必然性,又只能是反映人类终极价值追求的那种必然性。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这种生产方式时就指出:“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而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⑦人类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的追求,最终必然会扬弃异化劳动这一“暂时的必然性”,而选择更符合人类自身本性的生产方式。人类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就使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呈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二

历史规律是社会内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价值只有反映而不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是合理的和现实的。但是,历史规律又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而人类活动的特性,是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客观实际的可能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客观世界所进行的选择。正是人类那种对现状永无止境的追求,不断地试图超越历史必然的选择倾向和行为了,成为推动历史认识和历史发展的动力。然而,面对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价值选择与价值参与如何可能?

诚然,社会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选择的。主体进行的价值选择,只能在认识、尊重和服从规律的基础上加以利用,使客观世界向着主体所追求的价值方向发展。任何时候,规律都是作为客观的和必然的力量在制约着主体的活动和选择,只不过它是否为人们所意识到而已。当主体没有意识到规律在起作用的时候,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必

然性,使人类成为规律的奴隶。因此,人们创造历史,进行价值选择,总是受着历史规律的制约,受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和选择。这是主体选择的受动性、客观性,即客观规律对主体选择的决定性和制约性。但是,社会历史规律并不是自在的必然逻辑,它必须依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在人的自觉活动中得以体现和实现。这就是说,任何规律要发生作用,必须依据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条件不同,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方式就不同。这是社会规律表现形式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这种具体性、复杂性特征,便为主体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们可以在规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选择,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偏离或超越某种历史的必然。只不过这种选择的可能性最终能否转化为现实,要靠实践的检验。历史规律不能完全包容或取代主体自觉的选择。人们依据历史规律作用的具体性和复杂性所作出的各种价值选择,改变着历史的面貌,使历史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由于历史规律对主体选择活动的制约性的存在,这就必然使主体的选择活动不断趋近于与历史规律相一致的内在要求,同时,也由于历史规律在其不断实现的过程包容着主体的价值选择,它在现实的展开中体现出合乎人类价值选择的方向。因此,人类价值选择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历史规律在社会领域中实现和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

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趋势和方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它们矛盾运动的结果,推动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这一基本趋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正是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基础上,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一般规律概括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

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必然为共产主义所取代。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使人类社会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出有规律的前进运动。但是,马克思按照物质生产方式来划分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各民族必须机械适应的公式,这只是一般的和近似的历史过程。“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⑨生产关系必须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单值对应的线性关系,有时由于其他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同一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在历史上,小农经济和家庭生产,从原始社会解体后的多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过。同样,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也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即使同一社会形态下,也可能由于各民族自身特点而存在多种发展道路的可能。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L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等方面所具有的差异性,这

就使处于同一社会形态的国家和民族,在其发展道路和模式上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可能。

人类在同一社会形态下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存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矛盾,它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各个民族的辩证体现和生动展开。马克思指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⑩这些结果所引起的多样化的客观趋向和可能性,就要求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

①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第83页。

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④《普列汉诺夫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卷,第547页,第60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81页。

L《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

作者邱亿通,广东省体改委博士(510031)

责任编辑:冯 生

邓小平理论与社会学创新

□ 黄捷荣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强大的精神武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特征相联系,为此,要自觉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进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创新活动。要善于应用邓小平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主体结构和发展模式等等,这必将使中国社会学迈向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

一

我国现实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发展正处在这一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社会学研究活动,必须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深入地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础结构的状况。

中国社会基础结构,是与中国社会的特色和所处的时代特征相关联的。中国社会的特色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点,因此,了解中国社会基础结构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特色开始。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论”研究中国社会基础结构是一个根本的方向。

从中国社会的特色探索中国社会基础结构主要把握的基点,应当是分析中国社会的国情特色、本质特色、时代特色,因为这些特色全面地概括了中国社会基础结构的内容和特征。

一是国情特色。其一是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有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参与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使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这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但是,从旧中国过渡到新中国,虽然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上先进国家,但生产力的极不发达和经济上的相对落

后,却是巨大的历史包袱。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依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有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极为重要的国情,忽略了这一点势必要走弯路,解放以来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特色的认识,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才获得解决的。其二是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占全世界 1/7 的面积,养活占 1/4 的人口,而且百年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工业基础薄弱,市场极不发育,处于较为原始的交换阶段,商品化、市场化的程度不高,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依然存在,农民依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靠天吃饭的状况未能根本改变;至于少数的大城市,现代工业极不发达,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不到 10%,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化程度更低,存在着突出的工农剪刀差,城乡矛盾日益突出,这是基本国情,简言之就是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有待根本改变。其三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最显著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不高,而这正是我国一切问题的“根”,所有的发展问题都与此相关,是最为根本的国情。

二是本质特色。我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不断加强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举国上下高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阔步前进!

三是时代特色。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我国有明确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坚持政治独立的战略,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一句话就是坚持和平发展中的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与美俄大国建立建设性、协调的战略伙伴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就是不依附任何大国,不屈服任何强国。

二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与中国社会特色和时代特征相关联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活动的根本点。因此,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必须深入把握中国社会经济状况。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刻地分析、考察、概括了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突破,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丰富的内容。

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十五大报告作了极为明确的表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这表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是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经济结构具有多元化,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构成基本经济制度;三是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能动性,无论是公有或非公有经济,都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能动性。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个特色,是作为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础的公有经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多样化的实现形式,不仅扩大了结构基础的范畴,而且扩大了结构功能的外延,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成果,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是与社会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多样化相联系的。经营方式、组织形式是反映社会生产规律的,而这种反映规律的方式、形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方面、过程去反映不断变化发展的规律,而这种具体方式和形式的出现是以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根据我国公有制经济形式发展的现状,除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之外,还有股份合作经济、股份经济、合作经济、混合经济等具体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不论其具体方式和形式如何,其实质都在于“集私壮公”,“化私为公”,都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无论是何种具体形式,实际上都是产权社会化的一种表现。

三

中国社会主体结构,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相关联的。中国社会主体结构是中国社会

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要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体结构,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体状况。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体状况作了本质的揭示和阐述。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灵魂,深入探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社会主体的问题,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显著的指导价值。

中国社会主体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以人为中心的结构。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邓小平确立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最为根本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中国社会主体结构中,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这是社会学必须极为关注的问题。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体是多元的,又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其一是政府主体,这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生活运行的宏观调控主体,是市场经济机制运行过程中有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决策主体。在我国,作为市场活动中的宏观调控主体不仅具有垂直活动而且具有横向活动的特点,渗透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其二是企业主体,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实践主体。企业作为市场活动主体,活动在一切行业之中,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在社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起着非常现实的作用,有力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现实主体,有其特定的属性和功能,是社会学研究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重点。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各种经济成分属于基本经济范畴内,各自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社会经济结构及其主体组成的变化,是社会学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三是市场消费主体,包括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是市场经济的现实主体。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作为社会主体基本部分的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运行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体的群体和个体需要,促进着市场经济供求关系的变化,促进着市场经济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矛盾关系的发展和解决、变换和提升。社会学在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必须十分关注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的需求规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邓小平理论视野中,十分关注社会主体的人,并且把人的需求,满足人的需要状况作为评价的标准,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任务,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理论的人民主体的观点,是研究社会主体问题的根本观点,是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社会主体进行社会学分析的重要理论依据。

四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和中国现实国情状况和所处时代特点分不开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学应当加以关注的预测性、指导性研究的问题。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特点,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就必须深入探索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从而选择一条中国式的社会发展模式,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概括,从而提出在世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形势下,我们应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指明了现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模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了宏伟的蓝图。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具有自己的适合国情特点的模式,是目标式,改革式,开放式,非均衡式和递进式的发展模式。既反映中国国情,又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大地上一次伟大的实践。

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按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决策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此,提出了现实目标的指标系统:首先确定了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其次确定了战略目标,其中政治目标是强国目标,经济目标是小康目标,思想目标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外还规定了时间指标:本世纪末、下世纪中叶的目标;产值结构指标:人均1000美元和4000美元;速度指标,要求特定的时间完成特定产值,必须保持必要的速度。

中国社会发展的改革模式,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邓小平改革理论指引下,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即自觉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次深刻社会改革的改革,能触及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作为

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推动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需要;近20年改革实践证明,我国的改革模式是可行的,有效的,取得了伟大成果。

中国社会发展的开放模式,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邓小平开放理论指引下,实行对内对外的全方位开放,这一开放过程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过程,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的显著变化,使我国社会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为对现实状况进行社会学分析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内容。

中国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模式,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按邓小平非均衡发展的理论,确定了非均衡发展模式,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模式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在承认社会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提倡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以促进社会尽快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社会主体成为自己生产的主人。

中国社会发展的递进模式,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的梯度式、递进式的发展。各地均以自身的优势发展最佳效益的产业,使自然资源以最快速度、良好效益转变为社会资源、经济资源。递进式的发展承认中国社会区域的发展不平衡性,允许参差不齐,不搞“一刀切”,不搞“齐步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有效率的建设,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是成功之路。

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开创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前所未有的,是邓小平理论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的产物,是对中国国情深刻的系统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我国实行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来取得伟大成果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表明,社会的发展是要在社会主体自觉地进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活动条件下进行。

作者黄捷荣,广东省委党校教授(510030)

责任编辑:冯生

综合、创新和不倦的探索

——访张华夏教授

□本刊记者 哲 生

记者(下称记):张华夏先生,您是我们广东省的一位知名哲学教授,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治学经历以及您未来的打算呢?

张华夏(下称张):我出生于1933年1月,1950年就读于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到华中理工大学哲学教研室担任哲学讲师。这是我哲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我主要从事哲学原理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受当时那种学风的影响,我对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作了非常细致的逐字逐句的解读。70年代才出版的主要由我执笔的《自然辩证法讲座》(湖北人民出版社)以及由我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反映了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考据性的研究。由于我个人对数学与物理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因此那时我已对数学哲学、数理逻辑、物理学哲学问题、化学哲学问题以及一般科学史的方法论都作了不少的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不过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有很大收获的一件事,就是我对苏俄30年代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形成,以及后来又怎样演变成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最后又怎样经过批判斯大林演变为苏联50年代哲学教科书有个很详细的了解,以致于我明白这个在今天仍支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体系的来龙去脉和对问题所在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这是今天的哲学原理教师不会有的经历。我的哲学生涯的第二阶段,是“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我返回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到现在已整整20年了。由于感到以前政治运动太多,对于研究哲学来说我虚度了年华,于是谢

绝了一切担任行政职务的邀请或建议,埋头读了20年的书,其中在英国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当访问学者两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哲学与系统哲学,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观念建构新的自然哲学或自然观念的体系。我收集研究了所有我能收集到的系统哲学资料,加以分析与整合。在这方面,我的主要著作有《物质系统论》(浙江人民出版社)和《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我将20世纪科学的自然观念界定为物质系统自组织层次演化观,于是“物质系统”、“系统自组织”、“物质层次结构”、“宇宙的演化”就成为它的必然篇章,从而建立了自然辩证法的新体系。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我的论述可能经验材料不足或思辨构想不够,但在总体上我认为这个理论结构比以物质运动形态及其转化为中心的自然辩证法体系确是前进了一大步。我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科学哲学。我将它划分为“科学探索”、“科学结构”、“科学文化”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利用我在第一阶段自修得来的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知识,我很快掌握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和“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在这方面,我翻译了本世纪科学哲学创始人的两本世界名著,即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三联书店)和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写了一本专著《综合与创造》(广东人民出版社)与编写了一本教材。坦白说,在这个领域我至多也不过是跟上基本文献,做了一些综合整理的工作,虽然在科学问题和科学解释的研究上我有了一些进展,但在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标准问题上我却在当代科学哲学学派林立的大丛林中迷失了方向,不能确定自己的

立场,没有作出什么研究成果。但是,系统哲学、自然哲学、科学哲学这几个领域的研究,使我深感寻根问底的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于是从1993年开始,我便进入我的哲学生涯的第三个阶段,返回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1997年完成《实在与过程》一书,它的副标题是“对本体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其实这只是我计划写作的哲学原理第一卷。我在这本书最后一段写道:“如果环境条件和本人的健康状况容许我继续研究和写作,并有足够的灵感的话,我很愿意推出哲学原理第二卷,它是对认识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称为多重真理观。还可能有哲学原理第三卷,这就是对价值哲学和人本身的探索与反思,称为多元价值说”。这就是我的未来打算。

记:您在研究系统哲学的过程中,曾与乌杰一起,提出系统辩证法的概念,把它看作是走向21世纪的新的哲学思潮和新的思维方式,在哲学界引起很大的异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先不谈系统辩证法这个特别的概念。本世纪初,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冲击下,原子机械观崩溃了,分析还原方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于是科学家们和哲学家们纷纷提出机体观点、整体观念、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哲学家怀特海提出以机体论代替原子论作为宇宙的基本实在。哲学家摩根提出突现层次进化论来解释整个宇宙的进化。完整心理学完全用一种整体观点看待心理过程。管理学家C·I·巴纳德将企业看作是一种协作系统组织进行管理,而物理学则强调将所有物理实体联系在一起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一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兴起,更把系统思想、系统运动和系统哲学推向一个新高潮。这时不仅有了一般的系统思想和系统观念,而且认识到各门科学的异质同构性,找到了跨学科来研究一般物质客体共同特征的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而不问它们的实体是什么性质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是哪一种“力”,它们已经深深地进入哲学的领域。而70、80年代发展起来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非线性物理和混沌理论,除了它们的物理学的和系统科学的内容外,又给一般哲学理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系统思想范式的研究,系统哲学的研究,正是要把这些学科研究出来的存在的普遍特征,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共同普遍规律,整合起来。经过国内外许多系统哲学家的工作,现在像事物的整体突现规

律,事物的结构功能统一或结构质变规律,事物的适应性自稳定、自调节规律,事物的适应性自组织规律,事物的等级层次结构和演化规律以及系统元素相互作用或差异协同作用规律这六大规律已被公认为事物存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不是依赖黑格尔思辨猜想出来的,而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经过横断科学和系统科学一级一级地由具体到抽象地总结概括出来的,反映了20世纪后期的科学思想,反映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现代系统管理是80年代后管理科学发展的主流,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首先是处理一个自我调节的开放系统的问题。当代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生态危机与环境保护问题,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多极化的问题,都必须用开放系统的演化观点,整体突现的观点,竞争与协同的观点和危机与突变,分叉与选择的观点来加以解决。所以系统主义、有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哲学思潮,必定是下一个世纪的重要哲学思潮,我们必须加紧进行研究。现在连英美的分析哲学奎因、戴维森这些大哲学家都使用整体主义来理解语言的意义。系统主义哲学是很有时代特征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系统哲学与传统的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如何?系统哲学所发现的,例如上面讲到的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六条规律与原有的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关系如何?我发现它们有类同的产生背景(都是针对机械论和孤立分析法),有同样的抽象程度(都是抽象程度最高的规律),有共同的研究对象(都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它们的规律之间虽是相容的但同时又是独立的。不过二者的理论核心不同(前者以“系统”为理论核心,后者以矛盾,即两极对立统一为理论核心),对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发展的解释不同(前者用开放系统的自组织来解释,后者用否定之否定来解释)以及术语系统和表述形式的不同,使得二者之间具有某种不可通约性。因此,我们应该将系统哲学与传统的唯物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看作是同一研究对象的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如果我们按照恩格斯的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则系统哲学和传统的辩证法可以叫做唯物辩证法的两种理论模型,前者称为系统辩证法,后者称为矛盾辩证法。我看,这没有什

么说不通的地方,尤其是中国的系统哲学工作者,力图将当代两种本来是一致的哲学思潮,即辩证哲学与系统哲学在系统概念的基础上整合起来,因此我们将系统哲学的某个中国学派叫做系统辩证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系统辩证法这个概念是当时任包头市市长,现在的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乌杰教授在1988年3月首次提出的。同年年底,我也独立地得到这个概念,写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两个理论模型的对话》一文,发表于1989年《哲学研究》第2期。后来乌杰教授出版了《系统辩证论》一书,我也陆续发表了上十篇讨论系统辩证法文章。1993年开始,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又创刊了《系统辩证学学报》。1994年我发表了《差异、对立与系统的矛盾普遍性》一文(《哲学研究》1994年第1期)。1995年又发表《再论差异、对立与矛盾普遍性》(《系统辩证学学报》1995年第1期)。1997年7月胡皓副教授发表《系统辩证论的层次结构探析》,我们都支持乌杰教授的观点,将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规律看作是系统辩证论的差异协同律的特殊表现和简化模型。胡皓乃至说“合理意义上的对立统一规律,不可能成为第一层次上的最高规律;而以差异协同律取而代之,却具有某些明显的优越性”(《系统辩证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3页)。这样我们实际上将系统辩证法看作是唯物辩证法的现代形态,而矛盾辩证法,则作为已经扬弃了的形态包含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这个观点涉及到辩证法的核心,事关重大,我希望哲学界能深入进行讨论,给予我们批评指正。所以你说系统辩证法的概念在我国哲学界引起很大的异议,我并不否认,不过我只想补充一句:它本来应该引起很大的争议而事实上并没有,至少在公开的哲学文献中就是如此。

记:您所提出的问题没有引起哲学界的热烈讨论很可能是因为我国相当多一部分哲学家认为,你们所讨论的根本不是哲学问题,至少不是根本哲学问题。北京大学老哲学系主任朱德生就认为“哲学是研究什么什么普遍规律的一说是错误的”,想找寻这样一种“最根本的实在只能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一种幻想”(《我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48、151页)。吉林大学老哲学系主任高清海教授认为“今日哲学的主题和任务也不再为求解‘宇宙之谜’而去追求什么终极存在、始初本原和永恒真理,它所关注的是

人自身和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世界的根本问题”,“从这种观点看来,‘自然本体论’当然就变成不足取的理论。挣脱‘自然本体论’的理论束缚是对我们来说的一项主要任务”(同上,121页)。所以乌杰和您以及胡皓提出用宇宙的系统差异协同和自组织规律来替代和包含宇宙的对立统一规律,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它们根本不是哲学问题,根本没有这类哲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杨耕博士也说过“哲学的聚焦点已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学术研究》1994年第3期116页)。您对哲学的理解与他们以及我国哲学主流派,即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完全不同,所以你们之间没有多少空间进行对话了。

张:我认为,对本体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忽视,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个主要偏向。当然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运动,都可能从“本体论中心”走向“认识论中心”或再走向“语言分析中心”,然后到达“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哲学和伦理哲学。但无论哲学怎样转向,任何哲学都有自己的本体论前提、本体论预设和本体论承诺,它是哲学的一个永不消失的部分。从孔德开始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哲学家们拒斥形上学,消除本体论的努力,都已经失败了。现代英美最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奎因也承认,语言本身具有本体论的承诺,而P·F·斯塔劳逊最近写了一本本体论论著《个体——描述形而上学论述》,这是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形上学。所以宇宙本体论也好,自然本体论也好,或存在论也好,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采用三种方法来进行研究,综合的形上学方法(例如系统哲学本体论方法)、语言定向的形上学方法(如现代分析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以及思辨的形上学方法(如怀特海所做的那样),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哲学学科,只可惜这个哲学学科在我国现行的哲学分类中,无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还是三级学科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本体论研究什么?它的确研究存在的普遍特征和世界的终极实在问题。其实“普遍特征”和“终极实在”的概念并不可怕,也不能与终极真理混为一谈。其实认为世界的各种不同事物根本没有普遍的共同特征本身就是对存在的普遍特征的一种看法,说世界根本不存在终极不变的实体和初始本原这个看法本身就是对世界终极的实际情况的一种看法,所以本体论问题本身是不可回避的。

记:我们知道您最近推出了一本本体论著作叫做《实在与过程——对本体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据说这本书是您沉思40年,取国内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综合了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体论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的本体论即语言定向形上学以及系统哲学家和一些自然科学家的本体论观点,从而建构一个新本体论哲学体系,取名为多维实在论和系统过程观,简称为“实在与过程”,您能否讲一讲这本书有些什么主要的突破呢?

张: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有许多哲学问题想不通,到20来岁给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时对苏俄30年代和50年代的教科书哲学很不满意,后来又研究了20世纪后期各个学派的本体论思潮,的确可以说是间间断断对本体论沉思40年。不过写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不应由自己来评说,这里我只想谈一说,我有下面几个观点希望读者能特别加以注意:

(1)在建构我的本体论体系时,我重新引回并重构了实体与属性这对范畴,将实体作为本体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我的“实体”范畴绝不是指绝对不变的质料或纯粹无差别的实体,而指的是能独立存在、自我支持而不需要他物作为载体来支持的自立体,是个别特殊的具体事物。实体是第一位的、完全意义的存在,而属性虽是刻划表征实体的,但它是第二位的、不完全意义的存在。我作为出发点引回的虽是一对古老的范畴,但我对它作了语言分析、数学分析和科学事实的分析,因而将它更新和现代化了。我不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作第一哲学范畴,而将实体与属性的关系作第一哲学范畴并认为物质与精神只有依赖于实体与属性才能进行定义。在这基础上我重构和改进了列宁的物质定义,将它定义为:“物质是标志具有属性和关系的一切实体的范畴。这种实体是宇宙间一切变化与过程的主体,它是离开人们的意识独立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人们的意识,为人们的意识所感知、表现或说明。”这样我的哲学立场就不同于本世纪盛行一时的罗素事件实在论,怀特海过程实在论,玻尔的关系实在论和海森堡的唯能论以及某种唯客观实在论等非实体主义思潮,而坚持一种以实体为基础的同时承认事件、过程、关系实在性的多维实在论。同时在实体与属性的分析基础上,我建立了作为二者统一的物质客体的概念模型,在这

基础上建立多元物性论和物类论,将物类划分为自然类与家族类似类,并由此推出自然界和社会存在着全称普适规律和概率规律两大类,修正了传统的规律定义,这样我的本体论就不是本质主义的,也不是解构型非本质主义的,而是建构型非本质主义的。

(2)对于世界的分析,我坚持了一种多重世界的本体论。我打破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二分法的局限性,吸收了量子力学的研究成果,又改造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的本体论,提出了七个世界的宇宙观,这七个世界就是可能世界、量子世界、经典世界、实践世界、现象世界、经验世界和理论世界,它们依次表现出不同领域的不同实在性:可能实在、非确定实在、确定性实在、涉人现象实在、人为实在、经验实在与抽象实在。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不但看到确定性的世界,而且看到非确定性的世界,特别是量子世界;不但看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区别,而且看到主观与客观的交叉、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系列新世界:现象世界、人为世界、实践世界、文化世界等等;不但看到既真又实的现实的世界,而且看到可能世界,它可以是真而不实者。我认为,可能性或潜能是现实事物的根据与动因,变化就是无限丰富多样的可能世界塌缩为相对贫乏的成定局的现实世界的过程。只有用可能世界才能解释现实世界。因为现实世界是可能世界经不同层次规律的步步约束,经主客观条件的步步约束而塌缩而成,这个约束又不是完全决定论的,而是为自由意志世界和随机偶然世界留下地盘。所以我的哲学不是决定论的,而是非决定论的。不过这个非决定论是受规律与条件约束的非决定论。这种可能世界的理论是十分丰富的,它是一种希望的哲学也是一种决策哲学。希望是对可能世界的把握,决策就是对可能世界的约束与限制。

(3)我的本体论,不但对状态、变化、事件、过程和相互作用作了有数学形式的精确分析,而且指出相互作用是过程的机制。这种相互作用机制有四种,这就是因果性机制、随机性机制、广义目的性机制和包括了前三者,并协调前三者的协同性机制。宇宙的终极实在,从运行机制上说就是一种协同学,或协同体,不是赫拉克利特的“火”,不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不是牛顿的“质量”,也不是海森堡的“能”,倒有点像怀特海的“机体”。

跨越传统与现代的民族文学精神寻求

□ 王列生

民族文学精神的内在构成,是文学所坚持和蕴涵的民族精神与文学作品形态的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有机统一。“传统”与“现代”对特定民族文学而言都是一种既对峙又协调的矛盾一体关系,即各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定位性或定时性的“古今之争”,激活人们的创造欲望和建构热情,这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历史驱动力。然而,对于因此而处在紧张情境中的选择者来说,却无疑会因选择的路向之异而导致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果:民族文学会因此而亢奋,或因此而低靡衰落。故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力倡“通变”一说,以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缛短者衔渴,足疲者缀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而且,传统与现代的议题,目前逐渐引伸为成熟形态的理论命名,即“发展论”和所谓“可持续发展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弄清“传统”与“现代”的诸种可能性路向,对于我们阐释民族文学精神建构的一般规律,以及确立中国当下文学有效地产生富有世界意味和时代旨趣的民族文学精神取向,都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操作意义。

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中,人们从不同的观察系或参照系,从不同的利益原则或者价值原则,从不同的知识背景或者政治背景,给予不同的选择,表现出彼此不同的情绪和

姿态。但其差异不外乎三种情况:抛弃传统、回归传统、消化传统。

—

“抛弃传统”几乎在所有的社会转型期都表现得十分充分。在此时空背景,激进主义情绪作用于社会各个方面,社会由此摆脱惰性的困扰,使滞沉的超稳定结构得以消解和重建。英国哲学史上,大卫·休谟之“心灵哲学”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是激进化的悖反乃至抛弃传统的思想成果,从洛克的“物理哲学”那里来了一个180度大转折,所以哲学史家索利这样评述道:“从一开始,休谟就以一种更加广泛的方式来设想这个问题。一切知识都是人类本性的一个事实或过程……这个发现在他18岁时,就使他激动不已。”^①休谟是为大胆地抛弃传统而“激动不已”。这种激进主义情绪在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随处可寻。中国晚明的李贽,别出新声地率领出新的文学思潮,乃至敢于敢问六经之罪,认为“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徒有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也,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由此可见,“抛弃传统”并非都应一概视之为狂狷,判定为“极端”“片面”,其历史转折之功之力其实是不能一概抹杀的。但是抛弃传统的实际结果,却往往会走入新的死胡同,其牺牲代价和负面效应几至触目惊心,文明的“活性”每

每因此而“窒息”。因此,对“抛弃”的具体情状需要作细致的分析。

站在“现代”的选择位置上,“抛弃”的姿态大抵同样可以切分出如下两种:(1)傲视传统。视者站在可选择的现代优势位置,全面审视过既往的文学脉络之后,坚定了自己的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在窥视到历史进程本身的时间局限以后发现了可以超越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因而其创造活动是在居高临下面对传统的位置上完成的。罗兰·巴特写作《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在阐明“本书的问世”时说:“如今,恋人的絮语备受冷落。说的人也许成千上万(谁知道呢?),但又不被任何人认可;它被周围的种种言语所遗弃:或忽略,或贬斥,或嘲弄,既与权威无缘,又被摒绝于权威性机构(科技界、学术界、艺术界)的大门之外。而当放任自流,游离于现实土壤之外,独往独来时,它就只能成为一种肯定之载体,不管这一载体是多么的微弱。”^②否定者因对传统熟知而滋生出不满,对对象的深刻理解确立了“否定”行为的合法性。这好比李白敢于大胆突破沈约以降的形体律定,超越至“六律无律”的汪洋恣肆和行云流水之中。古今文史证明,真傲视者是天才大师。(2)无视传统。视者虽然站在现代的位置上,但是却并未与传统真正发生关系,或者并不知道传统到底存在于何地、呈现为何状,其所指称的所谓“传统”仅仅只是毫无“所指”可言的设定性符号,因而其所宣称的“反传统”纯粹只能算是个体性的即兴情致态度,在“意义层面”和“价值定位”上根本无所谓“反”可言。这种情绪,在目前的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都比较浓。譬如,当激进主义者指斥“东方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性和形下性的时候,埋怨儒家的无知、道家的无能、释家的无用之时,大抵不过幼稚之闹而已,因为这一切对他们仍然陌生得浑然一团,并未作过细致的研修和长久的琢磨。又譬如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在现代主义尚未参透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解构这个那个,结果到处可见堂·吉诃德的影子。德里达或罗兰·巴特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拆解”,首先是因为他们

已经“了解”。利奥塔在回答“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时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阶段,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③这里寓示了极为丰富的释义的可能性,其中至少明确昭示了“川流不息”的存在的合法性,“传统”也就成了在广阔背景上的“川流”之流。“无视传统”是否存在危机,就在于其“现代”的合法性本身,因而也存在于“反传统”的话语权力的有效性。

二

一般说来,回归传统可以分为两种操作形态,其一曰“复古”,其二曰“不变的真理”,而且经典所处时代的无奈和困顿也不知何故地被一概忽视,所以就导致了国学主义者的健忘,即他们忘却了我们的历史就是揣着这些“经典”一步一跛地熬到今天。但由于人们忽略了这种漫长痛苦的真实性和真实性,助长了复古主义的信心和对于怀旧的执著情绪。就“托古”而言,传统的份量似乎得以减轻,因为托古者并未追求精神世界的还原,而目的只是在于借助符号的力量得以将自我生发的主张贯彻到社会扩散的过程中去。托古思潮中的“古”,未必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传统本身,甚至很大程度上只是虚拟或设定的轮廓,历史不得不按照意欲者或曰托古者的意志而变形,于是夸张变形的“古典”就以传统的权威力量呵护着一切托古的内容和所作所为,至于这种作为是否代表着现代进步取向,则无疑有其多种可能性。譬如,文艺复兴时代之所谓嗣宗古希腊,完全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策略路线,所以“认为新兴资产阶级真的是要把历史的车轮倒向奴隶占有制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不正确的。”新兴资产阶级只是“企图托古改制,借着复兴古希腊、罗马学术文化的名义,来实现自己反对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阶级要求。”^④这可算作一种创新者的托古。中国明末的一批思想家,也借“复兴古学”的名目来实现某种精神逆转,胡应麟就因此而成名。《四库提要》语其《少室山房笔丛》云:“盖摭摘既博,又复不

自检点,抵牾横生,势因有所不免。然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可见胡应麟的托古,不过是为了抵制和抗逆心学,无所谓社会进步与否。这可算作一种夹私者的托古。再譬如汉代的博士官,充分利用秦始皇坑儒和项羽烧书的历史缝隙,以开讲先古经书为博取功名利禄的有效途径,于是趋之者若鹜,以至汉《儒林传赞》里都有了微词,称之为禄利之门,可见这样的托古,实在也就可以算作一种禄利者的托古。凡此三类,无论事或人,在我们当下的生存境况之中,亦可俯拾皆是,足见其普遍性和代表性。其托古之旨,我们可以在文化学上找到它的根脉,即所谓“文化循环”(cultural circle)之说,强调进展过程中的周期性和形式相似性,其理论依据是学者们大多数认为“社会变化是按周期发生的,这一信仰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有过重大社会变迁的历史周期存在,在每次社会变化所绵延的时间之间都有着变化较少的特点。”^⑤如果我们全方位地考察“托古”和“循环”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找到因果间的互文结构,这也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二而一”的存在关系。

三

“消化传统”,乃是文化延伸、文学进步的人间正道。通常只被看作过去的历史文化成果而作为今天的文化氛围空间和模仿对象的文明存在方式,强调时间向度意义上的绵延性和影响力,譬如可以描述为“模仿力较之任何成年人用来开导此类模仿力的技巧更具潜能;而孩童对周围事物的感受,也较任何刺激的方法更为重要,只要每一个成年人接触的儿童曾受到固有文化的熏陶,则此儿童就不能避免相似的影响”。^⑥就是这样的描述本身,给我们透露出传统对现代文化发生效应的两种不同消息。就中国文化的发端而言,“化”的思想乃是作为基本宇宙论来给予重视的,化而有万物而有天地之创

造,王弼在《周易正义序》中开宗即谓:“正义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⑦可见,“易”本身就有化的意思,它从旁类论证的角度注解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这化育的思想,较之西方“模仿论”的思想,有着极为明显的东方智慧的思想优势,但是,恰恰是这种思想本身使中国历来的文化转型,即如由先秦道德主义至两汉历史主义再至魏晋自然主义这样的急转弯,也都只能在限定性的圈子内作些变更,所以,一部中国文化史,往往就只是“经典”的传递史,而非替代史,“化”的大道之理就这样“化”在儒生们的皓首穷经的迂阔之中。而且这“化”之理,在精神意识史和文学发展史上,还每每滋生误解、步入误区,所以连“化”的小道理也还难以贯彻。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就是一个较突出的例证。惠洪说:“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观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⑧其意乃在于变化中追求新奇无疑,所谓“盖变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出于精微,夺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⑨然而,这种变化并非具有文化新兴(novation)的品格,“现代”的存在意义无法在传统构成对应关系上得以确立,所以当下无法成为“现代”,它仍然存在于当下时间结构位置的传统生存空间,由此而有当下位置上的时间与空间的直接冲突,并且因为这种冲突的破坏性而滞延了当下的建设性发展。中国文化、中国文学,首倡大化而始终大泥,其巨大的负面效果就是现代性进展的迟缓,并导致20世纪外向型文化交谈情境中的呆滞与木讷,仓促中还伴之以“乱看病,乱吃药”,这一历史教训的觉醒和反思,只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抛弃传统”和“回归传统”之后,又不得不仔细而慎重地思考“消化传统”的问题。

那么,富有民族精神个体性的传统如何在消化过程中实现现代性转型因而真正得

以确立呢？我想，从文化的连续过程和引入过程的统一性去看问题，大概必须包含如下三种文化发生脉络。（一）“濡化”（enculturation），即所谓“把人类和其它生物加以区别的学习经验，能使人类在生命的开始和延续中，藉此种经验以获得在其文化中的能力，即可称之为‘濡化’。在本质上，此种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具有制约作用的过程，是在一种特定风俗的主体（a body of custom）所认可的限度内运用的”。¹此种过程强调传统对现代的氛围薰陶作用，肯定了传统制约的必然性和现代对传统的依附性，体现了文化功能的连续性原则。就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而言，强调“濡化过程”的不可避免，实质上也就是承认中国古典文学的背景力量和定势意义。当代中国作家生活在国际接轨的特定历史时代，世界语境压力和实际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在某种程度上，异域的现代性介入和后现代性介入，使中国作家间接性地获得了现代性切入或后现代性切入的机遇和权利，乃至一些性情焦躁的作家以为由此便已经获得了现代栖居的家园，放弃对本土传统的濡化选择。这无疑是一个误区。以现代汉语作诗学的努力，当然会有横向位移和扩张的时代活力，但是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演变过来的，尽管这种演变本身较多受到外国语的影响，然而从其语言根性来说，它还是民族表达方式的现代形态，首先是汉语的，其次才是现代的。由语言本质推演开来，则当代作家必然要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作为自己的创作准备，并且这种准备的充分程度直接制约着作家对其现代空间予以开拓的有效程度。所以，当代作家尽管不必沿袭任何传统的写作方式和诗性话语，却依然不能贫乏于历史幽深处的辉煌作品和杰出作家，我们必须熟悉而且能够深刻地读解三百篇和屈子的文学精神，读解唐宋八大家和桐城一脉，读解李杜和豪放婉约两大艺术思潮，读解《西厢记》和“临川四梦”……总之，我们必须广泛地读解汉语的历史语词，从而使我们较为充实和沉着地说出现代语词，唯有读解深刻，才会有汉语写作方式的语言感以及现代诗性言说过程中的历史感。

（二）“涵化”（acculturation），即所谓“来自不同文化三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因持续地直接接触，遂产生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所导致的变迁现象。”^①在这一命名设定中，传统被作为一个介入因素，参加到每一生存者个体所包容的整个文化介入体系之中，与别的诸多文化元素发生互动性的影响，从而导致所有元素的改变。个人被抛入当代时空中，必得承受诸多前提因素的制约，本土传统只是这些前提因素中的一个（尽管它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由于现代世界乃是开放性体系结构，因而被引入者可能会受到无数多的异域传统的制约（甚至包括最没有辐射功能的文化形态）。传统的涵化即是传统的融解，它的有效性和营养元均已渗透到新的土壤之中，由此，人们虽受益于传统而又看不到传统的遗留物。此番情形，有如一位当下的中国诗人既熟读李白杜甫，又熟读惠特曼、艾略特，他在广阔的背景上创作并吮吸了各种传统的乳汁，于是我们能从作品中读到许多的“历史仿佛”却没有一处“原来如此”，我们所要描述的传统涵化就是这样的图景。

（三）“隐示化”（convertation），即所谓我们“能够发现，在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隐蔽的一面，有少数共同原则以不同的方式和它相结合”，^②或曰“一种隐示文化的特色，可简化为一项‘原则’，称为隐蔽在显示文化（overt culture）之结构规则的‘背后’。”^③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传统逐渐由“事实”形态抽象为“原则”形态，成为某种连续性链条中的言旨，这些原则和主旨通过某些“关键词”而对后继文化现象和所有现代位置有其程度不同的意义统辖和价值关连。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悲剧精神的“怨”传统。从“诗可以怨”的三百篇发端，到“羌笛何须怨杨柳”，再到窦娥的“只怨这世界……”，中国的怨文学传统可谓已经形成其特有的东方存在之链。历史上写怨写得杰出的作品，作为事实镶嵌在民族历史的时间结构之中，如果我们机械地搬用到现代，譬如再倾情地诉说少妇闺怨，便难免生涩而且必然游离于现代情境之外。那么，怨文学的

文学血脉是否从此就断了呢?这又显然不可能。事实上,我们如果分析性地阅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譬如上半叶的巴金或曹禺,下半叶的余秋雨或张中行,就会发现现代汉语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依然以“怨”而非“恨”或“极端痛苦”“极端分裂”来表达诗性观照世界的悲剧情怀,这意味着传统正以“原则”的力量左右着现代作家。其二是指传统逐渐由表面形态走向深层形态,它变得愈来愈隐蔽,愈来愈不在经验把握的阈限之内。

总之,抛弃传统、回归传统以及消化传统,反映了传统和现代的对峙关系和力学结构,而且它们直接就是我们站在“现代”这一利益位置对传统所作的选择方式和处理态度。尽管消化传统似乎更可以减少文化阻滞或文化泡沫状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就具体的历史进程而言,也不排斥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前两种态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就我们当下呼唤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的文学精神而言,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从这种对峙的力学效果中找到建设性的均衡态势,使其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从而使一种为世界瞩目和认同的中国精神或中国气派,真正以思潮和旗帜的形态矗立起来,就象拉美文学在这一个世纪里的杰出创作一样。考察对峙的出发点在此,考察对峙的归宿亦在此。

①索利《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8 页。

②罗兰·巴尔特《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③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7 页。

④邢贲思《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9 页。

⑤Ake Hulkrantz: 'General Ethnological Concept', 1960, P. 58.

⑥Mead: 'Growing Up in New Guinea', London, 1931, P. 195.

⑦王弼《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

⑧惠洪《冷斋夜话》。

⑨范温《潜溪诗眼》。

LHerskovits: 'Man and His Work', New York, 1948, P. 39.

⑩引自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9, 1937.

⑪A. R. Radcliffe - Brown: 'The Study of Kinship System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y Institute, Vol. LXXI, 1941, P17.

⑫Clyde Kluckhohn: 'Patterning as Exemplified in Ivavoho Culture', 见 L. Spier 所编的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Wisconsin, 1941, P. 114.

作者王列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100875)

责任编辑:陶原珂

80年代中期以来,散文创作随着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拓和自我意识的强化,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一种新的创作思潮。这就是作家以文化的视角观照生活,作品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自觉的文化意识,深广的文化内涵。我们通常把这种散文称为文化散文。

文化散文的出现是文学发展自身规律和社会要求的结果。首先,它上承“五四”时期的一代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把重铸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作为文学本体的核心。第二,它与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密切相关。新时期的散文创作是从揭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开始的。悼念饮恨而逝的仁人志士、追思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的挽悼散文亦随之涌起。但它着重从政治角度揭露极左路线给人带来的精神扭曲和生命的悲苦,并未来得及从文化角度对人生、社会和历史作进一步思索,因而缺少深刻的文化内涵。到了80年代中期,散文家开始注重从文化角度去反思历史和现实,其文化角度包含了政治内容,

而文化的内涵更宽泛、丰富。文化反思是政治反思的深化,散文创作也随之得到了丰富和拓展。第三,新时期的文学,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几个潮头之后,在80年代初期,许多作家的目光注意到乡土,出现一股描写民情风俗、探求人原始之原始的“寻根文学”。它们也启发着散文家在创作中“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第四,市场经济大潮极大地激发了人们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诱发了一些人片面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思想,产生了价值观念摇摆错位,思想感情归依迷茫。这促使了散文家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尤其十分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宏观的考察,相当深入地思索散

文本体论的问题,思索散文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因此,文化散文的出现,是“五四”散文精神的回归与超越,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也是散文如何切入当代人心灵和建构新的文化精神的探求。文化散文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传统的文化精神,从文化古迹或人文风情中寻求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文化人格的构成;二是当代的文化意识,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表现当代人的审美意趣、文化心理,以及对于生命、宇宙、人类的文化感悟;三是作者的文化品格,作者以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文化思考之中,表现出鲜明的精神个性和文化品格。

一、独特的《文化苦旅》

通过山水古迹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在文化散文领域里最先取得重要成就,而在风格上独树一帜的是余秋雨教授。其主要作品有《文化苦旅》、《文明碎片》和《山居笔记》。作者依仗着渊博的文史功底,丰富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在《文明碎片》的“题叙”里说过,

民族文化精神的探求

——新时期文化散文素描

□张振金

自己写这些文章“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是他散文创作的初衷。他长途跋涉,南北漫游,特别吸引他的是那些古代文化留下较深脚印的地方。他由“自然山水”进入“人文山水”,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这使他的散文将人、历史与自然在浓厚的文化思绪中融成一体,揭示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

余秋雨散文的第一个特点是,描述中国文化的沉重脚印和苦难命运。如《道士塔》写莫高窟大门外一座状似葫芦的塔墓,由墓引出对墓主王圆箎道士的介绍,其中蕴含了作者对愚昧的道士和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与激愤心情。其时已是20世纪初,欧美艺术家们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投来钦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作者本来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了,“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确是让人觉得无聊。于是,作者在痛苦的反思中,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在《风雨天一阁》里,余秋雨同样表现了这种历史的悲怆。我们从天一阁藏书楼的创建和它代代相传的历史里,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独特而艰辛的流传方式,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良知和坚韧精神,又反映了家庭一代代的封闭系统不可避免的困惑与悲剧。

余秋雨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借山水风物探求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正是柳州当时这个荒蛮之地,使“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余秋雨从文人的文化人格,联想到中国文化的灵魂:“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人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增添了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

不至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苏东坡突围》则写苏东坡“以名太高”而被文化“群小”嫉妒陷害,幸免于死而被贬黄州:“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余秋雨对封建统治阶级文化性格的分析、批判是极其尖锐的,处处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他极力描写苏东坡所受到的千般痛苦、磨难和孤独,目的也是为了突现苏东坡的文化性格。这就是诗人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在寂寞中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于是写出千古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苏东坡突围》概括了整个封建时代中国文人的命运和追求。

余秋雨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在落满中国文化真实步履的莽苍大地上,探求封存久远的中国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洞庭一角》的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完毕,他便倚楼凭湖抒怀,写了那篇千古杰作《岳阳楼记》,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遂成中国尽人皆晓的格言。《西湖梦》则写了一个“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集合体”,给人以多方面的感悟。作者特别批判了那种“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如此“封闭性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的不道德。”《白发苏州》、《江南小镇》,在作者的心目中,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在怀古伤今之中,写出了中国文化“既疏淡官场名利又深明人世大义”的另一种风景。

余秋雨的散文,首先以对社会、历史进行文化反思,贯注了深刻而独到的理性精神。这就是他以一种哲学意识去观察历史与自然、历史与人、历史与社会。可以说,余秋雨的全部散文都包含了一个“文化与历史”的哲学命题,显示了他对人生、生活、生命、文化、历史、宇宙的哲学思考。其理性精神是对人生的彻悟,是对历史的静观,是智慧的闪耀,是对平庸琐碎的超越,是对世界的一种哲学把握。

其次,余秋雨的散文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豁达宏大的气度,即所谓散文的“大气”。他的散文潇洒飘逸,汪洋恣肆,既有理性的光芒,又有诗情的激发,这种博大精深的内容与奔腾磅礴的气势,使作品充满了生命和活力,给人以无限的思索空间。

二、开掘“强硬之美”

惯于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探索人生和社会,在这一点上,与余秋雨有相同之处的是张承志。其散文集有《绿土风》、《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的作品是从草原起步的。四年的草原知青生活,使他体验并熟悉了草原的迷人风景、生活习俗和历史传说;草原人民尤其是回族人民纯挚朴素的感情、强悍坚韧的性格、博大浓厚的仁爱,深深地陶冶了他,塑造了他,赋予他独特的艺术气质和精神品格,激发了他艺术创造的活力和才华。于是,把大西北的自然风景与人民心灵性格的体验交融起来,成了他的散文创作的基本内容,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美。

在最初的《绿风土》中,许多篇章如《又是春风》、《心火》、《雪中六盘》、《金积堡》等,描述自己“背起行装,不问寒暑,在穷乡僻壤且住且行”,在壮观、雄浑、险峻的西北大地上,在居住“黄泥小屋”中的贫穷、顽强、奋斗的普普通通的人民中,寻找崇高的“人心”、“心情”、“感情”和“心的价值”。他在《告别西海国》里,把自己此行描述为“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离开了那种委婉、闲适的文化空气,“快乐地感受了一种强硬之美。”“独自与下述问题相遇: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并且,要在这些方面“独立地树立起一面旗帜”。

《心火》由外祖母写到母亲,又由母亲写到自己的民族,作者从中感受到她们彼此间相连的一种具有生命力量般的“心火”,其实就是中国人民在艰苦恶劣环境下顽强不息、不屈不挠的传统美德,是在黄土高原上为了

正义、真理和民族利益不顾牺牲的“殉美”精神,是在商海大潮中轻视世俗私利,追求崇高圣洁的价值观念。《荒芜英雄路》则写他到内蒙古阿勒泰大山寻找、怀念成吉思汗走过的那条路,却因如今再也“找不到大时代的那些骄子的遗迹”而感时伤世。在《杭盖怀李陵》里,他一方面赞美古代的李将军,另一方面又感触“现在有谁为两千年前葬身杭盖以北的亡人感到痛楚呢?有谁还会那样面临个人与国家、道德与亡命、和平与危险的大问题呢?”

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张承志的散文都表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在普遍的对于使命和承诺的冷漠背景下,这里却有堂堂正正的对于‘为人民’指归的‘全美’的宣告;在普遍的充斥脂粉气柔婉的氛围中,这里却发现并实践着‘强硬之美’,并以此为目标追踪着如今显得陌生的崇高精神。”

周涛也是以一种当代人的思想和宏大的文化精神,对落后贫困、几近原始荒野的新疆和西北大地作深沉的思索,西北大地的山川风物,包括那狂奔的马,孤独的狼,矫健的山鹰,那震撼山河的信天游,像山一样沉默朴实的人民,还有那绵延不绝的万里长城,进行独具个性的文化思索。

《稀世之鸟》这篇浪漫的寓言,描写有着惊人之美而濒临灭绝的鸟,寓意很深远:“许多伟大的物种都在丑恶的包围中不堪忍受弃世而去”,“美的绝种是对强大世俗丑恶力量的抗议,也是留给这世间的唯一的悲剧”。作品是在表现一种抗御世俗的神圣、崇高的人性之美和文化精神。他的力作《游牧长城》10万字,更是一部有大气的大散文。作者以饱满、亢奋又充满诗意的激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现代的意识去观照长城,感悟长城,让心灵在自然、历史、生命的领域中自由驰骋。

然而,面对长城,作者并不感到自豪:它只是“皇帝家的围墙”,“代表着与之相应的封建特权”,“长城是祖先们痛苦的纪念碑”。作者一开头就质问:“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还有紫禁城,历代皇帝都不惜代价筑城

以保护他们的疆域和尊严,但是几千年来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生存权利也需要保护呢?”当然,作者也思索长城对整个民族的进步有何意义,但结论是“长城没有挡住胡人却把自己圈了起来”,“城墙是思想的墓地”。作者写道:“在充满了恐惧感的城墙之内,怎么可能产生强有力的奔放的史诗呢?怎么可以产生观察自然、亲近世界的伟大科学呢?又怎么可能产生出音域雄伟辽阔、格调崇高优美的交响乐呢?更重要的是,它没法产生思想,它没法产生伏尔泰、卢俊、黑格尔、马克思……以及众多的人类进步思想的伟大父亲!”作者对长城所经过的几个省份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地理、民族、人物、风情……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和现实,都作了独到的思索,广博的考察,富有诗意的描写,使这部作品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和批判意义,兼具文学品格与学术品格。

三、一场“精神圣战”

史铁生是一位坐在轮椅上思索人生的作家。独特的生活,谱写了独特的作品。

史铁生散文的独到之处,是在轮椅上以自我作为观照对象,并与新时期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学思潮相关联。他从自身的生命困境出发,去咀嚼人生况味,思考活着的意义。他曾几度“渴望过死,祈求过死”。他没有回避苦难,不沉溺于苦难。在苦难面前,他是个强者,能够“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好运设计》)。

史铁生这种深切而痛苦的人生体验,使他能够触及到生命最悲壮的底蕴。他在《对话四则》中,他认定自己双腿残废这个苦难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能够给自己生命带来希望和快乐的唯有与之抗争的过程。“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他“最喜欢的是,现实主义加象征意味的作品”。他

的散文代表作《我与地坛》,写他双腿残废之后,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思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地坛的古柏、祭坛、荒草,残废者的迷茫、痛苦、绝望,母亲的关切、痛楚、挚爱,这一切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与环境、生命与自然的完美契合,构成了一幅宏大而悲壮的图画。这图画是象征的,又是现实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史铁生经受过精神和身体的悲剧性袭击之后,他对于生命的感悟,对世界的思索,显得格外真实、透彻和富于震撼力:“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蠢,机智还有光荣吗?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命运?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

史铁生自1978年投身创作,作品量不算多,因以其自身的生命困境和超越困境的追求,使“作品通体贯注着一种对人及人类的终极的关怀精神,从而以其独有的力量感染人和净化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当代文坛纯文学创作的一个典型代表。”

韩少功说张承志和史铁生都在“献身于一场精神圣战”,虽然他们有很多不同。史铁生没有张承志那种“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躺在轮椅上,“以个体生命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且达到了“在最尖端的话题上与古今优秀的人们展开了对话”。其实,韩少功自己也是这场“精神圣战”的战士。他冷静地注视身边发生的一切,善于捕捉当代人的思想疑点、难点和热点,进行哲学批判和文化透视,着力在如今这个浮华躁动的时代,构建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显示了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智慧和大气。

他在《人之四种》中,分析了在金钱面前四种不同的人:第一类是能赚钱而不迷钱,这种态度可谓全人或至人;第二类不能赚钱也不迷钱,可称为雅人;第三类能赚钱且又

迷钱,这是一种俗人;第四类不能赚钱却偏偏迷钱,这类人不怎么好说,只有称作废人才合适。韩少功还对这种人进行了透视:“被大锅饭养久了的人,长期靠行政特权牟利的人,最容易变成废人”,“成天偏食新潮电视广告的人,长期文化失血的人,也最容易成为废人”。在《无价之人》中,他指出,君子是可以忧道亦可以言利的。那些所谓“小人重利君子重义”之说,不过“多是吃朝廷俸禄或祖宗田产的旧文人茶余饭后制定出来的”。中国要强国富民,需要很多的赚钱能手。但是,“世界上最灿烂的光辉,能够燃烧起情感和生命的光辉,不是来自金币而是源自人心。”

他的散文代表作《夜行者梦语》,更通过对“后现代”的剖析,揭示了在物欲横流与精神虚无面前,人类应该怎样认识世界、面对生存的问题。有虚无、迷惘、绝望、焦虑,有荒诞性、反道德、无深度,有丧失自我、礼崩乐坏、中心解构,有过把瘾就死、垮掉的一代、现在世界上谁怕谁……这是“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上帝其实是代表一种价值体系”,

一种“绝对信仰”。作者极富于思辩的理性精神,闪烁着智慧的异彩,但又常用看似漫不经心的笔墨和幽默调侃的手法来表现严肃的主题:“人类似乎不能没有依恃,不能没有寄托。上帝之光熄灭之后,萨特们这支口哨吹出来的小曲子,也能凑合着来给夜行者壮壮胆子。”他以亡友莫应丰病危昏迷中的反复喃喃语“然后呢?”为题的散文《然后》也写出了极富于文化内涵的人生命题:“倘若不把过程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倘若没有在过程中感受到辛劳的愉悦,那么,欲望满足了便会乏味,目标达到了便会茫然,任何成功者都难免在通向未来一片空白的‘然后’二字前骇然心惊。”

文化散文的确是一种需要思想家的文学,它需要作家对社会、历史、人生有独特的审美发现,从中发掘一种深邃的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哲理,才可能获得生活和艺术的超越。

作者张振金,广东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陶原珂

推进审美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面向 21 世纪的思考

□ 李璿平

“审美文化”90年代初被提出不久,1994年就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这表明,这种新“说法”已被民间和官方认可。近几年召开过多次审美文化讨论会,有关论文、专著时有出现,“审美文化”正在成为人文学界的前沿(或至少是热点)课题。这是一种好现象,体现了国内学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前瞻意识:一方面觉察到美学自闭在象牙之塔,脱离了生命力源头活水而走向萎缩;另一方面也觉察到,站在新世纪门口遥望未来,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如何从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的躯壳挣脱,接受美的强力穿透、照射,勃发生机的问题,已迫在眉睫。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审美文化可能正是历史提出的任务。

然而,如果认真检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审美文化研究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它也许可以被概括为三多三少:1. 泛泛议论者多,深入研究者少;2. 散点研究者多,从事整体理论建构者少;3. 玄谈者多,与实际接榫并面向未来,提供有效的、建设性的意见者少。当然,作为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上述现象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从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对社科研究的更高要求来看,问题便不可忽视。它促使我们检讨:审美文化的提出和提倡,理论准备是否不足?具体言之,审美文化是什么(What)?如果它是或不是一门学科,应如何定位(Where)?为什么研究它(Why)?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深化研究便无从谈起。笔者无力用一篇短文解决上述问题,但愿意提供自己的思考。

(一)审美文化是什么?

这本来应是从事研究的出发点,但目前成了最混乱的问题。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审美文化热,内在动因很多,但其荦荦大端有三:一是美学研究的自闭症迫使部分学者觉得无聊而转向文化研究;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而产生的巨大压力;三是试图从文化中找出摆脱窘困、焕发民族活力的希望元素。这样,将审美与文化连接,

便有这新概念的诞生。

回顾提出审美文化的背景,不难寻绎出三位一体搅和而成的救弊动机的实质性内容:1、救生活之积弊(生活中美的缺席和认识性、功利性的强权统治);2、救美学之积弊(美学自闭);3、拯救民族之魂,让美向社会的物质、文化领域进军(美生活化与生活美化)。这就是为什么审美文化直接从文化热中催生,为什么独由美学界而不是由其他学者提出的原因。由于救弊动机过于显露而建设性愿望却隐藏深处,因而,对审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人言言殊,对于审美文化在什么基础上如何统一的问题更缺乏思考。

(二)审美文化如何定位?

审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尚未解决,定位几乎不可能。可是,更多的人文学者往往愿意从它的二相式结构出发,分别定位在美学或文化学之内。前者认为,审美文化的理论建构应当同经典美学的话语系统相衔接,并由此寻求在美学学术史上的地位;后者认为,审美文化应当是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把审美文化看作其他学科的子学科,并希望为此努力。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首先,把审美文化仅看成一门学科是否能被大多数人赞同?谁能保证不被概念化而走进新的象牙之塔,变成与社会生活全然无关的绝缘系,从而遗失本来涵盖的救弊内容?其次,即使它能被定位为子系统,那么,到底被归入美学还是文化学?显然,不管归属何方,都可能打不清的笔墨官司。如果同意审美文化是一门超越于二者之外的独立学科,问题却又回到了端点。因为,作为独立学科,其基本理路如何表述?例如,其核心范畴是什么,由此生发的范畴群是哪些,范畴之间如何建立联系,以构成内在体系?其逻辑起点是什么?……无疑,在论证时必然又会碰到两个基本概念——美与文化——的纠缠。

(三)为什么研究审美文化?

表面看来,研究目的纯粹是主体性的事,其实不然。它的内在指向性直接暗示研究对象的选择。

直截了当地说,研究审美文化是为了美学、文化学或其它学科的繁荣,还是为了用美濡化人、社会,尽可能使其全面发展?这样发问,旨在将研究目的接榫在对当代社会的实际考虑和未来社会的大致走向上,以体现本文的终极关怀。

当代社会的发展预示着 21 世纪将是高科技、信息化的时代。这标志着原本意义上人被物役的状况(仅为衣食住行而疲于奔命)大大改善,随着消闲时间增多而出现一个大众社会。但是,高科技、信息化极度泛滥,又意味着科学性、实用性对人的压迫,以及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如上悖论发人深思。发展科学、追求有用,其初衷是自己的解放,然而,一旦科学理性、实用理性宰制社会,人又将成为非人。从自然的奴隶异化为科技的奴隶,主子改换了,而人自身的境遇依然故我。因此,马克思本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都从不同角度做过盛世危言式的论述。

如何达到经过扬弃的更高层次的“人本主义”,既享受科学之利,品尝有用之乐,又能超越之,使人本身得到全面发展?有的学者依据马克思《188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思路,揭橥审美文化中美的经验、强力,强调美向真、善领域的渗透,保持童心的纯洁,与此同时,脱下大众文化的外壳,分离消极因素,予以鞭挞,高扬美育、艺术教育之功效,提倡真、善、美三者圆融的“新意识”,并认为这就是审美文化研究的终极目的。笔者同意,这是一种目光远大、见解深刻且动机良好的看法。但是,审美文化与美育、艺术教育是什么关系,是相等还是包含?这里,仍有一个逻辑问题。如果相等,干脆叫美育或艺术教育罢了,为何要取新名词“审美文化”?如果包含,谁包含谁,被包含者在其中的地位、功能是什么?另外,美育是手段还是目的?若是手段,其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审美文化?美育与艺术教育关系如何,相等还是包含,异同点在哪里?席勒以来,人们对如上问题论述得并不清楚,今天该如何看?

如此追问的目的是让学界正视审美文化研究的尴尬状况。追问至此,我们能否论定,“审美文化”的提出是否粗糙了些,是否应该认真补救(重新推敲、限定)了?

依笔者愚见,经多年传播,审美文化不胫而走,不能废除,但必须斩断攀援的枝蔓,廓清其内涵。审美文化不是美学、艺术,也不是大众文化、后现代文

化,但与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联系。审美文化不应当作为美学的部门,成为振兴美学的工具,而应当向文化学靠拢,并建构独立品格。也许,审美文化被理解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文化”较妥,其定位放置在“人类文化的审美层面”较好,其研究目的主要似应考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协助其它学科,使华夏民族到达“应该如此”生活的境界。这些都是极概略的表述,聊备商榷。不管怎么说,审美文化研究要想走出困境,拥抱新世纪,如上 What、Where、Why 等三个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此外,还有两点顺便指出:

1、审美文化研究不可排斥大众文化。中国正在走向工业社会(现代化),还没有到达西方那样的公司国家形态(后现代社会),因此不能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绝对排斥大众文化。在我看来,大众文化的主要特点在于复制性(非创造性),使之成为被卖(而不仅是被消费)的东西。在最短时间里生产大量易销品(即不仅允许复制,而且就是为复制而生产的),成为生产者的充分动机。生产者不知道顾客是谁,因而产品具有中性化,而顾客则具有非人格化的性质。从这个观点看,大众文化若不加强引导,便有麻痹人的美感,使消费趋于标准化的危险。但是,在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农业人口,老、少、边穷人口占相当大比例的国家,存留有许多尚待清理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思想垃圾。它们是走向现代化的最隐蔽、最顽固的障碍,党和政府每时每刻都要花大力气对付之,^②而大众文化却具备解构这些落后意识形态,唤醒主体自觉的作用。只要因势利导,从大众文化中就有可能崛起一代活泼泼的新青年。

2、审美文化研究必须重视美育,重视美向认识、道德领域的进入。这应当是审美文化的重心所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3 页。

②参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作者李瑀平,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524048)

责任编辑:陶原珂

柳宗元诗歌简论

□ 梁鉴江

柳宗元出身士林盛族,父镇官至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旧唐书·柳宗元传》)他不仅年纪轻轻便以卓越的文学才能和渊博的学问在流辈中享有盛誉,而且科举仕途也颇为顺利。他21岁登进士,26岁第博学宏词科,授集贤院正字,31岁任监察御史里行,两年后入尚书省为礼部员外郎,颇得翰林学士王叔文器重,参与政治革新,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从26岁至33岁,柳宗元可谓“超取显美”(《与萧俛书》),春风得意。但是随着革新失败,顺宗逊位,王叔文被贬(次年被杀),柳宗元受到残酷的逼害,十年永州,四年柳州,在僻远的蛮荒之地度过以后的岁月。柳宗元的诗歌,除少数几篇,绝大部分写于贬谪之后,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他的贬谪生活和思想感情,成为我们认识柳宗元的非常重要的资料。柳宗元诗歌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抒写被贬的幽愤。“长吟哀歌,舒泄幽郁。”(《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政治上的失意之感、被贬的悲愤之情,时刻伴随着柳宗元的贬谪生活,他无计排遣愁怀,稍舒幽郁。翻开柳宗元的诗歌,处处都可以见到诗人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未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写于永州。弘农公,即诗人岳丈杨凭。他任江西观察时,为御使中丞李夷简所劾,以贪污僭侈之罪贬监贺尉。其后罪名得以昭雪,入为王傅。这是杨凭罪名昭雪

后柳宗元献给他的一首诗。诗中赞颂杨凭的才德,写他由贬谪而入傅,最后写及自己的不幸遭遇:

独弃侂人国,难窥夫子墙。……世议排张摯,时情弃仲翔。不言纆继枉,徒恨纆徽长。贾赋愁单阙,邹书怯大梁。炯心那自是?昭世懒佯狂。鸣玉机全息,怀沙事不忘。恋恩何敢死?垂泪对清湘。

诗人以张摯未能取悦当世,致终身不仕,虞翻犯颜直谏,性不协俗,终见谤坐徙,写出自己因参与王叔文革新被贬的悲愤,并以箕子、屈原自况,表白自己的炯炯忠心。《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感谢娄图南在自己失意之时相濡以沫,诗中处处表现出诗人“緜羽”的惨痛、机锋四伏的凄惶和“远弃”“天边”的孤寂。在《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中,诗人叹友伤己,悲愤之情不能自己。吴武陵亦永州流人,与柳宗元有相似的遭遇。“緜羽集枯干,低昂互鸣悲”是柳宗元和友人的不幸遭遇与满腔悲愤的形象描写。《入黄溪闻猿》写由猿声而引起对身世的哀伤,读者如见其泪,如闻其哭。《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的脍炙人口之作,饱蕴远逐柳州的“茫茫”“愁思”。《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是现存柳诗最长的一首。此诗纪游、写景、咏志融合成篇,而以咏志为主。作者在游南亭夜还之时,百感交侵,身世之恨,悲愤之情喷涌而出。“八司马”之一的凌准,永贞元年(805)十一月贬连州,母死不能归葬,致一门无主,抢地呼天。凌准泣尽而

丧其明,最后悲惨地死于贬地。《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哭友伤己,令人不忍卒读。“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正是作者的自白。柳宗元的幽郁悲愤,不仅表现在他的感怀之作,赠答之章,还表现在他的写景之什。他的山水诗绝大部分都写景抒怀,寄寓作者的幽郁与孤寂,有些开篇便是身世之叹。如《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之“宦情羁思共凄凄”,《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之“拘情病幽郁”,《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之“谪弃殊隐沦”,《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之“隐忧倦永夜”,《构法华寺西亭》之“窜身楚南极”,等等,使人感到即使在游览山水之时,诗人也背负着巨大的政治重压,无法摆脱心中的“宦情羁思”。

抒写对故乡的思念。柳宗元祖籍河东(今山西运城),但他生于长安,长在长安,在长安有过一段辉煌的人生历程,因此他视长安为自己的故乡。在长安西南郊有柳家的产业。这是一座有良田数顷、果树数百株,还有台馆房舍的庄园。在长安城善和里、亲和里有柳家的住宅,在善和里旧宅中还有三千卷的藏书。柳宗元贬官以后虽然举家南迁,但长安还有他的亲友和昔日的同僚。他被贬以后,无法淡忘对长安的记忆,他的诗常常表现出对故乡的深切的思念。《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作于柳州,这首诗形象地表现作者强烈的乡愁: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南中荣橘柚》写于永州。诗人从贬地的“橘柚”,想到“故乡”的“飞雪”,不禁发出思乡之叹。《闻黄鹂》将思乡之情写得真切、具体而感人:

倦闻子规朝暮声,不意忽有黄鹂鸣。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目极千里无山河,麦芒际天摇青波。王畿优本少赋役,务闲酒熟饶经过。此时晴烟最深处,舍南巷北遥相语。翻日迥度昆明飞,凌风邪看细柳

翥。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伶人不思还。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闭声回翅归务速,西林紫椹行当熟。

诗由“黄鹂”而引起对“故园”春天景物的联想,寄托作者对故乡深深的思念。这种思乡之情,有时又表现在对故乡田宅的具体描写当中。《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卜室有零、杜,名田占澧、滂。礪溪近馀基,阿城连故壕。”《游朝阳岩》:“故墅即澧川,数亩均肥饶。台馆集荒丘,池塘疏塘坳。”诗人对长安城郊零、杜之间,澧、滂两岸的居室、台馆、田地、池塘如数家珍,怀恋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首春逢耕者》则从农夫春耕而念及故园的田亩:“故池想芜没,遗亩当榛荆。”思乡之情触景而生。其他如《零陵早春》、《春怀故园》等,都无不表现出深切的思乡之情。

描写贬地奇丽的山川景色。柳宗元的山水诗有二十多首,跟他的山水散文一样,都是我国古代山水文学不可多得的珍品。界围岩在永州湘水拐弯处。元和十年(815)正月,诗人自永州北还过岩下,是年三月出刺柳州,五月赴柳州再经此地,写下了《界围岩水帘》、《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两篇作品。他以生动形象的文字,描写那里青青的岩壁、澄澈的流水、璀璨的“悬泉”、“云间”的“鹤鹤”,对“悬泉”的形状、水声更作了精细的刻画,为我们留下了两幅清幽奇丽的山水书卷。《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写潇湘二水会合处的景色。碧水“萦回”,渔歌雁叫,加上“高馆”“危楼”、青山秋空,组成一个清幽绝俗的人间仙境。永州城郊朝阳岩东南为袁家渴,袁家渴西南有石渠,石渠既穷为石涧。这是一条山间的石溪。柳宗元为它写过一篇记(《石涧记》)和一首诗(《南涧中题》):记侧重于纪游,诗则对石涧的“回风”、“林影”、“羁禽”、“寒藻”作了精细的描写。长乌村在永州。《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以生动的诗笔,刻画了长乌村幽谧、旖旎的田园风光。友人崔策在柳宗元“废居八年”(《送崔九序》)之后到永州来看望他。他们一起登西山游览,他写了《与崔策登西山》一诗,诗中写了

登高远望的山水景色。补了《始得西山宴游记》景物描写之不足。此外,他还描写过夏初雨后的愚溪(《夏初雨后寻愚溪》)、南谷的荒村(《秋晓行南谷经荒村》)、西园的月夜(《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零陵的春色(《零陵春》)、愚溪的渡头(《雨晴至江渡》)、寒江的雪景(《江雪》)、江上的渔舟(《渔翁》)……柳宗元的山水诗,大都以永州山水为题材。他的山水诗,较之他的山水散文,更富于诗情画意。永州的山水名扬天下,得力于他的山水散文,也得力于他的山水诗。

此外,他还写过田园诗、咏物诗、咏史诗,还有一些与佛禅和书法有关的作品,较为零散,这里就不再多述。

柳宗元与韩愈同是中唐文体革新的主将,但是没有像韩愈那样开创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新诗体。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的功绩主要在于继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写出无愧于前人的作品。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他不属于开拓者那种类型;但他的诗歌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中不乏万口流传的名篇佳作。

或谓柳宗元的诗歌风格与陶渊明、韦应物近似(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看法可能本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苏轼将韦应物、柳宗元并举,用“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概括两人的诗歌风格;而韦应物作诗则以陶渊明为榜样,唐人也认为韦诗与陶诗相近。我认为,柳宗元的古体诗和近体诗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今存古体、近体数量约各占一半):古体工简幽丽,风格更接近谢灵运;近体则疏爽摇曳,完全是盛唐的继响。

简洁工致,是柳宗元古体诗的显著特色。从笔墨来说,柳宗元的古体是简洁的;从描写效果来说,柳宗元的古体是工致的。本来简洁与工致,在同一篇作品中难于兼顾。由于柳宗元能抓住描写对象的特质,因而能用最少的文字,把描写对象刻画得生动细

致。如《南碕中题》:

秋气集南碕,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这里四句写了“回风”、“林影”、“羈禽”、“幽谷”、“寒藻”、“沦漪”六种景物,而它们的形、态、动、静又刻画得精细而生动,使人如临其境。再看《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

发春念长违,中夏欣再睹。是时植物秀,杳若临玄圃。歛阳讶垂冰,白日惊雷雨。笙簧潭际起,鹤鹤云间舞。古苔凝青枝,阴草湿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沉珠渊,锵鸣捐佩浦。幽岩画屏倚,新月玉钩吐。夜凉星满川,忽疑眠洞府。

“笙簧”八句,写白日雨后界围岩之景:潭水,写了水浪、水光、水响;潭上,写了鹤舞云翔、“古苔”“青枝”、“阴草”“翠羽”和遮天蔽日的水帘。这些景物交织成一个色彩鲜丽、绘形绘声、有动有静、如画如仙的艺术境界。

柳宗元古体诗的另一个特色是爱写清幽之境,以表现自己的孤寂、抑郁。他的古体境界凄冷,表现出一种寂寞凄清的格调;这种格调在他的山水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上面所举《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一篇,“古苔”、“青枝”、“阴草”、“翠羽”、“素彩”、“激浪”、“寒光”、“幽岩”、“新月”、“夜星”,构成一个清冷幽凄的境界。又如《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

隐忧倦永夜,凌雾临江津。猿鸣稍已疏,登石娱清沦。日出洲渚静,澄明晶无垠。浮晖翻高禽,沉景照文鳞。双江汇西奔,诡怪潜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栖灵神。洄潭或动容,岛屿疑摇振。陶埴滋择土,蒲鱼相与邻。信美非所安,羈心屡逡巡。纠结良可解,纡郁

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谓非所欣。

“清沦”、“静渚”、“浮晖”、“高禽”、“沉景”、“双江”、“诡怪”、“孤山”、“洄潭”、“岛屿”……组成的画面，笼罩着令人震颤的寂寞与清冷，正好表现作者的“纠结”、“纤郁”。柳宗元的古体色彩鲜丽，他喜用绿色、白色等冷色。这清冷的色调，与幽峭的境界相一致，是诗人表现孤寂凄清之境的手段。柳宗元的古体华而不绮，色彩鲜美而不会浓艳，有时他仅用一两种颜色，便收到很好的视觉效果。如《渔翁》用山水的绿色，烘托渔翁的悠然自得；《江雪》以茫茫的皓白，烘托广漠的寒冷和无边的空寂，突出“孤舟”“独钓”。

柳宗元的近体诗很少用典，也很少议论，通过鲜明的形象，表现作者落寞的情怀和缠绵的愁思。请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写广漠的原野、无际的“海天”、在“惊风”中“乱”的水面“芙蓉”、“密雨斜侵”的墙上“薜荔”、重重的“岭树”和曲折的“江流”，表现诗人彷徨无据的心境和“茫茫”的“愁思”。再看上文所举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这首诗通过对尖“似剑芒”的群峰的描写与联想，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的思乡之痛，令人心灵为之震撼。形象鲜明，神韵摇曳，这是盛唐诗歌的显著特色。苏轼之所以高度评价他的作品，正是由于他的近体诗继盛唐之后，能以“远韵”取胜。

柳宗元近体诗的另一个特点是笔带感情。他的近体诗或思乡，或赠别，或感怀，总

是笼罩着强烈的抒情气氛，荡漾着缠绵的幽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就是突出的例子。再看看《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

雨后的“山城”、凋零的“百花”、“满庭”的落叶、“乱啼”的黄莺，这春深之景，因融进了诗人的“宦情羁思”而充满萧瑟的秋意，摇曳着幽怨的情思。再如《登柳州峨山》：

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

作者眺望秋日的原野，但见荒山层叠，距柳州城北 30 里的融州，仅隐约可见，而故乡长安却在千里之外。淡淡的诗笔，饱蘸浓浓的乡思。

声韵悠扬，也是柳宗元近体诗的特点。他的近体诗多用响韵，加上和谐的声调，形成强烈的音乐美。只要读读他的近体之作，便不难有这种感受。

柳宗元的诗歌之所以未能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主要原因是：一、柳诗无论数量或影响，都不能与柳文相比，柳诗的成就往往为柳文的成就所掩盖；二、在诗人纷纷探索诗体新变的中唐，柳宗元仍然走着盛唐的路子，虽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取得突出的成就，但有盛唐诸公横亘于前，他的诗歌光芒就相对显得暗淡一些。不过，我认为，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成就来看，柳宗元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仍然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者梁鉴江，广东人民出版社编审
责任编辑：童 轩

学校公民教育刍议

□ 刘国华

实施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长期的历史任务,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使命。开展学校公民教育,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以下主要谈谈其性质、任务、内容和推行模式。

学校公民教育的性质

学校公民教育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涵义。广义言之,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教育,表明接受这种教育是正确行使公民权利和义务所必需的。国家规定的普及义务教育是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也是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公民教育,它主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旨在全面提高和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我国在教育目标上有关人才教育概念和公民教育概念的争论,就是在这层涵义上展开的。有一段时期,我国曾存在偏重人才教育,忽视公民教育的倾向,目前这种局面得到了改善。强调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主张基础教育,这主要是合格的社会公民的呼声日益强大的结果。这种倾向也是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四有”公民,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总要求的。

从狭义说来,公民教育是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及社会关系的教育,旨在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在我国,就是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公民所应具备的思想品德的教育和民主法制观念的教育,目的是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公民思想道德修养和明确的公民意识。本文探讨的是狭义的公民教育。

学校公民教育与学校德育有密切关系。从任务上看,公民教育的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与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从内容上看,公民教育所实施的政治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以及社会公德教育,也是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因此,公民教育属于学校德育的范畴。

学校的公民教育与学校的知识教育也有密切关系。实施公民教育必须传授给学生相应的政治、伦理、法律、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使学生掌握必备的公民知识,发展公民意识,养成良好的公民品质。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基础,公民教育包含了知识教育。但公民教育毕竟不同于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注重学生的知识获得和智能发展,而公民教育不仅重视学生对公民知识的掌握,更重视养成学生正确的公民价值观、态度、信念、能力和行为习惯。

学校公民教育的任务和内容

学校公民教育任务的确定,应以国家对公民在思想品德上的要求为依据。综合国家对公民的各项要求,在我国,一个在思想品德上合格的公民,就是要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具有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具有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念、法制观念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以上对公民的要求,也就是我国学校公民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和要完成的任务。

根据公民教育的上述目标和任务,我们认为,我国学校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教育。这是协调个人与政府关系、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因而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学校,政治教育主要应对学生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国情教育、时事教育和政治知识教育,以便使学生了解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了解和关心国内、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增强政治意识,掌握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

(2)民主与法制教育。实施公民教育,增强公民意识,重要的是要唤起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这是公民作为社会平等的成员的本质属性所要求的。学校公民教育中的民主与法制教育主要应培养学生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培养少数服从多数和尊重他人的民主习惯;要使学生树立法律的无上尊严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要使学生正确认识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做一个积极的、负责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3)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这是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品质的基本途径,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年轻一代的爱国精神,也是为了塑造更优秀的民族性格、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既让学生继承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热爱自由、富于革命精神的优秀品质,又注意克服长期“闭关自守”所形成的落后的民族意识,在对外开放中虚心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点与长处,形成更为优秀的民族品质。

(4)社会公德教育。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是每位社会公民都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公德教育主要应使学生养成文明礼貌、诚实守信、互助友爱的良好品质,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维护社会公益、遵守环境道德、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公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学生认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依存关系,从而正确处理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的关系。

学校公民教育的推行模式

学校公民教育的推行模式通常有三种。

(1)开设独立的公民教育科。为公民教育设置专门的科目和课时可以使学习内容更加系统和集中,降低实施的难度。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是不能充分利用学校的其它公民教育资源,容易使没有任教该科的教师忽略其推行公民教育的责任,此外,在内容上也容易与其它学科课程重叠。

(2)设置综合学科。开设综合科目如“社会教育”、“公民与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把公民教育作为课程的一个单元教授,可以使学生获得系统的公民知识教育,也能与其它跨学科课题如德育、性教育、环境教育、人口教育等联系起来实施,不会导致过于细致的学科分类。这种模式的缺点是,可能会淡化公民教育内容,使公民教育受到忽视。

(3)把公民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和学校的其它活动中实施。公民教育涉及的知识范围十分广泛,远非一门课程所能容纳。此外,公民教育不单涉及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践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态度、信念、能力和行为习惯。因此,通过各科与公民教育有关的课题、内容和课外、校外活动以及校风建设实施公民教育,策动全校共同参与和关注公民教育,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公民教育资源,大大增强公民教育的效果。这种模式实施难度较大,需要强有力的统筹才能够系统地实施,否则会出现“人人负责实施公民教育”,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人人都不管公民教育”的局面。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利弊,把渗透式与独立学科或综合学科结合起来,通过学校的全部教育活动实施公民教育,既能保证学生获得系统的集中的公民知识教育,又能充分利用学校公民教育资源,因而是一种理想的公民教育推行模式。

作者刘国华,山东烟台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教授(264025)

责任编辑:陶原珂

澳门政治发展与宏观政治研究

——评吴志良《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

□ 邓正来

吴志良所著的《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乃是一部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架构出发探讨澳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专著。由于该书的叙事方式是历史的，而且辅之以大量详实的档案馆材料和其他论者的研究文献，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的最大特点往往被认为是历史材料的丰富以及作者经由这些材料而表现出来的说服力。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历史材料本身并不是志良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他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而且由这些历史材料勾连而成的澳门政治制度史也只是志良在其知识支援下对历史材料进行选择 and 归类的结果。据此，个人以为，解读《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这部著作的重要之处，在于把握作者所试图回答的理论问题，洞见支配作者选择材料和处理材料的研究路径或分析框架，以及作者经由此一研究所可能具有的理论贡献。毋庸置疑，对志良这部著作可能具有的理论贡献的分析，当包括对其间所存在的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的揭示。

一、以澳门本身为主体的研究路径

大凡学术研究工作，都是在学术传统中展开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展开相关的研究之前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研究而对这一学术传统做出自己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过程

中，学术传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学术研究也在其间获得了它自身的意义。依据此一道理，志良的《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首先展开的就是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反思，并通过分析和反思进而确定了他研究澳门的路径。众所周知，自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以来的四个半世纪期间，有关澳门的研究层出不穷，一如《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所附“参考书目”所示，仅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有关澳门历史的专著和资料集，中文版的就有近 20 种，葡文版的有近 30 种，英文版的有五六种。但是在这些研究论著中，套用志良的话说，“时至今日，仍缺乏一部获中葡双方和澳门居民基本认同且在学术界具起码共识的《澳门历史》”。

澳门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境况，学者们各有论说，然而我个人以为，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论者的研究路径所致。具体来讲，也就是志良在《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澳门史研究与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一样，存在着明显的双轨……，中葡学者对‘澳门史’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国学者一般将澳门史视为中国地方史，虽有其特殊性，但本质不变；而葡萄牙学者也向来把澳门史作为海外殖民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如人们所知，中国自鸦片战争始的发展趋向主要就是美籍政治学者邹谠教授所言的从权威政治系统向全能政治系统的发展，因此采取那种将澳门史视作中国地方史的研究路径，就无从解释澳门自身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非全能政治的发展取向；而

葡萄牙的相应发展趋向则表现为全能政治的发展和海外殖民统治的扩张,因此采取那种将澳门史简单视为葡萄牙海外殖民史的组成部分的研究路径,也无法解释澳门自身发展中的所谓“分而治之”的现象。正是立足于此的思考,志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澳门史研究虽不可避免地以中葡两国作为重要的参照系,大量涉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必须力求以澳门为主体,真实反映中葡(包括其他民族)居民在澳门地区共同生存发展各个方面的历史,华洋不可排斥偏废,双轨定要交汇合一。”这就是志良在其专著中所确立的以中葡两国发展为参照系但却以澳门自身发展为主体的研究路径;显而易见,这一努力不仅一方面为澳门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而且在另一方面也为志良自己真切地洞见和把握澳门的“内部”发展进程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渠道。

二、“和谐共存”抑或“文明冲突”

研究路径的确立,只是志良洞见和把握澳门发展历史的一种可能渠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研究,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这是因为纯粹“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似不可能,而且即使可能,也无从反映出论者的当代理论关怀。因此,对于一项历史研究来讲,在研究路径确立的前提下,还需要对研究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加以确定。从这一角度来看,确定具体理论问题,便是志良所著《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所做的第二项努力:当然,一如我们所知,志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恰如他所言,澳门“奇特的发展演变过程不单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形下,葡萄牙人如何神话般地在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土地上据居下来的?明清政府为何让他们‘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自治长达300多年,直到1887年才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初步确定澳门的政治法律地位?中葡两

国不同时期对澳门这个特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向和政策有什么不同?澳门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葡关系史上作用如何,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扮演着什么角色?中葡民族怎样克服思想文化差异而和平共处分治?更令人深思的是,澳门又怎样面对外来压力和威胁,自强不息,屡度难关,在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摇摆漂流,避免搁浅触礁而到达今天,并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城市?这些一直是史学界极感兴趣的题目”。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问题只是志良认为澳门发展中所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这些问题视为是志良的专著所要回答和解决的理论问题。综观《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个人以为,志良所要挑战或论辩的,一方面乃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晚近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亦即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撞与世界秩序的重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一书中指出的,在冷战以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必然替代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甚至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则是西方以现代化理论为依凭的“西方文明普遍论”,这种论点在否定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主张西方的价值和制度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普世性;毋庸置疑,志良所要批判的还有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体认西方文明过程中的非理性观点,而这种非理性观点的两极便是“全盘西化”论和“全盘反西化”论。正是志良所具有的这种对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论关怀,促使他在以澳门为主体的政治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理论观点,即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存”论。这就是志良所明确指出的,“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乃因为澳门不仅‘实为泰西通市之始’,还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典范。……这难道不值得当今世界或因经济、或因宗教、或因种族而大动干戈的国家或地区效仿”?

志良依据澳门历史经验而提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是许多其他论者所关注的一个

具有时代性的理论问题。然而,志良与其他论者不同,他在回答其所确定的理论问题时,采取的方法并不是一般论著所采取的那种只对中葡居民在澳门社会和平共处做事实描述的方法,或者那种对不同文明间和谐共存的理想做应然建构的方法,相反,他所采取的乃是对中葡居民如何在澳门社会和平共处进行探究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追究“如何”,而非追问“实然”或“应然”。正是这种讨论“如何”而非追问“实然”或“应然”的方法,决定了志良在《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中不满足于对澳门历史事实做简单的描述,而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对这些历史事实如何形成的原因加以追究,并在此一追究的基础上推论说,“只要西方文明抛弃其向来所表现的政治、军事或宗教、文化优越性,是可以与非西方文明和平共处的,葡萄牙人可以长期在天朝的土地上生存,根本的原因是面对强大的中国,只求经济互利共荣,不刻意也难以表现其政治、军事或宗教、文化的优越性。”

三、宏观历史分析与微观行动理论

姜义华先生在评论志良的《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时指出,“坚实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对澳门和世界未来深切的普遍关怀,使吴志良先生这部著作具有比之一般澳门政治史远为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内涵。作者没有仅就政治制度谈论政治制度,本书作者深入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有力地证明了澳门特殊生存发展过程,完全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变化及中西文化碰撞角力使然”;而在我看来,从分析框架的角度言,志良这一努力所凸显的则是他所采用的宏观政治发展理论框架,也就是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西方政治学界研究政治制度史的主流理论取向;这种宏观政治发展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归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套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 A. Przeworski 的话说,也就是“宏观历史比较社会学”(macro-historical comparative sociology)的一部分。志良通过采用这

种“宏观政治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强调了中葡两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以及两种文明讨价还价的过程对澳门政治制度发展的制约性,并且通过此一宏观政治发展框架的引入,揭示了澳门研究脉络中的一个新的维度,从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推进了澳门的既有研究。

当然,志良所著的《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所讨论的乃是关于澳门政治制度的理论问题;这种学术讨论的特点在于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真理性质的讨论,因此任何学者都可以对其间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甚至展开学术意义上的批判。个人以为,志良这部著作,一如其他理论著作,都存在着自身的理论限度,而志良这部著作所存在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澳门研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乃是他所引进的“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本身。然而,即使我们通过对“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的质疑而能够指出志良研究的不足之处,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恰恰是志良这部著作的贡献所在,因为正是志良将这一分析框架引入到澳门史的研究之中,为我们深入检讨这一分析框架本身提供了一个切实的文本,也为我们有可能在试图解决其间所存在的问题并推进澳门研究之前厘定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一如前述,“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大体上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然而众所周知,自本世纪80年代初以降,这种宏观研究取向遭到了大体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学术界对60年代以后的社会政治发展所展开的经验研究和统计分析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或现代化的进展与政治发展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化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复杂,而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促使论者们开始对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的缺失面展开检讨和批判。另一挑战主要来自于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当时以“博弈论”、“常人方法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等方法论的发展为基础,西方社会研究的重心日益转向个体和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亦即研究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偏

好”和“选择机制”对人的行动以及制度性安排的影响。

这种微观策略分析取向所强调的,乃是这些由个人和集体所做的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决定会产生不同的政治结果,同时也是由他们做出的这些选择和决定会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和他们自己的命运,从而也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本身。正是这种从宏观向微观研究的转向,对宏观研究取向的一个核心命题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这个核心命题就是:给定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条件,个体和集体不论怎样行动,都只会产生同样的政治结果。显而易见,从这种微观取向研究的角度看,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的主要弱点就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太强的决定论品格。因此,这种微观取向的理论转向,便开始在政治制度研究中强调关注在微观且具体的历史情景下,作为政治行动者的个人和集体会选择什么行动方式和策略,以及这些行动方式和策略在各种互动过程中所可能形成的政治制度安排。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指出宏观向微观研究的转向,主要的目的并不在于由此完全否定宏观政治发展研究的分析框

架,也不只在于简单地主张以当下的微观政治研究分析框架替代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并动用这种微观分析框架来研究澳门的政治发展,因为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只会使我们跌入另一个陷阱,即以同样的方式忽视微观政治分析框架自身在解释力方面所具有的缺陷。因此,我们在这里指出宏观向微观框架的转向,主要的目的便在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在澳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能打通宏观政治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微观政治分析框架,也就是既从宏观的角度强调中葡两国及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澳门政治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同时也从微观的角度关注澳门的政治行动者根据他们的知识所做出的策略选择与确定的目标取向对于澳门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观制约性。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首先需要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意识,而且更需要我们进入澳门的生活实践之中,并经由具体的澳门研究活动而对它做出回答。

(本文原是作者为《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所作的序,发表时略有删节——编者)

作者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主编
责任编辑:郭秀文

“东方蒙地卡罗”澳门将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这不仅对澳门,而且对毗邻澳门的广东来说,都将提供发展的良机,为粤澳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创造了条件。在新时期内,粤澳两地经济合作如何朝一体化方向推进,使各自的经济发展优势互补,兼容并蓄,达到最佳整合?笔者认为:粤澳经济合作应该充分认识各自的优劣势,扬长避短,寻求新的突破口。

一、粤澳两地经济发展优势比较

现代经济的发展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必然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发生日益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并在这种关系中取得成长和发展。我们首先分析和比较一下澳门和广东经济发展的优劣势。

澳门是历史悠久的国际自由港,其最大的优势是长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和低税政策,人员、资金和货物进出自由,没有外汇管制,对许多国家和地区豁免签证,这就极有利于国际经贸活动的开展。澳门现在企业或个人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15%,同时,政府对高科技产业实行税务减免。

澳门的地缘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它正处于经济发展迅速的亚太地区,邻近香港、背靠广东珠江三角洲,受到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带动,尤其是十五大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外经贸合作将不断扩大。在这种机遇下,澳门可以充分担当内地

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随着澳门国际机场的通航和九澳深水港等大型建设项

目的建成,澳门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以珠三角为腹地,同广东、香港组成极具发展潜力的成长三角,一方面是突破自身时空的局限使经济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又可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盟联系的贸易中心。

此外,澳门拥有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单独关税区的地位,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享有欧美国家的贸易优惠。澳门与欧洲联盟及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有着历史悠久的联系网络。

澳门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博彩业相对发达,带动了不少消费行业的发展,并提供当地相当一部分税收。近几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澳门逐步形成了靠发展博彩业带动旅游业,以博彩业兴百业的经济模式。目前,旅游博彩业、银行保险业、出口加工业和建筑地产业已成为澳门的四大支柱产业。

但是,澳门由于地少人少,土地只有1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0余万,使其经济发展受自身条件的局限,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即典型的海岛型微型经济。由于缺乏自然资源、缺乏人才,经济重点长期侧重于第三产业,传统加工工业已走向衰落,而高科技工业和多元化工业的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同时,也不可能发展大规模的

制造业,对外经济依赖性强。而港口处于入海口,不断入海的淤泥使港口的泊位趋浅。这种交通运输的制约,使其不可能像香港那样大规模地发展转口贸易。

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率先成为全国对

后过渡期粤澳经济合作新探讨

□ 谭湛明

外开放的先行点、试验区,大力拓展与周边地区(尤其是港澳)的联系和合作,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广东是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省份之一,GDP增长率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1979年至1995年的17年,广东GDP增长近9倍,GDP占全国的份额已由5.15%上升为9.3%,1996年广东GDP的增长率为11%。

广东的最大优势一是土地和原材料资源丰富,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上,广东的原材料工业发展很快并达到较好水平。二是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广东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拥有一定优势。首先,广东拥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省内劳力不足可以从外省大量输入,不会像台湾、韩国那样容易受到劳动力不足、劳动成本上升的制约。其次,广东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其产品可随意向各省市场推销。现时估计内地的人均生产总值已达1000亿美元,未来如能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幅度,仅沿海等较富地区就可消化广东的产品。此外,通过外资工业的转移,实际上广东可以依靠港澳台商家的出口订单,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出口加工工业体系,而澳门、香港实际上也成为广东出口加工业的海外市场拓展者。三是广东科研力量比较雄厚,现有高等院校45间,研究机构600多个,自然科学技术人员42万多人,明显优于澳门。四是广东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广东各市县都有旅游景点,且有丰富的文物古迹资源。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广东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

广东的弱势表现在:1.内地的经济制度限制了其更灵活和独立自由发展。2.没有自由港,没有独立的关税条件。3.广东缺乏在资金筹集、体制改革、人才训练、工业政策等方面的综合协调。4.市场运作法规尚未建立起来。5.通讯落后,与国际联系不够密切、信息不灵,对外资讯和接触面较小,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产品的推广、销售、管理等方面,都与澳门厂商有较大差距。

二、寻求粤澳经济合作新突破

澳门“九九”回归指日可待,我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已成定局,这对于未来澳门与广东经济合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东应当充分利用澳门自由经济的独特优势,树立新观念,开拓新思路,构筑粤澳经济合作的新格局。

(一)建立高层次及宏观层面的协调与沟通,经济合作应由民间自发进行发展到由政府参与协调。目前粤澳经济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民间的自由的低层次合作,应积极谋求建立一个由两地经贸发展机构、企业、研究单位等组成的具有权威性的经贸合作协调机构,协调社会分工、资源配置、产业政策、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科学研究以及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推进广东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澳门接轨。

(二)加快经济体制接轨的进程。澳门回归祖国,粤澳经济合作遇到一个十分显著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一个国家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的关系。“一国两制”的政治经济格局的顺利实施,对澳门对广东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巨大作用,但在双方经济合作的具体实践上,不可避免地出现碰撞和矛盾。但是,澳门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广东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变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趋向一致。因为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方式和机制是统一的。其次,两种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经济能够进行合作的直接原因是相互需要。就粤澳经济关系来说,广东需要澳门,澳门需要广东,通过合作,求同存异,互补互利,共同发展。求祖国统一之同,求市场经济之同,求经济发展需要之同,存社会制度之异。

(三)避免恶性竞争,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粤澳经济关系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粤澳地理区位相近,天然的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一些主要产业如贸易、工业、金融、交通通讯和旅游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澳门拥有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这是广东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广东拥有土地、劳动力、市场等优势,这是澳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粤澳经济合作的实质

应在于加强协调,充分发挥合作优势,避免恶性竞争,达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目的。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粤澳经济合作对促进两地的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1999回归日的临近,两地合作也会在以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竞争关系表现为不管是澳门或是广东都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一切条件来发展和强化自己。如澳门的商人到广东投资办厂等要与当地的同行竞争。粤澳经济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合作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竞争则是相伴随的方面。应该实现经济、产业联合与企业集团化,建立以资源、主导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团以及跨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形成跨城市的经济体系和结构,消除不必要竞争的消极因素,实现两地经济合作良性循环。

(四)合作向高层次发展。十多年来,粤澳经济合作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不断得到发展。合作的范围已从过去的一般加工工业扩大到商贸、金融、证券、基础设施、旅游、教育、科技、劳动力等多个领域,合作层次在不断提高。但是,粤澳经济在多个领域的合作目前尚是初步的,在许多层面上需要进一步拓展。后过渡期内,这种状况必然逐步得到改善。在以往合作的基础上,两地经济合

作必将从主要是“前店后厂”的关系向结构性和整体性合作转变,实现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内的多元推进。

(五)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粤澳经济合作要建立统一的开放市场是困难的,可以通过经济、产业集团化和已形成的“前店后厂”的合作形式,促进两地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交流,贸易品自由流通,技术、资金、人才自由流动与组合,尽可能地为粤澳经济合作创造一个优越的外部经济环境。1.充分利用澳门这一渠道,广泛宣传广东的投资环境,在澳门开办产品展销会、贸易洽谈会,建立现代化、多功能的信息网络。2.把广东的产品和澳门的销售网络结合起来,开拓远洋市场。3.澳门的商人信息灵通、销售渠道多、出入境方便、熟悉国际贸易的惯例等,因此,他们充当中间商的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无法取代的。

参考资料:

- 1.《广东经济年鉴》,1995年,1996年。
- 2.《粤澳关系研究》,梁钊、李蒲弥主编,1994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3.《澳门日报》,1997年1—10月。

作者谭湛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助理研究员(510050)